

2/033

学术·研究



H6

**XUESHU
YANJIU
1983 1**

0 5233

目 录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的贡献…… 张江明 (5)
-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王致远 (18)
- 共产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的相结合中前进…… 齐 云 (28)
- 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直接影响…… 顾春明 (81)
- 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的科学方法…… 梁 木 马中柱 (87)
-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科学的研究…… 刘夏帆 (42)
- 艾思奇主要著译年谱…… 叶佐英 (48)
- 关于跨地区经济协作和联合的几个问题…… 黄荣生 (54)
- 对计划管理三种形式的认识…… 林兆木 李主其 (60)
-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实现手段…… 陈应中 (65)
- 清远县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发展的情况和经验…… 曾牧野 (69)
- 香港玩具业的发展…… 雷 强 (74)
- 论精神文明发展史研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史 扬 (79)
- “一二九”前后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 黄义祥 (84)
- 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 郭景荣 (91)
- 汉魏的浮华士风…… 胡守为 (96)
- 方孝岳先生的治学方法…… 李新魁 (101)
- 社会主义文艺与共产主义理想…… 黄展人 (108)
- 丘逢甲及其诗歌…… 杨 桦 (112)
- 从给梁启超的信看黄遵宪晚年的思想…… 汪松涛 (119)
- 读书札记 · 略谈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 高晨野 (125)



“角两雄”解.....	止水 (59)
《康有为政论集》诗歌系年小议.....	止水 (124)
“嚼杨木”证.....	易知 (73)
是“低昂远判”，而不是“低昂遂判”.....	宋杰鑫 (95)

·学术动态·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128) 广东历史学界举行学术讨论会纪念广州起义五十五周年(88) 广东历史学会讨论“在历史教学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问题(80) 广东党建学会举行首次学术讨论会 (129)
广东人口学会举行一九八二年年会探讨控制我省农村人口的新办法 (180)
省逻辑研究会年会论点简介 (180) 广东哲学学会召开一九八二年年会 (181)
省马哲史研究会年会论点简介 (181)

封面设计..... 马骞

CONTENTS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of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Zhang Jiangming (5)
The Socialism Practised in China Is in Adherence to and Furtherance of the Theory of Scientific Socialism.....	Wang Zhiyuan (18)
Communism Advances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Qi Yun (23)
Tentative Remarks on the Direct Influence upon Ethics Exerted by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 Chunming (31)
Scientific Approach to the Cognition and Utilization of Objective Laws.....	Liang Mu and Ma Zhongzhu (37)
Strengthen Scientific Researches on the Building Up of a Marxist Party.....	Liu Xiafan (42)
A Chronicle of Ai Siqi's Principal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	Ye Zuoying (48)
Some Problems Concerning Trans-Region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and Unity.....	Huang Rongsheng (54)
The Three Forms of Planned Administration as We Apprehend Them	Lin Zhaomu and Li Zhuqi (60)
The Principle of Taking the Planned Economy as the Primary Factor and the Regulation by Market as the Subsidiary: Its Necessity, Inevitability and Means of Realization.....	Chen Yingzhong (65)
The Growing and Experience of 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System" as Practised in Some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Qingyuan County	Zeng Muye (69)
The Upgrowth of Toy Industry in Hong Kong	Lei Qiang (74)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the Building-	

up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Shi Yang (79)
Democratic Patriotism in Guangdong Round About the "December 9 Movement"	Huang Yixiang (84)
Contributions Towards Overthrowing the Dictatorial Rule of Yuan Shikai Made by Patriotic Overseas Chinese	Guo Jingrong (91)
The Showy Style of Life of the Lirerati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 ties—Jottings on Reading the History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Hu Shouwei (96)
Mr Fang Xiaoyue's Way of Doing Scholarly Research	Li Xinkui (101)
Socialist Literature and Art and the Communist Ideal	Huang Zhanren (108)
Qiu Fengjia and His Poems.....	Yang Hua (112)
Huang Zunxian's Ideology as Reflected in His Later Years' Letters to Liang Qicao.....	Wang Songtao (119)
Special Implications of the Term "Liang Zhou" in Som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Gao Chenye (125)
Random Notes in Reading	
Recent Academic Trenes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矛盾理论在 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两
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的贡献

张江明

在我国对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又处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矛盾？有什么矛盾？如何正确解决这些矛盾？这是从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这个新的变动，抓住了新提出来的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哲学上作了回答。这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起着长远作用的。

（一）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很早就提出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就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研究，当然，还不可能作为重点问题提出来。那时候，最紧迫的问题是认清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发展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强调研究矛盾的对抗性，要教育、团结、发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而对社会主义矛盾问题只能作一些有远见卓识的科学预测，不可能讲得很具体。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既肯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又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经济、道德、精神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在按劳分配中存在“平等的权利”和“不平等的权利”的矛盾，以及在智力或体力上的不同而造成差别。恩格斯在《社会主义

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存在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矛盾，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消除它们之间的对立和分离，实现“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共产主义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列宁看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认为在那里，对抗消失了，矛盾还会存在。还讲到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新旧事物的矛盾，工人内部的矛盾，工会内部的矛盾，工农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等等。但因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胜利不久，社会主义社会还未建成，非对抗性矛盾未充分暴露，人民内部矛盾不突出，所以，列宁对这方面的问题来不及展开论述。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讲得较多，他分析过苏联内部的工农矛盾，集体农庄内部矛盾，以及民族矛盾等，曾经提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结合内部的矛盾”，而无产阶级和富农的矛盾则是“结合范围以外的矛盾”。但是，斯大林这个正确观点没有得到继续发展。他有时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统一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有时却不讲斗争性的作用，只把政治上、精神上的一致看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适合；后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矛盾，但没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来研究。他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宣布资产阶级和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起了新的变化，这是正确的。但不久，却认为苏联国内的阶级斗争越来越

尖锐，看不见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存在，造成阶级斗争和肃反的扩大化，带来了损失。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推动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实践的基础，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

毛泽东同志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总结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增添了新的篇章，主要表现在：

第一，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充满着矛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统一起来，克服了形而上学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曾经有一段时间，党内和党外、国内和国外对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所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或者只能找到一些矛盾，不是普遍现象；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存在差别，但差别并非矛盾，至多是正在熄灭的矛盾，等等。他们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裂开来，似乎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就会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如果是这样，对立统一规律就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个规律便要修改了。毛泽东同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充满着矛盾，当然，社会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情况和性质是有区别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在于是否存在矛盾，而在于它的矛盾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这是以往任何社会制度都不可能的，包括原始共产社会在内；至于资本主义制度更不可能，只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它，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则不是离开社会主义制度，更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我否定、自我革新的强大生命力，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自身的不断完善来解决，因而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第二，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创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制定了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针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对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什么矛盾不大清楚，众说纷纭。虽然，人民内部矛盾早已存在，但还没有从理论上

加以集中的论述。到了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越来越突出，如何作出哲学的总结，是个很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敏锐地抓住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课题，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引的方向，全面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状态，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观点，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创造性地确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理论，阐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原则和公式，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运动的力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谱写了崭新的一页。

第三，捍卫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应用到社会主义社会中来，提出和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指明了矛盾的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比较早就提出包含有社会基本矛盾的观点（虽没此词句，但有此精神），认为社会的发展是从生产力开始，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同生产关系发生冲突，从而引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大变革。这是马克思研究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的指导原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最初表述。毛泽东同志的最新成果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概括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指明正是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通过它们之间的又适应又不相适应，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克服了强调统一否定斗争，或强调斗争取消统一的片面性。还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以及敌我矛盾存在的原因。这都是很新鲜的见解，寓意是很深刻的。

第四，阐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总题目，分析了工作着重点转移的客观必然性，提出要“向自然界开战”，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党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如果说过去国内的敌我矛盾很尖锐，阶级斗争很激烈，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被掩盖起来，那么，随着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变化，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日益显著，迫切要求作出正确处理。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分析

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基本估计，阐明了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关系，论证了不能把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完全等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工作重心的转移，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途径和方向。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是很丰富的，以上是几个新的重要成就，这是他的主流。下面，我们就其中几个重要贡献，作一些具体阐述和说明。

(二)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理论作出的一个贡献是，从哲学思想上划分社会矛盾的不同性质，把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联系起来，初步下了一个科学定义，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是一门科学，要求我们用科学态度深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发展规律，这对于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很重要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能否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是社会主义事业能否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同志比较早就对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作了初步的科学论述。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写的《矛盾论》中从斗争的形式上阐明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存在，认为无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党内斗争，都是有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的，对抗只是其中一种斗争形式，并不是所有的斗争都采取对抗的形式。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同志根据二十年来国内和国际的斗争经验总结，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从矛盾的性质上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同志认为，只讲斗争形式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理论上区分矛盾性质的所谓对抗和非对抗”，把它们区分开来是“多此一举”。（见徐冲德：《“对抗性矛盾”的概念为什么讲不清楚？》1980年7月10日《光明日报》）这个看法是对的吗？否！这不是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而是向后退。应该认识，从阐明矛盾斗争的形式，进而提出区分矛盾的性质，并不是随意的拔高，而是客观实际发展的合乎逻辑的反映和概括。这种概

括，使我们不仅从斗争形式上认识矛盾，而且认清事物矛盾的本质，尤其重要的是从性质上分清两类不同矛盾的界限，按照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方法，作出正确的处理，避免混淆矛盾性质和政策界限的错误。这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十分必要。

毛泽东同志对什么是对抗性矛盾，从理论上作了符合于科学的概括，认为：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就是“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即是用“革命和革命战争”来解决的矛盾，这就叫做对抗性矛盾。在“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旧矛盾产生新事物的现象”，都是属于对抗性矛盾（《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308页）。这种“外部对抗”和“外部冲突”，根据各个事物的具体情况，有着不同的特点，不能认为只有一种模式，没有任何区别。列宁讲到下定义时，认为只能从最高的原则，从更广泛的概念中，作简明扼要的概括，确定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不可能、也不必要定得太具体，包括庞杂的内容，以保持定义的稳定性和科学性。毛泽东同志用“外部对抗”或“外部冲突”作为对抗性矛盾的定义，是符合于列宁关于下定义的精神的。所谓“外部对抗”，是指不能经过矛盾统一体内部的斗争来解决，而是在它的内部不能相容，转化到矛盾统一体之外通过物质力量对抗的剧烈冲突，进行谁胜谁败的斗争，最后是一方吃掉一方或同归于尽。例如，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采取暴力革命或战争的形式夺取政权，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就是“外部对抗”或“外部冲突”的集中表现。

有的同志认为，对抗性矛盾的概念“比较费解”，“往往愈讲愈糊涂”，因此，不同意用“外部冲突”作为对抗性矛盾的根据和定义，提出用“解体冲突”还是“非解体冲突”作为区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的标准。他们认为“外部冲突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可以“区分为解体冲突和非解体冲突两类”。我认为毛泽东同志阐明对抗性矛盾的道理是清楚的，界线是分明的，论证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不是“愈讲愈糊涂”，更不能用是否“解体冲突”来代替毛泽东同志关于对抗性矛盾的定义。因为第一，任何事物的矛盾发展到最后，从旧事物变为新事物，必然是旧的矛盾统一体“解体”，新的矛盾统一体产生。请问：如果旧的统一体不“解体”，新的统一体怎能出现，非对

抗性矛盾虽有特殊性，但也不例外。第二，“冲突”是有特定涵义的，是指两种相互反对的强力撞击，例如暴力冲突，或炸弹的爆炸，一般上适用于对抗性矛盾，如果同时用到非对抗性矛盾中来，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线。第三，把“非解体”和“冲突”放在同一个范畴，概念不明，逻辑混乱。这是不科学的。

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联系起来，把哲学和政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哲学在指导实际工作中的作用。当然，对抗性矛盾不能和敌我矛盾完全等同。因为在自然界也有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是进行敌我之间的斗争。而在社会上的敌我矛盾，必然是属于对抗性矛盾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把哲学上的两类矛盾和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类矛盾联系起来，而且提出以是否利益根本一致作为划分两类社会矛盾的依据。还阐明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的复杂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在阶级利益上是根本对立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一定历史条件之下，某些剥削阶级也包括在人民的范围之内时，“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4页）这种分析是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

有的同志认为，把哲学“直接引入政治领域，把对抗和非对抗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等同起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问题。”我们应明确认识，哲学和政治是有密切联系而又有区别地结合在一起的，不能简单地把两者看成相等，也不能割裂开来。人们的政治生活实践、阶级斗争实践（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来源。完全脱离政治的哲学、不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哲学，是不存在的。同样，政治也不能离开哲学。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列宁选集》第2卷，第378页）所以，那些割断哲学和政治的联系是错误的，这不是从外面将哲学“引入”到政治里面来，因为在政治领域中本来就存在政治哲学。而“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漩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我们的使命是把哲学

和政治辩证地有机地正确地结合起来，不要把哲学的引入政治变成“硬套”到政治中来。实践证明，毛泽东同志把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同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相联系，并不是简单地把这两者看成“等同”，这在哲学上政治上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尤其是政治上的意义更大。这可以使我们在政治上自觉地严格地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避免混淆敌我的错误；可以集中力量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可以更广泛地把人民的力量团结起来，壮大人民的力量，促进人民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

毛泽东同志认为，“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7页）恩格斯曾经说过，自从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以来，要求人们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和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我认为，恩格斯这个观点，对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是很适用的。

用科学态度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首先要把毛泽东同志关于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哲学思想，看作是发展的，不是停滞的。因为科学是无止境的，总是不断地滚滚向前，真理是没有尽头的，不可能达到穷尽的境地。毛泽东同志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学说奠定了初步的科学基础，还有许多工作需要继续去完成，还要进一步完善和丰富。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要不断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继续推向前进。

要把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必须充分重视在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探索和掌握两类矛盾发展、变化的规律。科学是认识和反映客观规律的，这是任何一门科学所以成立和存在的基础。两类矛盾的发展也是有客观规律的。在自然界，很早就有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并且永远存在下去的。人类生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实际上便有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和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划分，但还未有从理论上概括起来。到了社会主义时期，无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或基本完成以后，两类矛盾还将长期存在。

当然，这两类矛盾的比重、分量、范围是有区别的，不能看作完全一样。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越是从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地朝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向迈进，人民内部矛盾越是普遍突出，敌我矛盾的范围越来越小，以至于最后消失；到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敌我矛盾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是有发展规律的。我们研究清楚它的发展规律，按照这个规律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取得更大成果，促进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并使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这门科学更加完善、丰富，发挥更大作用。

(三)

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又一个贡献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及时地指出：“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7页）还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主义社会不同性质矛盾的关系，提出了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原则和方针，对于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深远意义。

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以后提出来的。在解放前，不可能成为主题；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也不可能成为主题。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是和主要矛盾的转化、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结合在一起的，只有在这时候，大量的突出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成为总题目。

这个主题是一个总开关，它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盘工作。能否处理得好，对国家的盛衰成败有左右全局的意义，足以影响和决定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途和方向。所以，我们必须十分重视这个主题，紧紧地抓住主题，作出正确处理。

这个主题贯串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各个方面，表现在各种问题之中，成为理解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关键，只有把这个主题弄清楚，才能把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根本不同性质区别开来，认清社会

主义社会矛盾的主流和本质，找到解决矛盾的锁匙。

这个主题不是孤立的，它还有副题，总题目下有分题，有多层的题目。例如，除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之外，还在一定范围内有敌我矛盾存在，而且可能在某种条件下进行激烈斗争。就人民内部矛盾来说，并不是简单地只有一种矛盾形式和固定的解决方法，而是包括有多方面的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内容，需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

自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后，人民内部是否存在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分歧较大。我认为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呈现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要作具体分析，要看到历史发展过程，大致上有四种情况。

一是人民内部存在着一个从有阶级斗争到没有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人民这个概念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在我国的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容。毛泽东同志使用“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时，是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在人民的范畴之内，因而在人民内部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已经消灭，特别是作为资本家阶级已经不存在，已经改造为社会主义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当然在人民内部不存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是一个发展过程。

二是阶级斗争反映到人民内部中来，这是不可避免、经常发生的。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总是不断地对人民内部发生作用和影响。从接受这种影响来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例如有的人由于受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以至出现腐败现象，这些都不是社会主义工人、农民和领导干部所“固有”，而是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造成的。我们同这些现象作斗争，不能简单地说就是阶级斗争，而是一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不同程度的反映。但是，如果阶级斗争的反映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也会变为阶级斗争。我们必须正确认识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反映这两者的联系和区别，从性质上来看，阶级斗争的反映主要是受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问题，大量的思想意识

方面的问题（也有经济上政治的问题），只要没有超过一定的限度，仍属阶级斗争的反映，或带有阶级斗争因素的问题。这同那些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阶级敌人与我们进行阶级斗争是有原则区别的。从受影响的人来看，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如果已经变为敌对分子或阶级敌人，这就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是尖锐的阶级斗争了。

三是在我国社会主义中大量存在的是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各种社会矛盾。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公有制，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不同形式，存在三大差别，存在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矛盾。这些差别和矛盾，虽然大量地从物质利益上表现出来，但不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都不从属于阶级斗争。在人民的范畴里，由于各个社会成员观察问题的方法和角度不同，文化教育程度和思想觉悟不同，这就出现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的区别，表现为认识上的种种矛盾，只要不牵涉到党的重大原则问题、路线问题，一般是和阶级斗争没有直接关系的。对于这些大量的不属于阶级斗争范围的社会矛盾，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区别矛盾的性质，坚持采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来解决，不能用阶级斗争来解决。

四是人民内部出现了腐化变质分子、新的反革命分子，转化到敌我矛盾方面去。有的原来属于人民的成员，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腐蚀，逐渐地腐化变质，成为经济领域上的严重犯罪分子以及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这就不是人民内部斗争，而是转化为阶级斗争，这样的人就从人民内部划了出去，矛盾的性质起了变化，决不能以此作为人民内部存在阶级斗争的论证。

我们从以上四个方面可以看见，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是有着复杂的多种的关系，不能用简单化、绝对化的观点来观察，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才能符合于客观实际。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是现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人和人关系上的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从总的来说，由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

制占居主导地位，人和人之间是平等的互助的同志式的关系，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马克思主义是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一切法律和法令都是根据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制定，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这是基本的、主要的方面。但在它们之间还有不适应的地方，例如，旧的生产关系和旧上层建筑的残余，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经济管理体制和政治体制不够完善和存在一些缺陷，以及少数受资本主义思想腐蚀较深和革命意志薄弱的人，乘机钻空子，在生产和流通领域进行贪污盗窃，投机诈骗，走私行贿等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等等，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相对立的。从总的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在基本适应情况下的矛盾，是能够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求得解决的矛盾。因此，这个矛盾表现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人民内部矛盾，它也受阶级斗争的影响，但不产生阶级对立，也不采取阶级斗争形态。而旧的生产关系和旧上层建筑的某些残余存在，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敌我矛盾的根源，作为这些残余的阶级代表，则是旧的“剥削阶级残余”的存在，而且还有可能在这些旧的遗迹上产生某些新的剥削分子、腐化变质分子，反革命分子，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抗性矛盾，同他们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或者说是阶级斗争的遗留。

（四）

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哲学思想又一个贡献是，提出对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方法去解决。毛泽东同志全面地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国家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专政方法解决敌我矛盾，尤其是确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加强人民的团结，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并贯串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中，有社会主义工人、社会主义农民和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相互之间以及他们各自内部的矛盾，有国家机构中的体制不合理以及官僚主义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有全民所

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和国家之间的矛盾，有经济管理中和分配制度中的矛盾，等等。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通过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科学、以及民事纠纷等表现出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既要有总的原则，也要有多种方法。毛泽东同志根据人民内部矛盾多样性的状态，提出了用民主方法从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文化科学上和法律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第一，毛泽东同志“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种民主的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叫做‘团结——批评——团结’。”即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9页）这是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原则，总的指导思想，总的方针。

团结、批评、团结是一个互相联系、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统一整体，它们是不可分割而又有所侧重的。在这三个环节中，第一个环节是出发点，第二个环节是关键，第三个环节是根本目的。我们必须完整地理解，全面地应用。

第二，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对文化艺术和科学思想上的矛盾，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文化科学领域的应用，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在文化科学思想领域，不仅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思想的矛盾还将长期存在；而且在人民内部对待文化科学问题上，由于认识的不同，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文化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上不同学术观点、理论观点，这是客观世界矛盾多样性的反映，也是人们主观认识的差别造成的。正确地解决这些矛盾，不能单纯地用“堵”的方法，而是要用民主的方法，疏导的方法，“齐放”和“争鸣”的方法，在进行探索、互相交锋的竞赛和斗争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事业。通过民主讨论，互相商榷，“争鸣”，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正确的先进的东西，清除错误的落后的东西，用马克思主义战胜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和影响，用真善美来克服假恶丑，以便扶正祛邪，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科学，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精神文明。“双百”方针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它同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文化专制主

义都是根本对立的。实行这个方针，可以使文化科学上的各种矛盾，尤其是矛盾对立面之间的表现、看法、关系充分地摆出来。经矛盾的对立斗争和统一，求得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保证社会主义的质的规定性占居主导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民主和群众路线在思想文化科学领域的体现。

第三，解决人民内部在经济上的矛盾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发展社会生产，满足社会需要。我国人民在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又存在着矛盾，首先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又是一个经济上不发达的穷国，既要进行经济建设，发展文化科学，又要逐步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的国家是代表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但和生产单位集体利益以及生产者的个人利益之间也会发生矛盾，这是全局和局部、整体和部分之间的矛盾。此外，在实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劳动人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和物质利益上还有差别，这也会产生人民内部经济上的矛盾。所以，不仅要有正确的政治方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必须从经济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的矛盾，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要实行三兼顾，即是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正确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又要照顾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对于国家的任务，集体的积累，生产者个人收入这三个方面都要兼顾，适当处理，不要只顾一头，丢掉另一头。

要使人民内部矛盾，尤其是经济上的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归根到底，是要不断发展生产，使社会生产力有高度的发展，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并创造条件逐步地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是解决人民群众在经济上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党的最终目标。

第四，要学会应用社会主义法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过去往往认为法律只是用来对付阶级敌人、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社会主义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社会主义法律除了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以外，还担负着解决和调节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职

责，这也是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式。我们要善于运用社会主义法律调整 and 解决国家机构以及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同公民之间的矛盾，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要通过法律保护社会主义公有制，保护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保护各个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保护一切公民的合法收入和财产，不容侵犯。同时，要依法制裁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制裁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投机诈骗等不法行为，以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还要善于运用社会主义法律处理人民内部的民事纠纷和刑事问题，包括经济利益、财产关系，国家纪律，社会秩序，公共安全，人身权益，家庭婚姻，等等。“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6页）

以上讲的是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在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以后，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敌我矛盾。因为还有反革命分子和敌特分子，严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犯罪分子和经济领域的严重犯罪分子，腐化变质分子和新剥削分子，还有“四人帮”的某些残余，没有改造好的极少数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旧剥削阶级的某些残余。并且，国内阶级敌人和国际阶级敌人、国内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有密切联系，这些阶级敌人的数量不多，但能量不小，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形成一股势力，同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进行斗争。因此，决不能麻痹大意，放松警惕。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對抗性的

敌我矛盾，还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敌我矛盾属于根本利害冲突的对抗性矛盾。根据我国的经验，用专政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时，应着重做好以下几个工作：第一，为了维护、巩固和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阶级敌人、对破坏、危害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专政，就是说在必要时期内，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强迫他们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第二，专政不是简单地从肉体上消灭；对被专政对象，要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按照罪恶大小、态度好坏，给予不同的处理，只有少数罪恶严重，民愤极大的才予以枪决；对大多数被专政对象主要是强迫他们从事劳动，并在劳动中改造为新人。被专政对象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死心塌地的顽固分子是少数。第三，实行专政必须依据国家法律，通过法律程序，任何个人不能随便宣布对其他人实行专政。第四，专政工具只能用于对待阶级敌人，不能用到人民内部来，不能对人民实行专政，不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第五，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根据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制定方针政策，通过国家法律和政法机关体现出来。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是代替专政。

总括起来，只有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不同性质，采取民主方法和专政方法的不同方针，才能正确解决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增强人民的团结，调动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伟大胜利。

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了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

王致远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全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已经逝世一百周年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为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已由理想变成现实，世界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再一次证明科学社会主义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颠扑不破的普遍真理。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回顾中国如何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在哪些方面发展了这个学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来正确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用新的实践经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

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批判地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科学。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它是关于劳动人民解放条件和性质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的古典哲学，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秘密，阐明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

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7页）

空想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但是，它不能为劳动人民指出真正的出路。因为：第一，它没能阐明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没能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第二，它没有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它要求通过宣传、试点示范，甚至劝说富人，求助于统治阶级，来实现社会主义，这纯粹是一种幻想。它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要把它从空想变成科学，就必须抛弃历史唯心主义，把社会主义建立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社会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任何社会阶级，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因此，社会变动的原因，不应该从人们头脑中去找寻，而应该从社会生产方式中去找寻。马克思把历史发展的规律作了极为精辟的概括。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

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83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观察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研究的结果,发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原来资本家的利润来源于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就是:社会化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个基本矛盾又表现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和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基本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使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一部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由于生产的相对过剩而闲置起来。这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不能解决的。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这就是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要胜利的内在根据。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前提,而且为它自己准备了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世界。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它使担负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解放的条件和性质,为完成这一伟大的使命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但阐明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而且对未来的新社会作了科学的预见,为世界无产阶级进入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示了基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即社会化大生产,是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他们指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现共产主义,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二)“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39页)社会主义之所以必然要胜利,正是由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社会化生产力,从而解决了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马克思说:“英国工人阶级既然创造了现代工业的无穷无尽的生产力,也就实现了解放劳动的第一个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7页)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代替资本主义而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应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他们设想社会主义的这个基本特征,是以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典型的。当时英国已基本消除了小生产,全社会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是比较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这样的国家里,无产阶级一旦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自然要把资产阶级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归由全社会占有。

由于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社会生产也就是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生产。“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3页)

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生产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就决定了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劳动直接作为社会总劳动的构成部分。那末,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就应以他对社会所提供的劳动量为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构想了新社会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对新社会的上层建筑作了勾划。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消灭了剥削和私有制的社会,不再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差别。恩格斯指出: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1页)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也就开始消亡。马克思指出:“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637页)在观念方面,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1~272页)那个时候的人是觉悟很高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在未来的新社会,人将“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实现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3页)

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用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真理,武装了全世界劳动人民,为他们指明了求得彻底解放的道路,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一百多年来,这个理论鼓舞、动员、组织、指导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使之不断获得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证明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南。

但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不是包开一切锁头的万能钥匙。不能以为有了它就可以万事大吉。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典型的。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当时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垄断阶段;而他们自己也没有亲身经历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因而他们不可能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一切细节,描绘出详细具体的蓝图。特别是他们没有系统地论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我国这样一个原来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要具体运用这一理论去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就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国解放前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势力,盘根错节,无孔不入。社会化大生产不发达,存在着汪洋大海一般的小农经济,它基本上是自然经济。在总人口中,工人阶级只占少数。国家穷而弱,教育、科学事业落后,文盲众多。这样的国家同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很大的不同。我国能够进入并建设社会主义吗?怎样才能把这样的落后大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直在叫嚷: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得解放,就必须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既不能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唯一的办法,只能靠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自己去探索,去创造,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认识其特点,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具体道路。没有秘诀,也不能走捷径。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正是这样一再教导和告诫:“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

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60页)“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8页)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开始的。

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成功与失误

科学社会主义既然以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典型,那末,我国在运用这一理论的时候,首先就必须解决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进入社会主义、怎样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恩格斯逝世以后,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能否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一直有着争论。以考茨基、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们,把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提出了被斯大林称为“庸俗的生产力论”的错误论调,说什么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国家,不应该去进行革命,而应该等待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即使这个国家存在着革命形势,也是这样。他们,包括俄国的孟塞维克分子苏汉诺夫在内,把这个论据奉为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以此来反对十月革命,攻击列宁,说什么“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因而进行十月革命是错误的,甚至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列宁尖锐地批判他们,指出:他们都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却迂腐到了极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是一窍不通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89页)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而不能想象对这条道路的某些改正。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同上书,第690页)“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究竟在哪些书上看到,说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有或不可能有这类变化的呢?”(同上书,第692页)

列宁的观点是他对帝国主义加以考察、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诚然，列宁同样肯定，资本主义生产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存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的大工厂，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但是，他指出，革命究竟在哪个国家首先爆发，首先取得胜利，却不是由生产力水平高低来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后，资本的高度集中、垄断的出现，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更加深刻，更加激化，它把世界资本主义结成密切相联系的链条。在帝国主义互相火并的时候，这一链条最薄弱的环节，即世界矛盾的集中点，无产阶级如果有正确的指导，就可能突破这个薄弱环节，首先获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因此，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不应该坐等生产力的发展，而应该不失时机地去进行革命，首先夺取政权，然后再利用政权的力量去迅速发展生产力，赶上发达的国家。列宁就是这样创造性地解决了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在经济比较欧美国家落后的俄国获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走在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前面，首先进入社会主义，开创了十月革命的道路，鼓舞了东欧和东方各国的劳动人民去夺取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以后的历史进程，证明了列宁这个观点的正确性。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特别是运用列宁这个观点而取得伟大的胜利的。在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者重复了考茨基、苏汉诺夫的错误，认为中国经济落后，不能进入社会主义。党和无产阶级不应该立即去夺取政权，而应该让资产阶级去领导民主革命，等待资本主义发展了，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就是所谓“二次革命”论。右倾投降主义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分析了中国的实际状况，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制订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从而为中国革命拨正了航向。毛泽东同志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先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不是旧的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再由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也不应照搬俄国的经验，而应根据中国的特殊性，

走有别于俄国的特殊的革命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解放全中国。这条正确的道路，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找寻这条革命道路，实行这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经过尖锐、复杂的斗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才取得的。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经过二十八年的英勇斗争，我国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夺取了政权，就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政治前提。但要进入社会主义，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经过短时间的恢复国民经济，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以后，我们党即于1952年及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一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的路线。它创造性地反映了中国的特点，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因而顺利地于1956年冬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4页）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所获得的伟大成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近年来，在我国理论界讨论社会主义及其发展阶段问题的时候，有人认为，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社会化大生产不发达，五十年代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过渡时期也结束得太早。有人甚至认为，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农业社会主义”、“封建的社会主义”。有的人主张现在应该还是过渡时期，有的人甚至主张应该退回到新民主主义阶段上去，否则，就是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这些论调既不符合我国的实际，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用教条主义态度来对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用一个形而上学的框框来生搬硬套，从而否定我国活生生的社会主义。究竟是用理论来检验实践，否定实践，还是用实践来检验理论，发展理论？这就是争论的实质。

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这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当然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但是，问题在于：第一，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是把它看作发展的理论，行动的指南呢，还是看作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马克思、恩格斯既没有具体规定进入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的绝对数字，也没有说经济落后的国家不能进入社会主义。既然列宁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却置之不顾？第二，如何正确估量我国的经济状况。确实，我们所继承的旧中国的家底是很薄弱的，资本主义没有充分的发展。但是要看到，官僚资本主义却很集中。它占我国资本主义经济百分之八十，而且多属国民经济的命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把它没收，转变为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这就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初步的物质基础。尽管这个物质基比较薄弱，但终不能说中国没有社会化大生产。何况这个物质基础，在解放以后又获得很大的发展，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导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是不能低估、忽视的。说我国现在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更不符合我国实际。

中国可以而且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那末，我们能够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吗？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才是正确的、有成效的？这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必须回答的又一个问题。

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历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有成就，也有挫折；既有成功，也有失误。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但挫折也是严重的。

经过三十年的建设，我们已建立了初步的物质技术基础，有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工业固定资产1980年和1952年比较，增长了二十六倍多，达到四千一百多亿元。农业生产条件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生产水平有了提高，农业机械化不断增加，现代化农业有所发展，基本上保证了十亿人口吃饭穿衣的需要。现在，我国的粮、棉产量占居世界第二位，原煤、水泥居第三位，钢居第五位，原油居第六位。全国拥有252万台金属切削机床，仅次于美、苏两国，居世界第三位。我们不但已能够制造汽车、机车、轮船、飞机，也已经能够制造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运载火箭等尖端产品。某

些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文化、教育、科学、技术事业也有所发展，培养了一批经济文化建设的骨干和各方面的人才。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国力也有所增强。这些成就，我们不应忽视或低估，不应妄自菲薄。当然，从一个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来看，这些成就只是初步的。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数字是比较低的。但应看到，我们的起点比较低，家底比较薄，十亿人口的消费量很大；而且，如果不是由于我们指导上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本来我们是应该和能够取得更大成就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指导上有什么失误呢？总的说来是犯了“左”倾错误，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规律，急于求成，急于过渡，以致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到挫折和损失。具体说，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没有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反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进行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既伤害了一些人，又挫伤劳动者的积极性。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在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之后，就应该着重去发展生产力。特别是由于我国原来经济比较落后，更应该象列宁所说的，利用政权的力量迅速发展生产力，以赶上经济发达的国家。党的“八大”对这个问题本来有正确的分析，并据此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但是由于党的领导对形势的分析和对国情的认识有主观主义的偏差，“文化大革命”前就有过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后来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以致“八大”路线不但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反而受到批判。主要矛盾抓错了，就影响到全局。这种把上层建筑而不是把生产力看作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因素的观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而是历史唯心主义。这是最大的失误。

其次是，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企图单纯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八大”正确指出，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应该从解放生产力转到发展生产力。刚刚建立起来的崭新的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已为生产力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就应该维持它的相对稳定，进一步巩固它、完善它，使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形式。但是由于片面夸大生产关系的反作用，甚至错误地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生产关系对生产力起决定作用，因而在实践上就不断去变革生产关系，人为地使生产关系的改革超越生产力的水平，从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破坏了生产力。这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基本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二十年中农业生产关系几乎时时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中。在“趁穷过渡”的指导思想下，初级社成立不久，就迅速过渡到高级社。高级社还没有巩固、完善，它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又迫不及待地、一哄而起地过渡到以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建立起来了，又以一些假象为依据，企图迅速地从小集体过渡到大集体，甚至总想尽快地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人民公社这种制度下，农业的经营管理效率很差，“一窝蜂”、“大呼隆”，瞎指挥、强迫命令，高指标、高征购、浮夸风，既不科学，又不民主。在分配上则是搞平均主义，刮“共产风”；干部多吃多占，挥霍浪费严重。糟蹋了农民的劳动成果，农民生活难以改善。这样，就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生产发展缓慢，甚至有的地方连饭都吃不饱。农业如此，其他方面也有类似情况。在政治上，就是搞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个教训十分深刻。

再次，由于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长期表现急躁冒进，超越国力，违背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从而遭受到历史的惩罚。突出的事例是五十年代后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要求通过建设小高炉，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通过人民公社这一“天梯”登上共产主义天堂。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浪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损伤了国家元气，使全国人民生活持续三年处于十分困难状态。这种超越国力，急躁冒进的错误，还由于经常反“右倾”反“冒进”，而根深蒂固，难以彻底纠正。一当形势好转，又有所冒头。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又发生了“洋跃进”的错误。

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能够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

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的历史性转折。从此，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又蓬勃发展起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从各个方面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地阐明了许多从实践中提出的有关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的十二大继承和发展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制订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宏伟纲领，为全国人民指明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和道路。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精辟地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是对“十二大”精神的高度概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方针。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反映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共同规律。但这个共同规律在各个不同国家的实现，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普遍性即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各国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根据各自国家的具体实际，探索本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殊规律，找到本国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列宁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主义者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索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3页）

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道路，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特别是要具体分析我国现实生产力的状况。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就是建立和发展能反映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我国原有的生产力水平是比较低的。经过三十年的经济建设，已有较大的发展和提高。但是总的来看，和经济发达的国家相比较，还是低的。这主要表现在社会化大生产还没有普遍发展到一切经济部门，尤其是农业部门。按人口平均计算，

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比世界发达国家落后10至20年。而且，我国生产力是多层次的：有的生产部门已经机械化、自动化，有的是半机械化，有的是手工劳动，有的是人力加畜力，有的生产工具很简陋，甚至还是原始状态的刀耕火种。从地区来看，从各经济部门来看，从每一个经济部门的内部结构来看，生产力的发展也是极不平衡的。农业和工业比较，差距甚大。西藏和上海比较，相差也很远。根据这种实际情况，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必须集中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社会主义社会打下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以补偿“先天不足”。所谓现代化建设，从经济上来说就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5—56页）那末，从我国现实生产力的状况出发，我国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应该是怎样的呢？

第一，从我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生产力水平较低，多层次、不平衡这个实际情况出发，我国当前的生产关系必须是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多层次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所有制方面，应以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主，同时，容许多种经济形式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既要是统一的，又要是多样的。还不能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立即建立全社会所有制。由于我国原来社会化生产不发达，小生产者众多，不但集体所有制这种公有制形式还要更长期存在，而且要采取更灵活的多种过渡形式，不能照搬苏联集体农庄的做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劳动者个体经济存在，不但可以补充公有制经济的不足，而且有助于解决充分就业问题。允许外国资本和侨、港澳同胞的资金来中国内地投资，可以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市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象我国这样原来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能不能立即建立完全的、发达的社会主义？我们能不能利用一

些旧形式和过渡形式甚至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究竟社会主义是一个统一的固定的模式，还是本质相同，形式多样？是一个阶段的还是多阶段的？马克思当时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为典型来设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的，但他也明确指出，这种新社会不能不带有它脱胎而出的社会的旧痕迹，何况我国原来就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几条，不能逾越，不能变通，那我国办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甚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等，在这些同志看来，岂不是成为社会主义的异端？其实，采取这些具体形式，并不是离开社会主义，而是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

第二，从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水平出发，适应我国存在着多种经济形式的具体情况，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必须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全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产品的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已经不存在。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曾试图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但是，在实践上行不通，不得不改正错误，实行新经济政策，恢复商品交换，恢复银行职能。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有重大的成就，但是，他也长期地限制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一直到晚年，才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经济。但是，他仍然不承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品是商品；认为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不起作用。苏联经济长期没有搞活，与这种观点是有联系的。

我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中，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问题，也曾发生长时间的争论，提出了种种的看法。十一届六中全会对这个问题作了结论，确定：社会主义经济的经营管理，应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大”进一步补充：计划管理要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两种；小商品的生产 and 流通则由市场调节。我国这种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创造性地解决了长期争论的社会主义经济应如何经营管理的问题。

六中全会还强调，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对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的我国来说，尤有重要的意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

的结果。商品生产发展到劳动力成为商品，货币转变为资本，就产生资本主义。我们不能退回去发展资本主义，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促进生产社会化。发展商品经济，可以促进社会劳动分工，增加产品的花色品种；可以促进流通，活跃市场，更好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可以通过竞争加强企业经济核算，导致技术和设备的改进和更新。总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既可以使生产社会化，又可以搞活经济，迅速发展生产。这也是反映我国特殊性的重大决策。

第三，在农、工、商业中推行经济责任制，特别是在农业中，推行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列宁说：“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6页）当然，造成新的、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主要靠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技术，新的生产方法。但是调整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也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造成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这是一个必须在实践上具体解决的十分困难而复杂的问题。事实说明，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一建立，就自然而然地会出现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没有新的技术和设备，没有从生产关系上找到同生产力状况和人的觉悟程度相适应的具体形式，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困难的。即使一时有所提高，也不能巩固、持久。我国现在推行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把责、权、利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更好地体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企业民主管理和按劳动分配个人消费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具体体现了列宁提出的物质利益原则，把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统一起来。推行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劳动者或企业承包一定的经济责任，有进行生产或经营的自主权，劳动成果与企业利润或个人收入密切联系起来，这就使生产和经营有了强大的内在动力，从而大大激发了劳动者和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包”是“统”和“分”的统一，是当地条件

下的“标准产量”。超过这个“标准产量”的超额劳动，归承包人所得，这能更好地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纠正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因此，威力很大，不论在农业、工业、商业，都是“一包就灵”。

我国农村推行的各种生产责任制，特别是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家庭承包责任制，适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实际，因而时间虽短，成效显著。凡是推行这种责任制的地方，都是生产迅速改观，农民较快富裕起来。为什么“双包”责任制有这么大的威力？这就因为这种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适应我国当前农村生产力的水平和发展要求。

我国农村生产力水平，比较城市工业还要低得多。三十多年来虽然灌溉面积、机耕面积有所增加，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变，但是总的来说，基本上是手工劳动加畜力的半自给经济，缺乏多种经营，专业分工不发达，商品率很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很不发达，组织管理的能力也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劳动生产率很低，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只能养三人左右。在这样的生产力状况下，如果生产关系公有化程度太高，生产规模太大，实行集中劳动，统一管理，平均分配，就将压抑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双包”责任制，不但纠正了上述的弊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而且也促进了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由于发挥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从而可以腾出一部分劳动力去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农村的商业、服务业，促进劳动分工，发展专业户、重点户，改变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可以促进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改变“小而全”的半自给经济；可以发挥能人巧匠的所长，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促使农民实行新的联合，产生更加适合农村实际的新形式的经济组织。总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促进农村经济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我国十亿人口，八亿农民，正确解决农业问题更具有极端重要性。农业问题不解决，不但影响全国人民的生活，而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将落空。自从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出现以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在农业上充分表现出来，这究竟是什么缘故？这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有一条是明显的，就是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不同，它在相当程度上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

约，很不稳定。自然条件是瞬息万变的，而且有时变化发生得很突然，几乎使人措手不及。这就要求劳动者应该有较高的自主权和机动性，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搞好生产，并且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另一方面，农村的活是很多的。男女老幼、大小强弱，只要安排好，都可以干一部分的活。把所有这些积极性都发挥出来，就是很强大的力量。我国农村推行的家庭承包责任制，能够比较好地适应农业生产的这些特殊性，因而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农村经济，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从农业上充分表现出来，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现在农村的大好形势正在方兴未艾地发展，可以预期，通过实践，我国农民将创造出更丰富的、更完善的经验，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特点，不但表现于生产方式方面，也表现于上层建筑方面，这就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要求，它将保证和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提到社会主义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但是，他们没有把它提到应有的高度。我国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看作是社会主义重要特征，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战略方针问题，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造性的重大发展。胡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列举了社会主义的五大特征之后指出：“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所以必要和重要，既由于它是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要求，也是出自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需要。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从一开始就朝着这个目标不断前进。当然，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每个不同阶段都有其不同的具体任务和实现这些具体任务的具体政策。这些具体任务和具体政策，既与最终目标的实现有联系，又有差

别，不能互相混淆。但是，总的说来，每个不同的阶段都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终目标的必要的准备。社会主义社会是向着未来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目标不断前进的，这个进程当然要为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准备高度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物质财富的增长，还必须依靠人们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不断提高和革命精神的不断发扬。这就要求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状况来说，“如果忽视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在全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个伟大的任务，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就会陷入片面性，就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仅仅限于物质文明的建设，甚至仅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追求。那样，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方向，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会失去理想和目标，失去精神的动力和战斗的意志，就不能抵制各种腐化因素的侵袭，甚至会走上畸形发展和变质的邪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是从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状况和经验教训中概括出来的带规律性的东西。我们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对外交往更频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比别省更尖锐、更复杂，因而我们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

社会主义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而且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劳动人民既然占有生产资料，是生产的主人，自然也是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只有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能使各项事业的发展符合人民的意志、利益和需要，使人民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才能对极少数敌对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制度是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运用这个理论指导我国革命，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既有成功，也有失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曾一度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

破坏民主与法制，对全国人民包括革命老干部在内实行“全面专政”。这个教训十分沉痛，值得永远记取。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主义民主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对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来说，仍然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国家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的改革，进行国家机关的机构改革，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提高工作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十二大”还提出，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努力实现这些任务，将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逐步完善起来。与此同时，我国还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已消灭了阶级、阶级斗争和阶级差别的社会。但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看，情况不完全是这样，特别是原来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十一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问题上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

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56页）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的。它创造性地反映了我国的特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消灭阶级的理论。

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是比较完整、全面的。这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按照我国的具体实际，从这三方面来建设社会主义，我国的社会主义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复杂、艰巨的伟大事业。实现这个任务，唯一正确的方针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一要坚持，二要发展。不坚持就不能发展，不发展也不能真正坚持。而要发展，就要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结合，也就不能发展。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并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我们对马克思这位世界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最好的纪念。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

更 正

现将本刊一九八二年第五期中的错字更正如下：

第81页右幅第8行：“纂母”应为纂毋

第83页右幅第1行：“泮”应为漕

第4行：“精”应为转

第85页右幅第3行：“实谓马”应为实谓也。

共产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前进

齐 云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了。他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事业战斗了一生。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的讲话里指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页）马克思使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为科学，又从理论进到实践，把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和共产主义的革命实践具体地结合起来，从而为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根本的方向和道路。

一百年来，尽管资产阶级拚命反对，机会主义竭力篡改，共产主义始终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继续前进。在我们中国，已经建立了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开共产主义。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不仅否认了现实生活中的共产主义的实践，也是对于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的曲解。

从空想变为科学

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论，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的。在欧洲，十六、十七世纪已经有了关于理想社会制度的描写。到十八世纪，开始有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出现了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以前的共产主义学说虽然在逐步的前进，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还没有普遍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还没有充分暴露，无产阶级还没有从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因而，同这种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共产主义学说也是不成熟的。这些学说，虽然具体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矛盾和尖锐地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病，但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本质和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们虽然宣传共产主义的合理性，主张以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但却不能指出走向共产主义的真正道路；它们虽然深切地同情和力图解救无产阶级，但却不了解无产阶级才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力量。总之，这些学说还建立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因而，它们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描绘和实现共产主义设想不免要陷入空想甚至幻想。所以，马克思以前的共产主义学说乃是空想的共产主义。

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渺茫的幻想”的观点，固然是出于思想上缺乏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坚定信念，而在认识上也完全混淆了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的原则界限。它完全否认了马克思使共产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伟大历史功勋。

1842年12月，马克思刚担任《莱茵报》主编，就接触到如何对待空想共产主义理论的问题。这时，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已经在欧洲取得了支配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发展成尖锐的对抗，欧洲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展了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共产主义正是在这种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才得以从空想变为科学的。

在答复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文章中，马克思认为，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缺乏现实性，更不能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但是，必须对它加以批判地研究。因此，当前重要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的实际试验，而是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论证，即把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承认现代无产者要求改变私有财产这种现实，力求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而不是教条地空想地预料未来，这就是马克思以后研究、探讨共产主义问题的出发点。

离开《莱茵报》后，马克思从正面探讨了共产主义问题。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性的研究，马克思开始认识到作为社会现实基础的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对国家与法的决定作用，这使他对共产主义的探讨迈出了新的一步。这时，马克思着重研究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的问题。他认为，这个任务的提出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遭受普遍的苦难，处于无权的地位，这是私有财产制度造成的。因此，必须通过政治革命，废除私有财产制度，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实现社会的解放。马克思指出，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摧毁，要把精神的力量和物质的力量、理论和群众结合起来，才能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在这里，马克思开始指出了与空想共产主义有所不同的思想。但是，他这时还受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主要从消除无产阶级和人类的异化现象来阐述共产主义的必要性，这就使他的共产主义思想仍然带有伦理道德的、甚至空想的色彩。

1844年，马克思移居巴黎后，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并同革命的工人运动、工人组织发生联系，这促使他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他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及其与私有财产关系。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着重从私有制的经济运动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及其发展。他指出，劳动和资本从起初的统一发展为互相排斥，最后变成敌对性的相互对立，在这种对立中，资产阶级是保守的方面，它力图保持这种对立；无产阶级是革命的方面，它力图消灭这种对立。这样，就揭示了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的发展趋势。而无产阶级的目的和历史任务正是由它自己的阶级地位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所严格地确定的，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随着无产阶级的胜利，无产阶级本身以及制约着它的对立面——私有制都趋于消灭。因此，共产主义是私有制经济运动，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指出：“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成是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的实际的历史活动，而把共产主义理论看成是对这种实际运动的理解和认识，这就开始把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但是，私有制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的发展趋势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及其发展究竟根源于什么更深刻的原因，马克思这时还未能加以科学的阐述。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马克思揭示、阐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本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面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系统地阐述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他们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也产生了质的飞跃。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每一个特定阶段，交往形式起初是适应于生产力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变成了生产力的桎梏，因而旧的交往形式就要被新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这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辩证运动的规律。人类历史上各种所有制形式、各种社会形态的更替，正是这一基本规律的具体表现。资本主义交往形式曾经适应于生产力，因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现在它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现代的普遍交往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通过受全部个人支配的途径。”“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而这就是共产主义。“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6、77、79页）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和资本主义交往形式的矛盾，要求用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生产力总和去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条件。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现存状况进行全面的变革，实行这种全面变革需要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一方面必须有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必须有反对整个旧社会的生活生产和综合活动的革命群众。他们指出，“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页）如果缺乏这些物质条件，那末尽管这种变革的思想已经表达过千百次，它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再次，马克思恩格斯阐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既然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变革，因此必须通过革命才能实现。“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他们还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

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它不容许除了资本主义的竞争以外的其他任何斗争。无产者一旦超越允许的范围，它就要以暴力出现。所以，无产阶级必然和资产阶级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以上问题的论述，系统地阐明了共产主义的科学内容，从而使共产主义理论基本上具备了科学的形态。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还未能揭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本质，因而也还未能阐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抗的本质，未能阐明无产阶级要求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内在根据。

关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的本质，马克思是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开始揭示和阐述的。马克思指出，工人是雇佣劳动者，是靠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种商品以维持生活的。资本家则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和使用这种劳动力进行生产，通过延长工人的工作时间或增加一定时间内工人的劳动量，以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来获取利润。因此，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马克思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现和创立的剩余价值学说，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真正秘密和本质，从而深刻地阐明了现代阶级斗争的物质基础和内在根据。

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从理论进到实践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揭示了它的根本特征。他们指出：“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48页）通过革命的实践改变事物的现状和改造世界，这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没有经过实践检验”的观点，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的否定，也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检验和不断得到发展的历史的否定。

约从1844年4月起，马克思和德国流亡者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以及法国大多数工人秘密团体的领导人开始交往，并且经常参加在巴黎的德国手工业者的公开集会。在形成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后，马克思恩格斯更自觉地把这一理论运用于实践活动，努力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为了扩大科学共产主义的宣传和在更大的范围内运用、检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他们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最初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接着又在伦敦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然后，他们又参预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民主派兄弟协会，作为教育、动员工人和革命群众的组织。

在这些实践活动中，他们始终坚持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立场，对小资产阶级的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展开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注意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教育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帮助他们消除卡贝的平均共产主义和魏特林的手工业共产主义的影响，认识科学共产主义的正确性。1847年春，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莫尔等向马克思恩格斯表示，愿意接受科学共产主义作为纲领，放弃陈旧的密谋的传统和活动方式，并建议把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加以合并和改组。这样，就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出现了共产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科学的纲领——《共产党宣言》，开展了革命的科学的共产主义运动，而这都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最初产物之一的《共产党宣言》，不仅验证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正确性，而且丰富、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演变，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阐明了科学共产主义运动的最近目的和长远目的：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彻底消灭私有制，用每个人得到自由发展的社会联合体代替阶级和阶级对立的社会；论述了共产主义革命不仅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且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等等。马克思恩格斯还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要求，并且申明共产党人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但他们在当前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在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公开问世后，欧洲立刻爆发了1848—1850年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投身这场革命斗争，让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政党、运动都经受群众性的革命斗争的考验。除了法国的六月革命以外，1848—1850年的欧洲革命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其中的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革命斗争，同样证实了《共产党宣言》阐述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则的正确性。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总结这场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必须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停顿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炸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观点，论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只有在得到广大农民的参加、支持下才能胜利的思想，这都进一步丰富、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

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不仅经受过民主革命的检验，而且接受过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检验。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的工人阶级发动了武装起义，推翻了以梯也尔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政府，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伟大创举。在这一革命创举中，巴黎工人阶级实践了用暴力革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原则，创造了用巴黎公社这种工人阶级的政府代替资产阶级统治机器的经验。巴黎公社虽然只存在七十二天，但它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却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必须打

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用自己的政府机器来代替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改变和消灭产生阶级剥削、压迫的经济基础的前提，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要根除阶级的存在、阶级统治的存在所赖以维持的那些经济基础，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依靠群众的选举、监督等措施，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等等。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总结，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这些实践经验同样变成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财富。

同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的斗争，是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指导的革命政党的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同样在这方面的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彻底批判了拉萨尔主义的错误观点，捍卫和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在这里，马克思以巴黎公社的经验为依据，明确地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理论，并且阐述了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他们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长期发展、不断完善的结果，只有“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才能够达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科学共产主义的不朽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在于不断地通过实践得到检验、丰富、发展。科学共产主义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前进的。

把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

要使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完整地结合起来，就必须善于根据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创造性地运用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根据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制定社会改革的具体措施时，就曾经指出“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他们又明确重申：“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马克思恩格斯既反对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机会主义的动摇、篡改，又反对对科学共产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

列宁在其革命活动的初期，一方面，坚决批判了伯恩斯坦机会主义，捍卫了科学共

产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明确地提出“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一般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第208页）后来，他在反对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又强调“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要求运用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和运用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列宁选集》第4卷，第246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开展，正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研究、把握了俄国社会的特点，创造性运用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所取得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胜利，正是斯大林和联共（布）把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特点具体结合的成果。正是在这种结合中，列宁、斯大林把科学共产主义推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强调要研究、把握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特点，正确地把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他特别强调要研究、认清中国的国情，肯定“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6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纲领、路线和政策，制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路线和政策，从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在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前夕，中国共产党胜利地召开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科学地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鲜经验，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推进了科学共产主义。通过学习代表大会的文件，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发挥和不断实现的过程。社会主义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日益摆脱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形成的旧思想旧习惯，日益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日益形成共同的理想、共同的道德和共同的纪律。社会主义充分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这是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也是将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重要保证。在本世纪内，我们要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中国建设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当前，我们要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而奋斗。

夺取这些胜利的关键，仍然在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再经过一个时期的艰苦奋斗，使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并在这个过程中把科学共产主义继续推向前进。



广东历史学会讨论“在历史教学中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问题

去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三日，广东历史学会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讨论“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问题。

在讨论会上，同志们认为，在历史教学中运用历史教材中的丰富材料，发掘课本中的爱国主义素材，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历史教师的光荣职责。同志们认为，在历史课教学中，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 讲述祖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2. 讲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学生进行增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教育。
3. 讲述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发明创造，长期居于世界前列，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激发学生为振兴中华而奋发图强，为实现社会主义祖国的现代化而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4. 讲述我国杰出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的事迹，引导学生学习英雄人物的高贵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
5. 讲述近、现代帝国主义入侵我国的过程，揭露反动政府对侵略者屈膝卖国求荣的可耻嘴脸，讲述人民群众抗击外来侵略的英雄事迹，鼓励学生学习和发扬革命传统，保卫社会主义祖国。
6. 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使学生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真理，从而使学生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四项基本原则。

除课堂教学外，还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形式，如组织参观、访问、专题讲座、举办历史游园会、故事会、演历史剧和展览有关爱国主义的图片等，对学生进行教育。

同志们还指出，在对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也应注意防止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盲目排外的思想。在不脱离讲授教材内容的前提下，恰当地联系当前形势和学生思想实际，这样更能发挥历史教学的战斗性。

（李鸿生）

试论现代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直接影响

顾春明

当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以及伦理学都越来越广泛地发生着重要的直接影响。本文试图阐述这一方面带有规律性的一些问题。

(一)

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直接影响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历史的必然产物。只是在表现形式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逐步明朗化罢了。考察科学史和伦理史可见，有许多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都程度不同地阐述了科技对道德的直接影响和作用。例如，古希腊的德漠克利特就说过：“科学是使人获得美好的道德品质的需要。”（《科学史》W.C丹皮学著，第72页）更值得重视的是弗兰西斯培根认为，工艺和技术是人类文明道德的基础。（参阅《自然科学史》斯蒂芬F·梅森著，第285页）法国《百科全书》的主编狄德罗指出：“把世界上所有分散的知识收集起来，构成一个普遍的思想体系，使过去人类所作的工作不致废弃，使我们的后代更有教养，并成为有道德更幸福的人”。（《自然科学史》斯蒂芬F·梅森著，第804页）尽管这些科学家、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受其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阐述问题程度不同，还有片面性或自然主义倾向。但是，他们都表述了科学技术对道德起着直接影响作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些合理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讲过：“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29页）这段话明确指出生产力对观念、思想所起的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它包括了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直接影响这一思想。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指出，哥白尼太阳中心说是对中世纪宗教的直接打击，把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因而使“科学的发展从此大踏步地前进”。而科学的这种力量又“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对人的精神”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6至447页）恩格斯这段论述实质上包含了科技与道德直接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思想。

长期以来，我们的哲学工作者和伦理学工作者，在有关教科书和文章中论述科学技

术对伦理道德的作用时，往往只谈间接作用方面，认为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作用要通过中间环节——社会经济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把两者联系起来；并且揭示社会经济关系对道德的决定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却往往忽视了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直接作用方面，没有很好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这方面的思想。这不能不是我们理论研究和教学宣传工作中的不足。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对伦理道德的直接影响越来越明显，作用越来越大。因此，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科学概括，揭示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直接作用方面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的原理得到充实和深化。

当前，我国人民正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我们应该十分重视科技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文化建设“既是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条件，也是提高人民群众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文化建设包括了科学技术方面。因此我们从理论上弄清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直接影响的问题，就有利于更好发挥科学技术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发展和完善共产主义道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事业。

（二）

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突破，对伦理道德学说产生着直接影响。当前，科学技术正处于巨大突破阶段，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都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高能物理，天体演化，生命起源是当代科技发展的三大基础理论；电子计算机技术，原子能的利用，空间科学技术是当代科技发展的三大主要标志；能源、材料、信息是当代科技的三大前沿。概括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是，科技对生产过程的渗入越来越深；科技在产品中的密集程度越来越高；科学各学科构成立体网络的整体性越来越强；科技知识的更新越来越快；科技人员的人数越来越多。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突破，重大发展，也向伦理道德学说，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要求。

1. 宇航学的发展，改变着伦理学研究中的传统观点。宇航学是现代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开发宇宙的问题提出及开发者本身就包含着某种态度，某种道德立场、道德评价。伦理地思考在关于开发宇宙的思想和形成中也起了不少作用，因此在西欧一些国家创立了宇航伦理学。宇航伦理学的创始人齐奥科夫斯基认为：“人的幸福、人的无限发展的日益完善，是人们认识活动的目的。但地球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受到地球上生活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影响的威胁。只有认识宇宙的规律，创造使人越出地球以外的手段，地球上的所有生命才能避免死亡”。（《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因此，他否定“伦理地球中心论”、“伦理人类行为中心论”，主张伦理的人类宇宙论。当然，这里存在一些自然主义倾向，但是，其中反映了科技对伦理道德学说的直接影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美国一些科学家判定了更广泛的伦理体系，其中的一条原则是“宇宙伦理学不仅

仅研究人同人的或人同社会的关系。哥白尼教导我们地球不是我们太阳系的中心。我们到宇宙去,这告诉我们,人不是伦理体系的中心。”(《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宇航学的高速发展,提出了伦理学研究中心要转移到宇宙。这就同传统的伦理学以地球的人为研究的中心的理论发生了矛盾。伦理学要适应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状况,就要改变研究中心的传统观点,最起码也要把研究中心转移到人与地球、宇宙的关系中来。

2. 生态学的发展,变更了伦理道德标准。生态科学是一门比较新的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结构和功能的,它教导我们从整体上来考虑我们的环境。自然界的错综复杂的因果链和调节机制,受人类活动的剧烈影响,我们必须注重那些对保护生态系统和群落内部稳定起作用的调节机制。因此,“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89页)对生态学事实上的新认识,使我们的伦理生活复杂起来了。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刻地认识到,误用环境,误用技术,会破坏那些维持生命系统自然平衡的因素或者对生活的质量产生不好的影响。比如乱砍盗伐,破坏森林生态平衡,造成了极不道德的危害。又如工业造成的废水废气污染环境,严重影响人们生命健康。鉴于这种情况,生态科学向人们提出了要求,要从人类生存、发展的高度,对人开发自然、利用自然作出是合乎人道主义还是非人道主义的评价。这就涉及到道德评价和标准的问题了。希腊的WT布拉克斯顿在《生态伦理学》一文中认为:“对这些事实的认识已迫使哲学家们宣称,我们必须对伦理原则作彻底的评价。我们必须不仅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更有利于环境,而且必须改变促成这种行为的原则”。(《第十六届世界哲学大会》1978年论文集英文版,第100—101页)生态伦理学的本质意义就在于,道德行为标准不仅要注意伦理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注意人与伦理客体自然的关系。只有维护生态平衡,才能使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达到一致和谐,才是符合道德标准的。可见,传统的伦理学标准缺少自然与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标准问题,这显然是不全面的,需要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变更。

3. 科学技术的发展,丰富了道德伦理研究的内容。以往的伦理学在职业道德中只是研究商业、卫生、体育、教师等道德规范。由于当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科技大军日益壮大,建立以科学家道德行为规范为中心的科学伦理学,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西欧有许多国家,在职业道德中增进了科学道德这一章,有许多专家专门从事科学道德的研究工作。在我国,前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有十位科学家联名倡议要建立科学道德。科学道德主要是研究科学家本身活动价值、行为规范的科学体系,从而调整科技人员的道德行为,调整社会对科技人员实验的道德评价问题。可以说,科技道德是科学技术本身发展的直接产物。

4. 系统心理学的出现,改变了道德研究方法。系统工程学与现代心理学的结合出现了系统心理学。由于运用它研究人们的伦理道德,从而促使了旧的经验式的研究方法退出历史舞台,代之以新的方法,即伦理品德研究的系统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第一,品德形成系统在时间上是多阶段性,如适应反应活动阶段;道德主动性再现阶段;道德独

立阶段等。第二，道德形成系统中品德内容的多水平性，如学前期；学龄初期；学龄中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等不同时期对于同一道德规范内容理解表现出多水平性。第三，影响道德品质发展的内外因素的多侧度性。内部因素，有生理的，智力的，自我意识；外部因素，有家庭、学校、社会等。第四，道德品质形成的多层次性。如道德意识、道德情感、道德动机及道德行为。

科学的系统心理研究方法，揭示了道德在每个人身上的体现即道德品质的形成、发生、发展的规律，揭示了内在心理与外部社会的联系。这就有助于我们能辩证地、合乎规律的探讨道德问题。

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突破，直接影响了伦理道德学说及其研究的变化。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对这种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概括，从对象、标准、内容、方法诸方面，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科学，使之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三)

所谓科学技术，就是指对自然界物质运动及其相互联系和规律的认识，并运用于生产实践。科学技术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理论科学，一类是实际应用科学。两者作为科学技术的整体都是生产力，这是它的本质特性。科学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在这些生产力里面也包括科学在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第850页）可见，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态又有双重性，基础理论科学是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实际应用的科学是物化的生产力。

所谓道德就是指研究调整人们行为规范和人们道德观念的科学。他的本质特性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但是，道德伦理又是从精神和行为两个方面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因而他本身也具有双重性，一是研究人的道德观念、意识、情感、动机，一是要研究道德行为、道德实践的。

由于科学技术本身与道德本身都具有双重性，这就成为两者联系的桥梁。也可以说，这就是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直接影响和作用的途径。

具体说来，作为物质形态的生产力即应用科学改变着人们的道德认识、情感和动机，最终调整人们的道德行为。道德动机是由道德认识和情感组成的。道德认识是对于行为准则的善恶及其意见的认识；道德情感是伴随道德认识所出现的一种心理体验。当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成为推动个人产生道德行为内部动力时，它们组成道德动机，而道德行为的实现是以道德动机为先导的。人们在改造客观自然界时，广泛地应用科学技术为工具，为生产力，向自然界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不断加深对自然界科学规律的认识。这种对科学规律的认识直接作用于自然的后果，对人们的行为也起了调整作用，合乎规律的受到恩赐，违反规律的受到惩罚。这样使人们在改造自然界时也对善恶的道德认识起了变化，使人的道德动机得到了改变，最后使人的道德行为遵循自然生态平衡这一使

人类得以幸福的善的行为。比如，生态平衡规律，对人们改变多子多福的道德认识起了重要作用，使人们认识到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下，人口增殖太快不行。而要少生孩子，提高人口质量，改善生活环境，这就最终调整了人们的行为。这就是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直接作用的途径的一个事例。

作为理论形态、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基础理论科学，直接影响伦理道德的途径是每一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客观世界的看法，从而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伦理道德学说的基础。

自然科学是人们征服自然时获得的一种系统的认识。它是社会意识范畴的东西。而道德观念，道德伦理学说，也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的东西。尽管两者有不同之处，即道德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而科学技术理论属于知识形态的生产力，不属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意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各种形式社会意识可以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说，科学技术的理论形态是可以直接影响作用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伦理道德学说的。十九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改变了人们过去对世界的看法，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规律，从而抨击了宗教上帝创世说，使旧的传统道德伦理基础发生了动摇。并且达尔文关于动物为自己物种的生存，保护物种群体而其他物种搏斗乃至献身的行为，启发了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创始者边沁和穆勒。功利主义正是以此为道德伦理基础从而建立自己的伦理道德学说体系的。可见，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基础的改变，也往往是借助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理论而发生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形态以其直接手段影响人们的道德观念、道德基础是显而易见的。

概言之，无论基础理论科学还是实际应用的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科学技术都是生产力。道德行为是受道德认识情感和动机支配的，道德认识情感动机都是思想和观念的东西。从总体上讲，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的直接影响作用的途径，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对人们思想观念的直接影响。

科学技术直接影响伦理道德的根本原因还在于科学技术实践。

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活动叫实践。毛泽东同志把人类实践活动概括为三大领域：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最初人类实践只是生产斗争，后来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了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而科学实验真正从生产实践中分离出来，作为实践的一个独立的大领域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事。这时，科学技术才获得大规模的实践基础，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科学研究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为社会生产体系的一个门类。列宁说：帝国主义时期“特别是技术发明和改良的过程，也社会化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48页）科学实验社会化的规模越来越大，由小集团到国家规模，甚至国际规模，象西欧联合高能物理研究，分子生物研究，国际性的土地幔的考察计划等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大军壮大。截至七十年代初的最近五十年，科学工作者人数的世界增长率为7%，而人口增长率为1.7%。目前世界科学工作者在人数上超过科学史上科学家的总数的90%。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科技人员的增多，科技实践的扩大，直接广泛地影响了人们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学说。科学实践的特定环境，是科学直接影响伦理道德的根本原因。心理学家潘菽在其《教育心理学》中认为“人们的道德动机和行为，主要是在通过练习或实践掌握行动技术与养成习惯的途径中形成的”。人在科技实践中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表现出忘我的奋斗和协作精神，表现出冲破迷信和追求真理的品格，表现出实事求是的谦虚为人的道德品质。在同落后势力斗争中表现了为人类的谋福利而英勇奋斗的道德理想和行为。布鲁诺、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世界有名的科学家都是在科技实践中形成优秀的道德品质，为人称为道德楷模。

科学技术实践不是孤立的，它是整个社会实践中的一部分，与生产实践、社会生活实践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日益直接加入生产过程和人们的生活实践中，科学技术中真理性的成果也直接影响着社会实践中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风尚。正如爱因斯坦说的：“科学具有教育的性质——作用心灵”。（《爱因斯坦文集》）

科学技术实践中取得的真理性的成果，促使着人们伦理道德的基础向科学化发展。如现代优生学表明，近亲结婚将会出现许多遗传病，影响人口质量，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这是对“近亲结婚，亲上加亲”的封建迷信的伦理道德观的有力的冲击。

在科技实践中，随着对自然界规律的深入认识，同时对人类主体的认识也不断加深，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站在新的高度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变化。

科学技术实践的发展，科技人员增多，也使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增加。原来不涉及道德的事情也变为新的道德规范。比如吸烟，经过科学家们实验表明，抽烟与癌有关，并且香烟中烟雾对别人有害，受烟雾的影响，吸烟者的妻子比一般人得肺癌率高达4—6倍，并且影响下一代人口质量，也影响社会上其他的人。这样原来不是什么缺德的抽烟行为，今天在一定意义上被人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并且规定了在公共场所不准抽烟。

科技实践的发展，也使人们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更加深刻，改变了一些旧的道德传统的观念。比如英国在一九七五年制定了保护妇女禁止性别歧视法案。瑞士在近年也提出了保护儿童法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随着科技的发展对歧视妇女、虐待儿童的封建旧道德观念的改变。

科学实践中的方法还直接影响人们解决道德分歧的方式。科学方法依靠理性而不诉诸情感。比如，从十九世纪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就逐步抛弃了用决斗解决道德上意见分歧的做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们认识的来源、动力、标准和目的。同理，科技实践也是人们道德和伦理道德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动力、标准和目的。科技实践是科学技术对伦理道德直接影响作用的基础和源泉。

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的科学方法

梁 木 马中柱

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以下简称《战略问题》，凡引此文，只注明《毛泽东选集》的页码）这部光辉著作，以十年血战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作基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了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和应用问题，不仅对于指导战争的胜利是重要的，对于其它一切工作都是重要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迫切需要解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有关的规律的研究和应用问题，从《战略问题》中学习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的辩证方法，是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一）

研究规律，认识规律，必须有正确的方法。

毛泽东同志认为，对战争规律的研究，“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第157页）。这个着眼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研究事物规律性的起码要求。

任何事物都是发展的，在事物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各个运动范围和各个性质变化，都会有不同的情况，因而有着不同的发展规律，这就要求在研究和把握事物的规律时，从横的方面来说，注意不同性质的事物所存在的特殊规律；从纵的方面来说，要注意同一性质的事物随着运动范围及其存在条件的变化而产生的更加特殊的规律。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俄国《欧洲通报》发表了一篇谈《资本论》方法的文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肯定了这篇文章对于所谓“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错误观点所作的批评。那位作者说：“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

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资本论》，第一卷，第23页）马克思称赞这位作者所“恰当”地描述的正是他的“辩证方法”。很显然，这个“辩证方法”的实质，就是要求研究事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规律。毛泽东同志关于研究战争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实质所作的更明确的规定，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运用和发挥。

毛泽东同志指出：“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第165页）坚持这个“主要方法”，就是把研究战争规律的认识基础放在实践上，就象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时采用实验的方法一样。黑格尔认为“在探索的认识中，方法也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某种手段，主观方面通过这个手段和客体发生关系……”（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6页）。参加战争实践，就是使自己的主观认识和客观的战争现实“发生关系”的“工具”和“手段”。只有通过这个“工具”和“手段”，对战争规律的探索和研究才是能动的、创造性的。列宁说：“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消灭它的规定性（=变更它的这些或那些方面、质），这样，也就去掉了它的假象、外在性和虚无性的特点，使它成为自在自为地存在着（=客观真实的）现实。”（同上书，第235页）战争实践的活动能动地作用于战争现实，去掉各种伪装和假象，排除错觉和不意，把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暴露出来，做到知己知彼，就能找出其行动规律。所以“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第165页）

毛泽东同志在强调“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这个“主要方法”的同时，还提倡“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第164页）的思索方法。这种思索方法就其实质来说，也就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是将战争中熟识的敌我双方情况，以及一切和战争有关的政治、经济、地理、气候诸条件，加以周密的分析，概括出本质的方面、特点或因素，舍去那些非本质的东西，假象的东西。“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就是经过综合，把析取出来的本质方面、特点或因素按照对立统一规律彼此关联起来，把外部表现和它的内在本质关联起来，弄清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过程。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时，就是分析和综合相结合的典范。

毛泽东同志正是坚持以上的研究方法，在《战略问题》中，首先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他说：“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第175页）这四个特点中，第一个特点是对中国革命战争存在和发展的环境和条件所作的定性分析；第二、三个特点则是对战争双方力量对比所作的分析；第四个特点一方面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环境和条件所作的因果分析，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个特点是第一个特点的必然结果。”（第174页）另一方面又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个特点与战争双方力量变化所作的因果分析，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我们能够得到农民的援助，根据地虽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国民党由于反对土地革命，没有农民的援助，其军队虽多，却缺乏应有的战斗力。所以这个分析是全面的、本质的分析，为以后的综合创造了可靠的前提。

毛泽东同志在综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时，不是将它们任意地、机械地或者简单地加在一起，而是如实地将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阐明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必然趋势。毛泽东同志在归纳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四个主要的特点之后指出：“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

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第175页）这就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在发展中的两种可能性和两方面的条件，揭示了这两种可能性和两个方面的条件的互相排斥和互相联结，从而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必然趋势，即根本规律。毛泽东同志在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之后，随即揭示了围剿、反围剿长期反复的规律以及打破“围剿”的战争指导规律，即战略防御的指导规律等等一系列的具体规律，将中国革命战争这个具体物在理论上复制出来，并且结合成为一个军事科学体系。

（二）

研究和认识规律的目的在于应用规律到自己的行动中去，达到预想的结果。

恩格斯在讲到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时指出：“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54页）应用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就是根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支配外部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克服遇到的各种矛盾。

首先是规律本身包含的矛盾。任何事物的规律都包含有矛盾着的对立面的互相排斥和互相联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就是“既有顺利条件，又有困难条件”这样两重性，它们在战争中互相依赖、互相排斥和互相转化着。当我们在战争中取得某种顺利条件时，这个顺利条件中包含着许多困难需要克服，并且受着困难条件的限制；反之，处在困难条件下，又包含某种转化为顺利的可能性，并在创设了一定条件之后可以转化为现实。战争条件的两重性及其互相渗透和互相制约，就规定了我们的战略原则必须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反对红军的游击主义，却又承认红军的游击性；反对战役的持久战和战略的速决战，承认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固定的作战线和阵地战，承认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运动战；……”（第175页）都是把战争中互相对立的成分辩证地统一起来。“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

就是红军在进攻时，不要进攻得太远了，要准备转入防御。“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就是要搞积极防御，通过战略退却，创造条件，准备反攻。“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就是在转移时可以把退却和进攻结合起来，而不是消极逃跑。这样，就把进攻和防御、前进和后退辩证地统一起来，达到相反相成的目的。所以在应用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去争取战争的胜利时，都只能是象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是迂回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毛泽东同志批判了所谓“有进无退”、“不丧失寸土”、“不打烂坛坛罐罐”等军事冒险主义观点，摒弃了他们的那些“冒险直冲”“鲁莽灭裂”的干法，强调在战争中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各种问题。他说：“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走向正面，而走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这对于我们正确处理把规律应用于自己的行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矛盾具有极为普遍的意义。

其次是全局和局部的矛盾。我们从现象中把握到的规律，是贯穿于现象各个方面和贯穿于事物整体的东西，因而是全局的东西。当我们把规律应用于自己的行动时，所接触到的各种现象则是局部的东西，是规律的某一方面的表现。这就有着全局的东西和局部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而这样的差异也就是矛盾。我们在把规律应用于自己的行动时，如果这个矛盾解决不好，就会受到局部现象及其个别外部联系的迷惑，甚至把自己的认识和行动局限于个别现象之内，因而偏离了贯穿事物整体的规律的轨道，那就不可避免地会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相分裂，走向主观主义，导致行动的失败。毛泽东同志在讲到集中兵力的问题时说：“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第206页）这就是说，要贯彻以多胜少的原则，就要具有战略头脑不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毛泽东同志在《战略问题》中，要求指挥员“关照全局”，“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做到“能够把战争或作战的一切重要的问题，都提到较高的原则性上去解决”，这对于保证在行动中应用规律具有重要作用。

再次是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矛盾。“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第166页）战争双方各以自己的军力、财力和主观指挥能力等等同对方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当我们应用规律于自己的行动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时，要经历由可能向现实的转化过程。在开始的时候，我方取得胜利的可能性还是抽象的（胜利的希望还是渺茫的），要使这种抽象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还需要创设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同志讲到反“围剿”时指出：要战胜绝对优势敌人的进攻，只有依靠在战略退却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才有可能。但是单有这种条件和形势，还不能使胜利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实现两军的胜负。“实现这个胜负，依靠两军的决战。只有决战，才能解决两军之间谁胜谁败的问题。”（第198页）创设有利的条件和形势选择决战的时机和实行决战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毛泽东同志在讲到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说：“第一次反‘围剿’时先想打谭道源，仅因敌不脱离源头那个居高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却两度忍耐撤回，过了几天找到了好打的张辉瓒。第二次反‘围剿’时，我军开进到东固，仅因等待王金钰脱离其富田巩固阵地，宁可冒险走漏消息的危险，拒绝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议，迫敌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终于达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围剿’虽是那样急风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师，又被敌人发觉了我们迂回其侧后的计划，但我们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间突破，终于在莲塘打着第一个好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韶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第204—205页）这就是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条件和形势时，宁可退让，持重待机，决不轻率应战。一旦取得了有利的条件和形势，则抓住战机实行决战，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冒险主义者全然不看条件和形势是否有利，震惊于一城一地之得失，仓促应战，把可能当成现实，所以不能不遭到历史性的血的惩罚。

从五次反“围剿”的过程中可以看出，解决好上述一系列矛盾，对于应用战争规律于行动，达到在每个战役中把我们的主观和客观好好地符合起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左倾”机会主义者既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又不懂得应用一

定规律需要解决一系列矛盾，他们就只能在战争中乱撞乱碰，不是轻敌坐大，冒险直冲，就是为敌人吓倒，迟疑坐误，退却逃跑。

总之，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都必须坚持辩证法，来不得半点形而上学。从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问题》中可以看出，在这里，辩证法、逻辑和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融为一体的，三者都用于解决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研究和应用问题，使这个问题得到透彻的解决。我们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

（三）

从《战略问题》中学习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的辩证方法，对于我们认识和应用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同样要首先注意“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我们是在中国这个特殊的环境和条件下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自己国家的特殊情况 and 特殊问题。别的国家建设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一般规律，我们无疑都要认真学习和吸取，但是，尤为重要的是要研究一般建设规律在中国条件下的特殊表现，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只有把握了这个特殊规律，我们的建设事业才有可靠的现实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二十多年间，我们对于如何巩固新制度和建设新国家问题，由于受到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影响，没有注重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的新的情况和新的经验进行认真的研究，往往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套用，或者沿用过去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时期的旧观点去观察、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这样就完全脱离了我国现实的具体情况，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从中国国情出发，从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基本事实出发，正视我们自己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通过反复比较和总结，开始找出在我国特殊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性。我们党根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出的理论和政策，全面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出现了新的局面。正如邓

小平同志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建设同革命战争一样，都是极为艰巨和复杂的事业。它不但有着带根本性的规律，还有为根本规律所规定的不同层次和不同方面的具体规律。只有应用毛泽东同志在《战略问题》中所使用的由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在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律逐步揭示出来，并且制定出符合于这些规律的方针政策，才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曾经提出：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提法是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基本要求的。但是，为什么没过多久我们党又离开了八大的这个正确观点，改变了这个正确提法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当时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等问题都缺乏规律性的认识，所以，当社会上出现了某些比较激烈的阶级斗争现象以后，我们党又将原来已经正确认识了的东西当作错误的东西抛弃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总结和认识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正确阐明了政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之后，才恢复和发展了八大的正确观点，清算了“左倾”错误，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才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最近，十二大文件又把把我们党从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作了系统的概括和总结，比较全面和系统地提出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路线，制定了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高涨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这就为我们在各个方面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前进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同应用战争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时一样，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应用到行动中去的时候，也要处理好规律自身包含的矛盾，全局和局部的矛盾，可能和现实的矛盾，等等。十二大文件对这些矛盾都规定了正确处理的方针和政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本身包含的矛盾，从总体上来说，要求把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

神文明结合起来；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同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结合起来。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这一方面来说，要求把确定经济发展速度和提高经济效益结合起来；把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同继续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坚持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和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结合起来；把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和市场调节为辅结合起来；以及把坚持自力更生和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结合起来，等等。这样，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就能使各个矛盾着的侧面，彼此兼顾，有主有从，发挥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的作用，我们的建设工作也就能够比较全面地符合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性。过去在“左倾”思想影响下，遇到上述一些矛盾时，总是往往抓住一面否定另一面，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其结果就不能不脱离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要求，受到规律的惩罚。

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处理好上述矛盾，也必须通观全局，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矛盾。因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包含着错综复杂的矛盾综合体的运动过程。其中有对于建设全局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或矛盾方面，又有的矛盾或矛盾方面只是局部性的，对建设全局不起决定作用。毛泽东同志曾说：“一个原则，就是注意于那些有关全局的重要的关节。”（《毛泽东选集》第161页）就是要把决定建设发展全局的矛盾或矛盾方面当作战略重点加以解决。例如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以经济建设作为战略重点；而在经济建设中，又要以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只有抓住这几个战略重点，才能带动我们的整个建设事业兴旺发达起来。如果人们仅仅看到局部的发展、局部的需要和局部的优势的重要性，因而盲目发展，甚至搞分散主义，挤掉关系全局的东西，这就会导致脱离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规律的轨道，造成经济发展的重大损失。这在我们过去的建设实践中是有沉痛的教训的。

在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应用于我们的行动过程中，只要我们按照十二大确定的方针、原

则，正确处理建设中的各种矛盾，按照十二大确定的战略重点和战略步骤稳步前进，我们就能把十二大确定的战略目标由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七八年两次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之所以是冒进、高指标，一方面是由于那时提出的发展目标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脱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政治推测和政治需要出发提出来的，而且任意确定战略重点，缺乏科学的根据和切实可行的步骤，企图出现“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奇迹，因而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另一方面就是搞一点论，对于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往往作片面处理，以致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扩大和激化。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原因或根据。如果对建设中的各种矛盾处理不好，即使是有了符合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战略目标，也没有由可能变为现实的根据。今天就完全不同了。十二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要求，又有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正确处理建设中的各种矛盾，这样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就有可靠的依据。正如“七大”总结了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经验，掌握了民主革命的规律，制定了解决民主革命中各种矛盾的方针原则，使民主革命的战略目标胜利实现一样，十二大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二十多年来曲折发展的经验，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制定了一系列正确处理建设中各种矛盾的方针原则，也一定能把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内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胜利实现。所以，邓小平同志说：十二大的作用与我们党的七大一样。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

总之，毛泽东同志的《战略问题》中关于认识规律和应用规律的辩证方法，不但是认识和应用战争规律的科学方法，也是研究和应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科学方法。我们必须充分运用这个方法来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符合于外界的规律性，克服盲目性，提高贯彻执行十二大制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自觉性。

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科学的研究

刘夏帆

无产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是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就是指导建设这样的革命政党的一门科学。加强党建科学研究，对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特殊矛盾运动规律的，即研究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客观规律，重点研究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建设和领导作用的规律。

无产阶级政党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充分展开，无产阶级联合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并且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时，无产阶级从切身经验中，感到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革命的党，来统率整个阶级的联合行动；而在实践斗争中业已涌现出一批先进分子和杰出领袖人物。在这些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作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对立面必然地产生出来了。

按照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经验，党是在正确处理如下几个主要问题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也可以说，这就是党的建设中的几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

首先，党必须要有正确的政治纲领和路线。要善于运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结合一定时代、一定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实际情况，制定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的巨大进步，最后发展到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在取得国家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必须依据执政党的地位、特点，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动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等情况，来进行党的建设，保证党的领导重心及时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

第二，党是根据自己的纲领和章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统一整体，必

须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借以健全党内民主生活和保持必要的组织性、纪律性。各级组织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党必须由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德才兼备的领袖们实行集体领导，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既反对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又反对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

第三，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进行艰苦曲折的长期斗争过程中，坚持无产阶级世界观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增强党对剥削阶级各种腐朽思想以及小生产观念侵蚀的抵抗力。注意及时整顿党的队伍，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和共产主义纯洁性，保持党同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防止党的蜕化变质。

第四，党内斗争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必然反映。要在思想政治原则上正确进行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斗争，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制定和贯彻实现，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左”的和右的错误，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为其特征的，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如果不进行反对“左”、右错误倾向的斗争，就不能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政治基础，不可能制定和贯彻实现党的正确路线。对党内斗争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切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防止犯扩大化的错误。

第五，对执政的党应提出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不仅要注意搞好工人阶级政党自身的建设，并且要正确处理党同国家政权的关系，正确处理党同非党组织的关系，真正实现党的核心领导作用。在国际方面，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之间的关系。

总之，党是在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变革世界的实践斗争中巩固发展的。一般说来，党的建设、党的工作符合客观规律，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党和党的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否则党和党的事业就会遭到挫折和失败。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逐步发展和阶级的逐渐消灭，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职能和作用也相应地随之发生着变化。最后由于阶级的彻底消灭，党完全失去存在的条件而消亡下去。党的完全消亡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同整个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今天加强党的建设是为着将来党的完全消亡创造条件。

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运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世界观，揭示了这些规律，为无产阶级党的建设确立了共同的科学基础。

由于现代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国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与别国不同的特殊情况；即使是同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固然要认识党的建设的普遍规律，更为重要的还要着重研究党的建设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把马克思主

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本国革命斗争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党的建设，开展党的工作，这在实践基础上就把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统一起来，使党既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又能从当前实际出发，始终站在时代的前面，成为领导人民群众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先进部队。

（二）

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是伴随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必然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用了毕生的精力从事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公布的《共产党宣言》，就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理论和实践的纲领。此后几十年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实践活动和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长期斗争中，继续检验和发展了《宣言》的基本思想，深刻地阐明了：党是工人阶级最坚决最先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他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共产党人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和在阶级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共产党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先进理论为指导，它的基本纲领是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才能使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它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党是按民主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的整体，坚持反对党内的派别活动和思想的原则斗争，维护党的团结和纪律；必须保持党的共产主义它在自己发展纯洁性，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因此，毫不奇怪，展的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党坚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国际团结；等等。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党的性质和世界观、党的纲领和路线、党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以及国际主义原则等基本问题上，为党建科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遭到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们的极大歪曲、篡改，使无产阶级政党大多蜕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变到垄断阶段，世界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同俄国工人运动和重建共产国际的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他同国内外企图篡改、反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发表了《怎么办？》、《进一步，退两步》、《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以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策略基础。十月革命后，列宁极为重视执政党的建设，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列宁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思想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必须要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党的集中统一是党的事业胜利的基本条件，党内不允许机会

主义、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的存在；党是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增长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必须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坚决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党和国家变质；党必须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接受群众监督，勇于作自我批评，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等等，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承和捍卫了列宁的党建学说，他主持俄共（布）党的三十年间，在为实现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和伟大的卫国战争过程中，培养和锻炼了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发展了党的组织。

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党建学说成功地解决了在我国特殊情况下，建立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创造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思想党建理论。例如：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正确纲领和路线，保持党在思想政治上的一致；把党的建设作为革命和建设的主要法宝，同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路线和任务紧密相联系；在党的组织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把思想建设摆在首位，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培养和树立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及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吸取党内存在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的严重教训，提出党内斗争必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为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执政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等。党的十二大报告和新党章进一步总结了执政党建设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特点、需要和党的现状，明确提出执政党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这三项基本要求的核心，是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共产主义纯洁性，要求共产党人自觉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党的组织体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党的纪律、整风整党等问题，规定了一系列重要原则、方针和措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经过各国无产阶级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不断地得到了新的发展。迄今，全世界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已成为世界范围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一门科学。

通常人们习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并把党建学说包含在科学社会主义之中。现在，不论是从党的建设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还是从党建学说本身所固有的矛盾特殊性来看，都应当明确认识党建学说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是同马克思主义其他部分有机联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建学说一定要以科学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和指导，否则，党的建设就没有明确的方向。而科学社会主义等组成部分则不能脱离党的建设实践，否则，就不可

能变成巨大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是工人运动（和建党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论概括，同时它又转过来指导工人运动和党的建设实践，并从长期实践中不断地吸取营养来丰富自己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党建学说正是这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概括地说，党建学说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是：党建学说的研究对象和任务，党的性质、作用和指导思想，党的政治纲领和路线，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党的作风，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党的团结和党内斗争，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等。党建学说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将随着党的建设实践不断完善和发展。

党建学说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表明：第一，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有其严密理论体系和丰富内容，是一门具有鲜明的党性、实践性和战斗性的科学；第二，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第三，这些基本理论原则一定要同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始终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和共产主义纯洁性，也才能不断丰富发展党建学说；第四，党建科学研究的重点应放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上，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该努力提高研究水平。

（三）

我们党是在占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中执政的党，是个拥有近四千万党员的大党。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搞得好不好，不仅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国际的影响极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新的探讨。党建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提高党的战斗力，使党的各项工作都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加强党建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理论原则。党的思想建设，说到底就是党的理论建设的问题。“没有革命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因为革命理论能使一切社会主义者团结起来，他们从革命理论中能取得一切信念，他们能运用革命理论来确定斗争方法和活动方式”。（《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08页）我们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是否正确，首先的和根本的条件取决于党有没有掌握科学的革命理论。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说：“六十年来的历史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一定要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要有一个能够确立和坚持这条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从创造性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来的独创性理论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应当肯定的主要方面。但另一方面，从全党说来，由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农村生活环境，更重要的还由于我国原来的经济文化落后，党内农民小资产阶级成分的比重很大等主客观条件，我们的理论准备是不充分的，理论素养和理论研究都同我们的事业不相适应，这又是导致我们党的建设、党的工作发生失误和受挫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基本原理，一是要在钻研党建理

论的基础上，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历史和中国革命史等基础知识，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由这些组成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完整科学体系。二是要在理论上继续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彻底肃清“左”的影响，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右的倾向，批判和反对一切歪曲、分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错误言论。

加强党建科学研究，还应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第一，要联系工作实际总结经验。当然要着重研究本国党的建设实践经验，同时也要注意吸取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经验教训。对当前国内外在党的建设方面出现的重大理论问题，要采取严肃认真态度进行研究。例如：如何防止党的蜕化变质；怎样选拔和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党的领导作用；如何消除干部中实际存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如何消除家长制与个人崇拜；“左倾”错误的表现、危害及根源等问题。第二，结合思想实际改造世界观，把对广大党员群众进行党的思想教育，树立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作为党建科学研究的一项战略任务，促进干部队伍的“四化”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通过党建科学研究，可以为党和国家培训干部提供必要的师资、教材和资料。

根据党建学说的特点，党建理论教学研究工作者，党的实际工作者（包括从事党的工作多年的离休老干部），很有必要实行密切合作，互相取长补短，交流经验，共同提高。现在全国各省市正在积极建立党建学会（或研究会），这是目前实行两者结合的一种可行的组织形式。从实践效果来看，开展这种学会活动有助于加强党建科学研究，同时也是对党员群众进行党的宣传教育和锻炼培养人才的一种办法。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领导下，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互相协作，一定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科学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本刊征求封面设计启事

本刊征求封面设计样式，请各地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参加设计。

经采用的封面设计样式，即发稿酬；未经采用的酌发资料费。

《学术研究》编辑部

艾思奇主要著译年谱

叶佐英

编者按：艾思奇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毕生致力于研究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原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给我国哲学界提供了解和研究艾思奇同志生平及其学术思想的资料，作者在参与《艾思奇文集》选编的基础上，写成这份《艾思奇主要著译年谱》。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由于艾思奇同志很长时期从事党的理论教学工作，讲课稿在其遗著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这一部分遗产是研究艾思奇同志著述不可缺少的内容，限于未曾公开发表，在这个主要著译年谱中暂不收录。这里所收录的，均已公开发表过，并按著译公开发表时间先后，分为上海时期、延安时期和北京时期等几个部分。本期先刊上海时期这一部分，其他部分将继续在本刊连载。

一、在上海时期

（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

艾思奇原名李生萱，一九一〇年三月出生于云南省腾冲县。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他和许多留日学生一起，毅然弃学回国，先在昆明老家稍住，次年便只身到了革命发源地上海，在上海泉漳中学任理化教员，并加入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此后，他就走上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道路。

一九三三年（二十三岁）

五月，哲学处女作《抽象作用与辩证法》写成。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哲学史，在理论上阐明了“抽象作用”的意

义。指出“抽象作用有两面的效果，即一面是对于某一群的多种多样的个体给以概括的关联的综合作用，一面是将这关联中的个体群和别的世界事物分离开来的分离作用。”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论”，“不过是在这里弄点巧辩而已”。只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所利用的“抽象力”——这种抽象力不同于形式论理学的抽象作用——把抽象作用和具体事物联系起来，才是真正的科学的研究。这篇文章在党的刊物《正路》杂志创刊号上一发表，即引起杜国庠、许涤新等同志的重视，并很快吸收了他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

月底，作《进化论与真凭实据》，刊《正路》杂志一卷二期。文中对科学界某些人捡起早已破产的“生物自然发生说”攻击达尔文的进化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伪科学家们举出所谓“真

凭实据”不过是一种臆想和骗术，是唯心论在生物界的沉滓泛起。这种伪科学可以在刊物上大肆张扬而不受到指斥，就“好象在军事上被无理横蛮的帝国主义节节进攻没有一点办法一样，学术界也常常受那些强词夺理没有一点头脑者的欺凌”。“人类固然希望着真理，科学固然要求着真理，而在社会里，支配阶级却不一定爱真理！”

六月，作《现代自然科学的危机》，载上海《中华月报》一卷四期，开始使用“艾恩奇”等笔名。

九月，作《直观主义与理知主义》，载上海《中华月报》一卷七期。十二月，作《理知和直观之矛盾》，刊《中华月报》一卷十期。以上二文集中地讨论了理知主义和直观主义的分野，指出“理知主义现在正作为最高发展了的唯物论而健在着了”。批判了直观主义所派生出来的“生命哲学”，这种哲学正在被法西斯蒂奉为一种“生活态度”。“其结果，纵然能横行一时，终于难免鸵鸟似的走到末路，这不是见得明白的必然性么？”

九月，作《文艺的永久性和政治性》，载上海读者书房一九三六年版《新哲学论集》。本文针对文艺界所谓“自由人”和“第三种人”否认文学的阶级性，系统地论述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指出艺术的永久性并不属于“自由人”的东西。文艺的政治性，从广义上来说，可以当作一种“教化”即宣传作用；而永久性是文艺之为文艺不可缺少的特征。（他在这方面的论文计有几十篇。现已由出版社选编出版单行本。）

十一月，作《诗人自己的道路》，见《新哲学论集》。文中借助谈论马克思和海涅的关系，论述了文艺反映真实的问题。说如果把文艺仅仅当作唯物史观的论的解释工具（即仅仅当作狭义的宣传品），结果自然不会有文艺，但是自身中内藏着唯物史观的本质，却是文艺所不可缺少的。“文艺价值的决定者是真实性的深度。”

十一月，作《形而上学与现代科学》，载《新哲学论集》。

十二月，作《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载上海《中华月报》二卷一期。作者系统地研究了辛亥革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几次大的论战，对几种影响较大的唯心主义派别作了剖析抨击，指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统治哲学的时代应当结束，而标志着中国哲学新时代的将来，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文章说，当前最危险的敌人

是新康德主义者和“披着辩证法外装的另一唯心论”，即叶青之流的伪哲学。“新哲学一面反对观念论，一面和机械主义作战，要在这两条战线的夹攻中，打出一条血路来。”艾思奇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对形形色色的伪哲学作不调和的斗争。

一九三四年(二十四岁)

这一年，党指派艾思奇到上海“申报流通图书馆读书指导部”工作，和李公朴先生以及柳湜、夏征农同志一起，专门以为读者解答疑难问题的方式宣传革命道理，并在《申报》的“读书问答”专栏上公开答复读者来信，扩大宣传效果。艾思奇在这里勤奋地工作着，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他写过大量的回信。

五月，作《论文学的鉴赏》，载《新哲学论集》。文中写道，艺术能把人带到作者的生活里，跟着他呼吸同样的空气，看见他血肉的感情和思想的跃动。凡好的艺术品，给人的印象总是逼真的，这就是艺术永久性的来源。二千年前的哲学理论，在我们看来是幼稚而且错误，要不是二千年前的人，决不会把它当作真理。但二千年前的艺术珍品到现在仍然生动活跃。那艺术的特有的感人的力量，决不会象哲学的真理一样，会被时间之流冲洗了去。

七月，发表《海涅的政治诗》，载上海《中华月报》二卷七期。说海涅并不扭扭捏捏地腐心献媚于至上的女神，他宁可把纯洁的两手掘入污秽的现实中，暴露出没落阶级的丑恶。艾思奇对海涅的政治抒情诗有浓厚的兴趣，他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就一边研究一边翻译海涅的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

八月，科学小品《月蚀》发表于上海《新语林》第四期。艾思奇对科学小品的写作是十分认真的，他运用自己所掌握的丰富的哲学知识，娴熟地驾驭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在他的笔下介绍出来的新科学、新知识，变得饶有兴味。他不是就科学谈科学，而是借题发挥，抨击黑暗势力、针砭时弊，因而具有鲜明的思想性和强热的战斗性。此后，他发表的科学小品有《神话化的自然科学》（《太白》一卷三期）、《谈佛》（《新语林》六期）、《孔子也莫名其妙的事》、《由爬虫说到人类》（《太白》一卷九、十期）、《谈毒瓦斯》、《谈潜水艇》、《火星中的生物》、《火箭》、《太阳黑点和人心》、《由蝗虫说到鸡生蛋的问题》、《中痲症与黄河》、

《斑马》等。(以上均见上海《读书生活》杂志一卷各期)

十月,发表《中庸观念的分析》,刊于上海《申报月刊》三卷十期。本文从哲学角度上对“中庸”作了深刻的解剖,指出它历来是中国人眼中至高的教义,中庸主义所标榜的善恶界限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这是一种神圣化了的观念论,骨子里教人怎样“有礼教,如何守本分,行正道”,充满着“十足的封建主义的位阶主义的臭味”。它“之主张不偏不易,只证明它是保守的意识形态而已”。

十一月,由于《申报》“读者问答专栏”的影响日益扩大,李公朴等人为了适应广大青年的需要,筹办了《读书生活》杂志。艾思奇是这家杂志的主要编辑之一,专门处理哲学方面的文章,并负责刊物的编务工作。

艾思奇的成名作《大众哲学》开始在《读书生活》杂志创刊号上连载,每期发表一篇,至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全部发完。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本书虽然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查禁,但仍然不径而走,成为一本畅销书,解放前短短的十余年里,发行了三十多版。中间作者曾作过几次大的修改,其中一九五〇年的修订稿因故长期未能出版,直到作者去世后的一九七八年才始得和读者见面。

在《读书生活》创刊号这一期,还发表了《怎样养成判断力》与《形式和内容》等文。作者用读书问答的方式,参与当时理论界关于形式和内容的争论,指出利用旧形式的目的,决不是要与旧形式妥协,而是要促进旧形式自身的崩溃,而是要钻进旧形式的心窝里去制它的命脉,我们利用旧形式,始终要抱着斗争的态度,始终要为着打破它而利用它。

艾思奇在《读书生活》杂志上每一期都要发表名词编释,浅显地为读者解答有关哲学的问题。

月底,《读书和创造兴趣》、《两个科学问题》发表,刊《读书生活》一卷二期。

十二月,发表《生死问题和返老还童术》、《关于提倡写别字》,载《读书生活》一卷三期。

一九三五年(二十五岁)

这一年,随着《大众哲学》的写作和部分发表,艾思奇的名字深深地印入读者的心中。他写作劲头更大,不断地把自己的精神产品奉献给广大的读者。

一月,发表《生产要素问题》,刊《读书生活》一卷五期。

月底,作《客观的东西是什么?》、《人和机械》,刊《读书生活》一卷六期。

二月,发表《从新哲学所见的人生观》,载上海《新中华》杂志三卷三期。本文批评十年前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对人生观问题的曲解,指出新哲学既要反对观念论,又要反对机械主义。文章接着对主观和客观、意志自由与因果性以及目的性等作了辩证的分析,说人的“目的是意志活动的中心”,这一点正“是人类生活所以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征。”

同月,还作《意志自由问题》,载《读书生活》杂志一卷七期。

三月,作《论文学的素材题材和主题》,载《新哲学论集》。

四月,发表《客观主义的真面目》,刊《读书生活》杂志一卷十二期。本文指出唯物论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这和客观主义完全是两回事。客观主义的实质就是对环境的完全屈服,是一种无抵抗主义。这种把主观看作毫无能为的东西,将使人不断地消沉下去,是十分有害的。

五月,开始写作《如何研究哲学》,这是一本专供一般读者学习哲学的工具书。本书连载于《读书生活》杂志二卷一、五、六、十、十二期,一九三六年八月,上海读书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

月底,作《怎样活用书本知识》,载《读书生活》二卷二期。

六月,《生产力是什么》、《为什么写作不能忽视技巧》、《各科问题八则》发表,载《读书生活》二卷三、四期。

七月,发表《受不住热也受不住寒》,载《读书生活》二卷五期。《怎样读自然科学》,载《读书生活》二卷六期。同期还刊登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交互作用》。

八月,作《抽象名词和事实》,载《读书生活》二卷七期。本文批判了胡适的“少谈些主义,多谈些问题”的谬说,指出陶希圣用抽象名词用得太空洞是错误的,而胡适因此以为名词可以废弃,则是他的实用主义的表现。

同月,书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在《读书生活》二卷七、八期连载。并作《教育的反作用在哪里》。

月底,作《物质享受与人类存在》,载上海

《通俗文化》杂志二卷四期。

九月，《通俗文的真义》载《通俗文化》二卷五期。《读经吗？读外国书吗？》载《读书生活》二卷十期。本文批判了胡适妄图把青年引向故纸堆啃经书的险恶用心，同时尖锐地批判了叶青主张青年读死书的极端。指出“读书是要针对着现实社会的问题上的需要，因此对于外国书我们选择着读，对于中国本身今日的出版物，也可以从其中选取很好的粮食。”

十月，艾思奇由周扬、周立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月，发表《怎样使思想正确》，载《读书生活》二卷十一期。《观念论的要点》、《什么是机械唯物论》，载《生活知识》杂志一卷一、二期。《你连自己的一切都不了解吗》载《通俗文化》二卷七期。

同月，译作苏联A·蒲格达诺夫著《火星》，开始在《通俗文化》杂志第二、三卷中连载。

十一月，作《谈谈新唯物论》，载《生活知识》一卷三期。

同月，《论黑格尔哲学的颠倒》发表于《新中华》三卷二十一期。针对叶青诬蔑马克思只不过是辩证法的检证者、而创立者应该是黑格尔的谬论，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改造后建立起来的划时代的新哲学。“马克思不仅仅是取消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理性’、‘观念’等形容词，而且改正了被压歪的公式，将辩证法归纳成矛盾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三大定律，把黑格尔认为是低级的质量互变提高为根本法则之一，使矛盾统一律、否定之否定律和质量互变律不能彼此孤立而存在。”揭露叶青“表面上装出批判黑格尔，而骨子里却偷割了黑格尔的肉来出卖”的市侩嘴脸。

同月，发表《吃了亏的人的哲学》、《经验还是实践》、《哲学问题四则》、《人生的三大真理》等，载《读书生活》三卷一、二期。

十二月，作《思想上的官样文章》，载《生活知识》一卷五期。《各式各样的生活》，载《读书生活》三卷三期。《恋爱的本质是性行为吗？》载上书。《失业闹乱子》、《全国学生都活跃起来了》，载《通俗文化》二卷十一、十二期。《有冤无处诉》、《非常时对宗教的态度》，载《读书生活》三卷四期。

一九三六年（二十六岁）

一月，发表《非常时期的观念形态》，载《读书生活》三卷五期。文章指出：“在民族敌人得寸进尺的加紧侵略……的非常时期，民族的解放和民族统一的武装抗争思想，应该是我们共同的最主要的观念形态。一切的观念形态，都得要依属在这最大的原则之下。”又作《生活难、汉奸、民族道德及其他》，载《通俗文化》三卷一期。

同月，《大众哲学》出版。

二月，发表《民族解放运动的镜子》，载《读书生活》三卷七期。《何必悲观》，刊《通俗文化》三卷三期。

三月，读书问答专集《知识的应用》一书出版。本书收入作者近年写的十七篇文章，分作五类问题。书前有李公朴先生作的序。

同月，作《世道不同了——经济结构和政治制度》、《我们不是野兽》，载《通俗文化》三卷五、六期。又作《关于理论的批判工作》，刊《读书生活》三卷十期。

四月，发表《什么叫做进步》、《马达救国论的错误》，载《通俗文化》三卷七、八期。

五月，发表《阿比西尼亚失败的教训》，载《读书生活》四卷一期。又作《救国决不是不要科学》、《斯达汉诺夫为什么工作得很好》，刊《通俗文化》三卷九、十期。

同月，作《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刊《读书生活》四卷二期。本文通过答读者问的形式，回击了《研究与批判》杂志叶青等人对《大众哲学》的诬蔑歪曲，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理解。文中读到差别的东西，只要懂得推移和变化的原理，就应当看到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为矛盾，倘若这两件东西是同时同地在一起而且发生互相排斥的作用。同期，又作《真理的问题》、《宪法和国民大会》。

同月，《新哲学论集》在上海出版。本书收入作者近三年中写的重要论文十五篇，分哲学、文学、自然科学三个部分。书前刊有作者的自序。

六月，译作《新哲学大纲》在上海出版。该书是苏联哲学家米丁等的著作。艾思奇译第一部分，郑易里译第二部分。全书译出后，由艾思奇统校，并作译者序。该书出版，对在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

同月，发表《哲学研究大纲》、《诚恳的忠告》、《恋爱能阻止人们前进吗？》、《认识论上的问题》，载《读书生活》四卷三期。又作《敌人自身的矛盾》，刊《通俗文化》三卷十一期。

月底，发表《关于内因论和外因论》，载《读书生活》四卷四期。本文尖锐批判叶青的“外烁论”，即认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全然由于外来的原因。指出外力是一方面，但还有更重要的一面，那就是中国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从而批判了外因论，坚持内因是事物变化的根据，坚持以内因做基础的内外因统一论。

此时，艾思奇在上海参加文艺家协会，并在《光明》杂志一卷二期发表《文艺家协会成立之日的感想》。又作《文学争论中得到的结果》，阐述作者在文学界关于两个口号论战的立场，认为这场争论是革命文艺阵线内部的事情，争论结果对发展革命文化事业将是有益的。

七月，发表《新的形势和文学的任务》，载上海《文学界》杂志一卷二期。文章说，文学必须跟着时代的变化，每个时代的新的形势必然会给文学提出新的任务。文学能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任务，就在于它是现实的反映，文学的生命就是现实主义。又作《抗战的前途》，刊《通俗文化》四卷一期。

八月，发表《目前中国文化界的动向》，载上海《现世界》杂志创刊号。作者指出，中国近代史证实，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人们都在选择自己的道路。甘做奴隶者在文化上所走的道路是开倒车的路，是毁灭文化的路，只有反抗，才是前进的促进文化的路。如果真心要在中国文化界留一点功绩的话，就应该站到国防文化的联合战线上来，明白地揭出战斗的旗帜，忠实地斗争下去。

同月，作《职业界的救国自由》、《关于国防文学的论战》、《关于〈哲学讲话〉》、《〈哲学讲话〉批评的反批评》等，载《读书生活》四卷七、八期。

九月，作《青年与战争》，载《现世界》一卷二期。又作《纪念九·一八》、《到学校去和到民间去》，载《读书生活》四卷九期。

同月，发表《历史的内因论的具体问题》、《科学的国防动员》，载《读书生活》四卷十期。

十月，《思想方法论》在上海出版。本书是张仲实编的“青年自学丛书”之一种，共六章，着重讲解方法论、物质论、认识论和思想方法论的关系，并且论述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区别以及唯

物辩证法的诸法则和应用要点。

同月，作《证明自己的统治》、《怎样做读书笔记》，载《读书生活》四卷十一期。

十一月，发表《从新哲学谈到爱国青年的自杀》，载《现世界》一卷四期。又作《胡适也挑拨离间》，载《改造月刊》一卷一期。

一九三七年（二十七岁）

《读书生活》杂志出到第四卷，由于它宣传抗日，被国民党反动派定为“反动”刊物，背景是“左倾分子”，因而被迫停刊。艾思奇等人重整旗鼓，改名《读书生活半月刊》出版。

二月，发表《除去着色眼镜》、《旧戏不够反映生活》、《相对和绝对》，载《读书生活半月刊》创刊号。《相对和绝对》一文用通俗浅显的语言分析了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说“绝对主义是和事物的真实情形不符合的，因为事物都会变动，黑暗的社会也会发展成光明，不是绝对的黑暗。光明的东西也是从黑暗中孵化出来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绝对的光明。”“相对主义就是一种怀疑主义”。通篇文章都用抗日救国的事例解释“相对和绝对”的真义。

同月，《民族解放与哲学》出版。本书被列为杨东莼主编的《大众文化丛书》第一辑第二十四种。作者批驳了把抗战联合战线诬蔑为某种党派（即共产党人）少数人的运动，是少数人利用多数人。这种论调无视民族危机日益沉重的事实，因而不能解释爱国运动高涨、民族意识不断强化的根本原因，违背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原则。书中说，历史决非少数人所左右得了的，只是因为他们最敏感、最先意识到民众所要意识的东西。如果没有全国民众本身的要求做基础，任何英雄豪杰甚至神明都无法去推动一个大的运动。作者在哲学上精辟地论证了抗战的兴起是大势所趋，决非偶然。

三月，《读书生活半月刊》杂志被查封，艾思奇等继办《生活学校》杂志。

同月，作《文明又输入到中国来了》、《赛金花的风波》，载《生活学校》一期。文章说，帝国主义输入到中国的“文明是死亡，是破坏，而被破坏的地方和人民里面却因此激起了新的真正的文明的要求，就是要为生存而抗争。”《赛》文说，赛金花是一个事实上的汉奸，但能怪她么？王公大臣、太后娘娘都向侵略者低头乞和，却叫一个

女子施点美人计就想万事如意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要靠赛金花保持部分地方的安全，只有决定全国规模的抗敌政策，中国的自由解放才有希望。

同月起，艾思奇在《生活学校》一至六期共发表哲学问题解答六十五则。

四月，《哲学与生活》出版。本书是作者近年写的读书问答专辑。一九八〇年六月，云南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的节本。书前刊入毛泽东同志的《给艾思奇同志的一封信》和《艾著〈哲学与生活〉摘录》十九页的手稿，毛泽东同志的信中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更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个问题略有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考虑一下，详情当面告诉。”这里提的“疑点”，即指艾思奇在《关于“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一文中谈论差异和矛盾的一段话。

五月，发表《老虎打架和人类打仗》、《关于思想方法论的问答》，载《生活学校》二期。

六月，发表《从二加二等于四说起》，载《生活学校》三期。又作《河为什么向前流》等。作者准备写一本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俗哲学，以上二文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惜由于各种原因而未写完，已写就的十一篇后来被收集在《实践与理论》一书的《哲学讲话》中。

同月，作《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载夏征农主编《鲁迅研究》一书。文章说，鲁迅“很少谈抽象的理论，却最善于分析事实，他甚至没入到最日常的琐事里。他不用理论的公式去套住事实，却爱从事实中找出具体的活的理论。……他没有有意地在讲辩证法，但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地在随时应用。从来天才的思想家都常常要跳出形而上学方法的禁锢，而对于辩证法的发展多少贡献一些东西。这在鲁迅先生，情形也是一样的——他深化了民族的反抗思想，同时也给世界的哲学增添了色彩。”

同月，艾思奇主编的大型理论刊物《认识月刊》在上海出版。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四篇文章：《论思想文化问题》、《从哲学的用处说到爱国的自由》、《身边琐事与伟大远景》、《论批判》。他说，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是对封建传

统的反抗，它诞生在民族资本主义始终是幼弱无力和外力侵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之上。中国不同于欧洲，我们虽然需要民权，但民族问题却是首位的。至于社会的前途是另一回事。总之，新哲学的担当者不能孤独地走自己的路；如果走到极端上去，就要被否定。

同月，作《民族问题及其他》，刊《生活学校》四期。《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载《国民周刊》八期。

七月，作《命运的时代》，载《生活学校》五期。《辩证唯物论梗概》，载《中国农村》三卷七期。《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载《文化食粮》杂志一卷一期。

同月，作《再论批判》，文中说我们的批判决不是简单的否定，正如“主张打倒孔家店的人，在实际上并不是把孔子一笔抹煞，只是把孔子作了一个新的评价。”“前进的批判是以前进的思想为依据，批评的本身，就是在于要建立和充实前进的思想。”

八月，发表《思想的自由和共同的路向》，载《中华言论》杂志一卷二期。

九月，作《不要放松思想的岗位》，载上海《文化战线》杂志一期。又作《论信任政府》，载上海《抗战三日刊》七期。

同月，作《文化在抗战中》，载《抗战三日刊》六期。文章说，敌人的炮火炸毁了我们的文化，破坏了文化人的工作，使得许多人闲下来，彷徨、苦闷，不知所措。文化人应当面对现实，在抗战中为提高民众的认识，清除个人主义的动摇，打破逃避苟安的幻想。现在大家都以到内地去相号召，这是对的。但与其集中在一个高峰上让四面八方当作特殊人物来仰望，倒不如变成一个平凡的人，变成农民、难民、商人……

“七·七”事变以后，抗战形势日趋严重，党根据当时延安理论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调艾思奇到延安工作。九月间，艾思奇和周扬、何干之、李初梨等同志离开上海，取道西安，于十月上旬顺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从此，艾思奇的著述活动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待续）

关于跨地区经济协作和联合的几个问题

黄荣生

—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活动，是在全国统一计划和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密切联系和互相制约地向前发展的。这就必须在发展地区经济分工的同时，加强地区间的经济的联系，建立合理的地区经济的协作和联合。

地区间的经济协作与联合和地区经济分工是具有紧密联系的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地区经济分工是指地区不同专业化生产的独立和分化过程，正如列宁所说，“同一般分工有直接联系的是地域的分工”，是指“各个地区专门生产某种产品，有时是某一类产品甚至是产品的某一部分。”（《列宁全集》第3卷，第389页）地区间的经济协作与联合，是指资金、物资、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互通有无，以便把分布在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在地域上合理地结合起来，把各地区的不同生产过程联结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地区的分工和经济协作是互为条件，密不可分的。一方面，为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经济条件，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各地区必须实行分工，以自己生产多余的产品去交换自己短缺的产品，因此，地区分工是发展地区间经济协作和联合的前提，没有地区分工，根本谈不上也无从实行地区间的经济协作；另一方面，地区间的经济协作又是地区经济分工的重要条件，割断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地区分工就不能顺利进行。当前的情况，强调加强地区经济的协作和联合尤为必要。

（一）开展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协作，可以发挥地区经济优势，扬长避短，提高经济效益。我国各地区资源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也不平衡。在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基础较好，科技力量强，管理经验丰富，内外经济联系发达，但工业过于集中，缺乏原料燃料资源；东北地区重工业门类齐全，有一支较强的技术队伍，自然资源也较丰富，但重工业自我服务比重过大，农业轻工业比较薄弱；而在我国西北地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但开发利用较差，技术力量比较薄弱，管理水平较低。我国轻工业的企业集中在沿海省市，而幅员广大的内地和边远省区只占少数；在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上，上海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比西南、西北、东北三大区差不多高出二至三倍。对于地区之间这种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既不能人为地采取一律拉平的办法，也不能割断地区之间的经

济技术联系，而是应该通过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和协作，把各地区的优势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合理组织生产力。马克思说：“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这是社会的自然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3—424页）

（二）开展地区间的经济联系与协作，加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沿海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促进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的技术转移，从而使不发达地区能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学习和引进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迅速改变落后状态，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例如，湖北省宜昌市纺织行业与上海纺织系统开展经济技术协作，仅用两年多时间，就使每枚纱锭提供的利润提高了四倍多。全行业十二个主要产品中一级品由二个增加到八个，很快改变了原来的落后面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通过与内地的联系与协作，可从内地取得一部分原料、能源，弥补自己的短缺。同时，还可以利用其科学技术比较先进的有利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紧缩一些生产项目，把技术比较简单、外地又能够生产的产品转让给其它地区生产，这既帮助其它地区解决技术上的问题，又使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发展高精尖新产品上，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共同发展。

（三）开展地区的经济联系与协作，能冲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地方工业体系的桎梏，冲破条块纵横分割的状态，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有利于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就一个地区来说，没有必要样样都发展，也不能以满足本地区的需要为限，而应面向全国进行统一安排。凡是本地区没有条件和经济上不合算的产品，可通过国家统一计划的安排和加强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联合来解决。各地区需要量少的品种，全国集中起来就成为中批量或大批量产品，可以采用高效专用设备，组织生产线，做到优质、高产、低消耗。各地区都自行配套、自成体系的结果，只会质量差，产量低，消耗和成本高，品种也满足不了需要。我国有一些适宜于大批量专业化生产的产品，现在还很分散，如汽车、拖拉机等生产就是这样。这与在一个地区追求建立地方工业体系，不恰当地提出要地区成套、提高自给率有关。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必须打破地方自成体系和条块分割的局面，发展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

（四）有利于按照经济规律沟通横向经济联系，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总的说来，垂直的经济联系较为密切，而横向经济联系则比较微弱。在建立地方工业体系的思想支配下，有的地区曾出现闭关自守，划地为牢，排斥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的现象，人为地割断了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在流通领域，国营商业和物资部门都是上下一条线的体制，只有纵向联系，缺少横向联系。我们的行政区划，往往与产品，原材料、燃料的产销联系不相适应，造成地区间流通渠道不畅，梗塞了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协作。为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互相结合起来，发展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全国各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是互相交织、互相渗透的，这就使整个国民经济得到更好地按比例协调地发展。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开展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把一部分地区当作另一部分地区掠夺和剥削的单纯原料基地和工业品的推销市场。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是一种互助协作、互相支援的关系。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有责任从资金、物资、技术上以及采取其它各项措施给予不发达地区以支援。我国自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支援内地不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如适当扩大对这些地区的投资比例，从东部发达地区调进大批设备、物资和技术人材，支援不发达地区的建设。近年来，为了加快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国家还专门组织东部发达地区的一些省、市，对口支援不发达地区。但是，地区之间的经济技术协作与联合不是单向的，沿海地区通过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援，可以获得更多的原材料、能源来源和开辟广阔的市场，也有利于发达地区经济的更快发展。例如，我国能源（主要是煤炭）分布不均衡，北多南少，西多东少，而工业和人口集中的消费区恰恰与此相反，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北京、上海、天津11个省市自治区，近年来每年要从西部调入煤炭约6000万吨。随着经济的发展，东部地区资源将愈来愈短缺，因而对西部地区的依赖关系将愈益加深。在开展地区经济协作中，我们不仅要看到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支援，还要看到不发达地区对发达地区的支援。它们之间是一种互相支援、互相依存的关系。

发展地区经济协作与联合，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正确处理地方和国家的关系，把国家计划摆在第一位，保证全面完成国家下达的各项指标。就各个地区来说，凡是全国规定的生产指标和建设项目，都应当首先全力保证完成；凡是全国规定的物资调拨任务，都应当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凡是同其它地区有关的协作任务，各地区都应当保证实现。一个地区要求建立的经济协作与联合，与全国所要求建立的经济协作和联合，往往是不一致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全国统一的计划经济，必须首先安排全国性的经济协作与联合，才能安排地区性的经济协作与联合，一个省或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协作与联合，要服从全国的统一安排。只有这样，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开展地区经济技术协作，处理地区之间的关系时，除了要从全国一盘棋出发首先考虑国家利益以外，也要注意地区的特殊问题，照顾地区的局部利益，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正确处理地区和国家、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矛盾。

发展跨地区的经济协作与联合，不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内地不发达地区，都要把技术转移和经济发展战略转移结合起来。一方面，技术转移促进经济结构向着完善化和合理化的方向发展，要求经济发展战略作相应的改变；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经济战略的改变，又要求进行技术转移，加速技术变革的进程。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不明确，技术转移将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转移如果不同技术转移相结合，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例如，通常沿海城市是技术转移的一方，由于其

繁重的增产任务和原材料缺乏，往往立足于通过跨地区经济协作向其它地区取得一些原材料，或者返回一些粗加工的半成品，以便为完成生产任务创造有利条件。而内地不发达地区，则通常是技术输入一方，鉴于其原材料的优势和技术上的劣势，往往立足于要把利润大、销路好的产品搞上去。这样一种地区间的协作，由于没有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相结合，往往收效不大。只有把地区间的技术转移与产品转移相结合，地区间的技术转移和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选定相结合，在国家统一计划下，搞好沿海与内地的地区分工与协作，合理布局，才能收到比较好的经济效益。

过去，我们曾经依靠行政手段组织地区之间的协作与联合，虽在短期内见到一些效果，但是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物质利益原则的逐步贯彻，长此以往，这种办法就很难巩固。这就要采用经济手段，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在经济上对双方都有利。这是提高地区协作和联合内在的经济动力。实践证明，凡是坚持平等互利实行地区间协作和联合的，效果就好，反之，成效就较差。地区间的协作和联合，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实质上是关于经济成果的分配问题，它要求参与协作和联合的双方，经济责任和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协作条件和经济利益的分配比较公平合理。联合双方投入的财产作价要合理，按照各自提供的资金、原料、技术、劳力、场地、设施等条件，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作为计算利润或产品分配的基础。利用经济手段开展地区间的协作与联合，要充分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特别是税收、价格、信贷的作用。在税收方面，要按照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协作、联合，促进生产发展和提高经济效果的原则，逐步改进税制。如对某些生产工艺方面实行协作加工生产的，可考虑采取总装厂一次纳税的办法。在价格方面，要改变目前大部分原材料价格偏低的情况，合理确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价，以利于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原料产区和加工地区的经济关系。在价格未合理改革以前，可采取其它一些经济办法，例如让原料产地分享加工地区的利润，产品增产部分按议价出售等，使提供原料的产区，搞初级商品、粗加工的地区能够得到大体与加工地区相近的经济利益，以调动原料产地增产和外调原料的积极性。在信贷方面，对于那些不顾大局、盲目发展、不符合国民经济调整需要的地区经济协作和联合，要加以限制，运用信贷杠杆，加以引导和监督，促进在地区经济协作和联合中注意统一规划，合理布局，避免盲目发展，注意节约社会劳动消耗。

三

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分成几十个省、市、自治区来管，每个地区都局限于考虑本地区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很少考虑地区之间的分工协作；在一个地区内，又是按条条进行管理，各部门由于受其管辖范围的限制，在一个地区确定建设项目和生产任务时，往往从各自本身的利益出发，各安排各的，很少考虑地区综合发展的要求和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协作和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所指出的，中央各部门“现在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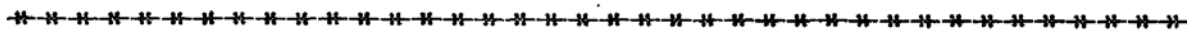
275页)上述问题的产生和存在,归根结蒂,还是个管理体制问题。跨地区的经济协作和联合,既受到部门分割的限制,也受到地区所有制的束缚。因此,打破地区和部门所有制的界限,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是开展地区间经济协作的客观要求,是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赵紫阳同志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政府报告中指出:要“改变那种由地区和部门互相分割,壁垒森严的现象,按照专业化协作的要求和生产的需要,发展各种形式的联合”。

在开展地区经济联系中,中心城市起着枢纽的作用。城市是地区经济活动中心,城市与区域是有密切的内在联系。我国大中小城市各有与其相联系的不同地域范围,大城市往往具有较广阔的地域范围,中小城市各有与其相适应的区域范围。中心城市作为区域经济中心的作用愈大,就可以把周围的经济活动不断地吸引过来,所以要以大中城市为依托,形成各类经济中心,组织合理的经济网络。我们要根据中心城市的不同特点,建立各具特色的经济中心,加强中心城市的横向联系,组织跨地区、跨部门的协作与联合;以中心城市为主,建立全国和区域性的贸易中心,沟通横向经济联系。

当前有些地区搞割据和封锁,利用行政权力搞地区性垄断,封锁原料、封锁技术、封锁市场,阻碍其它地区的产品进入本地市场,以此来保护自己的落后工业。例如有些地区生产的某些机电、农机产品,尽管用户不欢迎,却强行在本地区推销,同时又硬性规定不准本地用户到外地选购同类优质产品;有的原料产区不按国家计划调出原料,却自行加工或高价出售;有的实行技术保密,阻止先进技术的传播和应用,等等。在这种地区封锁政策指导下,凡是本地能够生产的产品,不管质量如何,价格高低,一律不准从外地进货;本地不能生产的产品,则不管客观条件优劣,经济效益大小,也千方百计提高自给水平,逐步减少对外地的依赖。这就使得先进地区物美价廉的产品打不开销路,而落后地区市场上商品品种单一,质次价高,使消费者蒙受很大损失。这实质上是一种保护落后的政策。实行地区封锁政策,必然使各地区的经济朝着门类齐全、自给自足的方向发展,把全国完整的经济体系切割成互相孤立的“王国”,破坏国家统一计划。这样也必然使一些落后地区、企业安于现状,滋长一种依赖性和保守思想,严重地影响各地区的经济的发展。事实表明,要搞好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必须从实际出发,打破部门、地区界限,从全国着眼,有计划有步骤地来规划各地区的分工和协作,搞好生产力合理布局。要开展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协作与联合,逐步消除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别。特别是落后的地区,只有打破地区之间的分割与封锁,与外部发达地区发生日益密切的联系,才能打破自然经济的闭塞状态,迅速改变落后面貌。

要打破封锁壁垒,改变闭塞状况,关键是积极发展商品生产和组织商品流通。商品从生产地区到消费地区,应该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合理渠道,才能缩短商品在途时间,加速商品流转,降低流通费用,改善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但是,我们有些地区至今仍然没有按经济区域,而是按行政区域组织商品流通的。这是造成划地为牢,

以邻为壑，人为地分割市场的一个原因。结果，商品流向不合理，迂回倒流，流转环节增多，堵塞地区之间物资交流，挫伤了生产和流通部门经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江苏省徐州市，原来按经济区域要求，负责安徽省的宿县、肖县、山东省的枣庄等地二十六个基层供销社的供货任务，自从按行政区划分配商品后，就不再同这些地区进行联系，造成一方面脱销，另一方面积压。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改进经济管理体制，按照经济区域，在一个省的范围内，以至毗邻几个省的范围内，实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设置商业经营机构，特别是二级站要打破行政区划来设置。在省与省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县与县之间，按照各类商品不同的产销联系所形成的经济区域，实行商品“跨区供应”和“跨区销售”；有的商品是以利用当地资源生产，为当地人民消费需要服务的，而且花色品种繁多，宜于实行近产近销；有的商品是以利用独特的资源或独特的工艺技术生产的，其产品则行销全国；有些产品，原料和成品的运输量都较大，则宜采用按经济区域配置生产和销售网点。实践经验证明，按经济区域组织商品流通，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是多快好省地组织商品流通的一条重要原则。它有利于生产部门根据市场需要、当地资源等，安排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有利于商业部门按照市场需要，协助生产部门搞好产品规划和合理布局，衔接好产销联系；有利于合理组织商品运输，减少流转层次和经营环节，以节约流通时间，节省流通费用。



“角两雄”解

止水

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之二云：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

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角两雄”，时人每误解其义。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认为：“两雄，谓曹、刘也。”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历代论诗绝句选》也说：“两雄，指曹植和刘桢。”据这些意见，“角两雄”，就是“跟这两位雄杰相斗”了。

按，“角两雄”，意谓“两雄相角”。“四海无人角两雄”，就是说，四海之内，没有人能跟曹刘一决雌雄。“两雄”，指争斗的双方，并不是曹、刘的合称。

元好问《杂著九首》之七亦云：“泗水龙归海县空，朱三王八竟言功。围棋局上猪奴戏，可是乾坤斗两雄？”“斗两雄”，与“角两雄”同义，亦谓两雄相斗。两雄，指围棋的两方。

对计划管理三种形式的认识

林兆木 李主其

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项重要原则，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重申了这个重要的原则，并提出在计划管理上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采取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三种不同的形式。报告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使我们在理论上、实践上正确认识与处理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正确划分三种形式各自的范围和界限，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也为今后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解决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指明了方向。

(一)

对于指令性计划，首先应当肯定它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

指令性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的一种主要的、基本的形式。它由国家计划部门制订、下达给有关部门和企业。指令性计划具有行政约束力，各部门、各企业对有关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必须严格执行，按期完成。指令性计划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才能够实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也编制某种社会经济计划，但是，这种计划对各个资本主义企业并没有约束力。因为在那里，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有，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由各个资本家根据能否获利、获利多少决定的。斯大林曾经指出：“人们有时援引美国和德国的经济机关，仿佛那些机关也是有计划地领导国民经济的。不，同志们，它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并且只要那里的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它们就不能做到这一点。要做到有计划地领导，必须具备另一种工业体系，即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工业体系”。“固然，它们那里也有某种类似计划的东西。但这是一种臆测的计划，想当然的计划，这种计划谁也不必执行，根据这种计划是不能领导全国经济的。我们这里就不同了。我们的计划不是臆测的计划，不是想当然的计划，而是指令性的计划，这种计划各领导机关必须执行，这种计划能决定我国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将来发展的方向。”（《斯大林全集》第10卷，280页）这很清楚地说明了，能够通过指令性计划统一领导全国经济，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特征。

自从我们建立起国营经济，实际上就开始有指令性计划，尤其是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以后，我们的各个五年计划、各个年度计划所包括的主要内容，如基本

建设投资规模及其分配，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及其它主要经济指标，国民经济各个主要部门的重大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等等，都要通过国家计划部门制订和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来实现。由于把重大建设项目的安排，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与分配，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的生产与经营，都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就使各个年度计划、从而使五年计划的实现有了保证。由指令性计划管理的产品，虽然从品种上看比重不大，但从其重要性和产值上看，却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可以保证重要工业原料、设备、能源和人民生活必需品按计划进行生产和供应，并首先保证重点建设和主要部门的需要，以增产短线产品，限制长线产品，使各个经济部门保持合理的比例，实现资金和物资的平衡，保持市场和物价的基本稳定。指令性计划可以促使企业避免从局部利益、眼前利益出发进行重复建设和盲目生产。它对国营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虽然是一种限制，但同时又是一种保证，即为企业提供正常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坚持指令性计划，才能使指导性计划有效地发挥作用，才能实现“计划经济为主”，并使我们的市场调节区别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成为计划经济的有益的补充，真正发挥它的辅助作用。

我们实行指令性计划主要是对国营企业、对工业部门，但是，并不是说，对集体所有制、对农业，就完全不需要指令性计划。在农业中，我们从五十年代就先后对关系国计民生重大的粮食、油料、棉花实行统购，对生猪、鲜蛋、黄麻、部分中药材等关系国计民生比较重要的二类农副产品实行派购。这实际上也是下达带有指令性的计划指标。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必要的，是成功的。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我国尤其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农业不仅提供两亿多城镇及工业人口基本生活必需的粮食和副食品，而且提供60%以上的轻工业原料。如果国家不通过征购、派购掌握必要数量的粮食和其它重要农副产品，就不可能稳定社会经济生活，就不可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在农村集体经济中，农民群众有权独立自主地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分配自己的产品。国家应当尊重集体经济单位、农民群众的自主权。但是，也必须看到，集体经济单位的利益、农民群众的利益和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是一致的。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给全体农民带来利益。所以，国家在尊重集体经济单位、农民群众自主权的同时，对粮食和其它重要农副产品下达征购、派购的指令性指标，这是集体经济单位、农民群众能够接受的。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根据我国计划经济的实践经验和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再次肯定了指令性计划的积极作用，并从原则上确定了它的范围，指出：“对于国营经济中关系国计民生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生产 and 分配，尤其是对于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必须实行指令性计划，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生产的组织和管理上的重要体现。对于集体所有制经济也应当根据需要下达一些具有指令性的指标，如对粮食和其他重要副产品的征购派购。”这里明确地指出了这些范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国家领导下具有一定自主权的经济单位，它的

生产资料不是属于企业所有，而是属于代表全体人民的国家所有。因此，从所有制的关系来讲，国营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如何分配，主要应当由国家通过计划来确定，而不应当完全由企业自行决定。企业的利润要按规定上缴国家，企业不经国家批准不能擅自变卖生产资料，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由国家支配。国家通过计划对企业的生产进行组织和管理，就是国家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支配权的重要体现。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就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和保证。

当然，指令性计划这种计划管理的形式是要不断完善的。过去在这方面曾经出现过不适当地扩大它的范围，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不利于经济的问题。但我们则不能把过去计划工作上的失误同计划经济制度本身混为一谈，从而把指令性计划说得一无是处，同时也不能不注意过去在实行指令性计划方面存在的问题。应当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并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使它不断完善起来。指令性计划要获得预期的效果，就应当力求符合客观实际。所以在计划制订之前，要认真调查研究、精确计算，在执行中又不断研究各种情况的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这样的指令性计划才是切实可行的。实现指令性计划主要是运用行政手段，但是也必须注意运用经济手段。现阶段我们的生产，还是作为商品生产，因而在制订指令性计划和执行指令性计划时，都应当自觉利用价值规律，注意发挥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是完成计划的基础。如果不注意从经济上调动这种积极性，只靠行政手段而不同时辅之以经济手段，那么指令性计划也是难以顺利完成的。

(二)

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地把计划分为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这就是说，计划调节既包括指令性计划，也包括指导性计划，这两个部分构成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构成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的计划经济。这是对计划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指导性计划和指令性计划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间接的计划，后者是直接的计划。国家根据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需要和市场供求的状况，对指令性计划以外的一部分重要产品和企业提出指导性计划指标，为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创造一定的外部条件，并运用价格、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杠杆保证其实现。指导性计划对企业来说虽然不是强制性的，但由于它能够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指出正确的方向，又有各种经济杠杆作为调节手段，就可以促使企业把自己的经济活动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计划调节之所以既要采取指令性计划，还要采取指导性计划，这是因为：第一，在国营经济中，各种产品和各类企业数以十万计，数量大、种类多、分布广，它们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部分，但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作用却有很大区别。国家只对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些重要产品和少数关系经济全局的骨干企业实行指令性计划，对其它许多产品和企业则靠指导性计划来调节，这样有利于指令性计划具备应有的科学性、严肃性，有利于它建立在对供求比较精确计算的基础上，避免过去那种由于指令性计划范

围太宽、计算不准确而造成的产需脱节、经济效益差等弊病。第二，在目前生产力水平和计划手段的条件下，对千变万化的社会需求和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企业生产能力，难以作出精确的计算，单靠指令性计划，是无法自觉地实现全社会的供求平衡的。客观经济生活本身要求以较为灵活的指导性计划弥补指令性计划的不足。第三，对于主要是集体经济的农业来说，国家的计划调节固然表现为对粮食及其它重要农副产品下达具有指令性的征购、派购指标，但是，由于集体所有制以及农业生产本身的特点，在生产方面如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生产的管理、科技成果的推广以及劳动积累等方面，则只能通过指导性计划来调节。

指导性计划是一种有一定灵活性的计划调节形式。指导性计划的实现，主要不是靠行政手段，而以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为主。在这一点上，它区别于指令性计划。但是，指导性计划也是国家自觉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包括价值规律）的体现。它对市场供求的计算虽然不象指令性计划指标那样准确，但是由于国家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活动，拥有了解各种经济情况的渠道和手段，因此一般地说，指导性计划所反映的对各种产品的供求情况，比企业了解的还是较为全面和准确。指导性计划可以帮助企业摆脱价值规律自发作用的支配，避免盲目性。在这一点上，指导性计划又区别于市场调节。它是自觉地把计划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统一起来的产物，但它属于计划调节的范畴，而不属于市场调节的范畴。正因为这样，在计划调节的范围内，指导性计划能够以自己的灵活性对比较稳定的指令性计划起到代偿的作用，同时对市场调节的生产和流通起引导的作用。在我国，由计划管理部门在指令性计划之外提出指导性计划进行计划调节，尚属初试，经验还不足，究竟怎么搞好，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

（三）

正确认识市场调节的含义、地位和范围，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市场调节是指生产和流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进行的调节。就是说，由国家统一计划划出一定的范围，允许这部分产品由经营者根据市场供应和需求的变化自行安排生产和流通，国家除了通过政策法令和工商行政工作从外部实行管理，并适当协助其解决一部分原材料之外，不再通过计划进行控制。在这里，经营者把市场上商品价格的涨落和供求的变化，当作他们经营什么、经营多少的指示器。他们在确定产品的品种、数量、价格、销售方式等方面，比计划管理的产品和企业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调节是辅助的调节形式。由市场调节的生产和流通，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而是计划生产和流通这个主体的补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一部分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为什么还要有市场调节呢？首先，我国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而且发展不平衡，国营经济同集体经济以及少量劳动者个体经济并存，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广泛存在，国家只能通过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直接或间接地调节关

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控制对经济全局影响较大的企业的经济活动，不可能对各种经济形式的所有企业和全部产品都一律实行计划调节。其次，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种类数以万计，其中包括众多的小商品，如各种小百货、小五金、小土产、小手工艺品等等。它们产值小、品种多，生产周期短、占用资金少，运输方便、时间性和地域性一般比较强。这些小商品与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影响它们的供求的因素又比较多，显然适宜于由经营者根据市场变化的情况，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和流通。再次，在国营企业中，特别是占绝大多数的中小型企业，在完成国家计划以后，应当允许它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供求的状况，自由地组织生产和供应。不如此，就不利于全面调动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积极性。因此，市场调节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是社会主义经济所不可缺少的。

实践证明，市场调节在国家计划许可的范围内能够发挥有益的补充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市场调节会促使经营者重视了解市场信息，随时按照市场供求状况灵活地调整紧销或滞销商品的生产和供应，使商品适销对路，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第二，在市场调节的情况下，小商品的价格，会由于供求的变化和产品质量优劣的不同，而在一定限度内自由浮动，这有利于促使经营者在竞争中不断地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第三，市场调节这个领域搞得活、搞得好，对有计划的生产 and 流通，可以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这就说明，市场调节，对生产和流通虽是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

我国的市场调节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从宏观来看，它存在于整个计划经济之中，因此它的无计划只能是相对的。在市场调节的范围里，价值规律是自发地进行调节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是不足为怪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只要计划经济这个主体得到巩固和发展，并且加强国家对市场调节部分的管理和指导，市场调节的生产和流通，就会逐步减少它的盲目性，并充分发挥其补充的作用。

怎样搞好计划经济，是一个重大而复杂的课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工作也在逐步完善，然而整个说来，经验还是不足的。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必然不断有新的问题出现，因此，我们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在实践中必须不断进行新的探索。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 必要性、必然性和实现手段

陈应中

一、计划经济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一) 计划经济的必要性

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的报告中指出“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这就是说，我国经济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计划经济。这也即是陈云同志提出的：“大计划，小自由”的方针。经过这样划分，就不至于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了。很明显，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供销，如果不用计划严格地统一地管起来，在生产则产生大利大产，小利小产，无利不产；在流通，则产生大利大买卖，小利小买卖，无利不买卖了。计划就是要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不能让价值规律自发地起作用。美国不是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倒闭了一万七千多家企业，日本倒闭了二万多家企业吗？我国如果让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就粮食来说，粮价就要提高一倍。这样，整个工资以及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也要相应地提高；或者用国家增加补贴办法，导致国家计划内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困难。二者必居其一，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这两种办法现阶段都行不通，提高粮价，影响全局，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财政无力负担。我国只有实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才能将经济建设搞好。

(二) “计划经济”的必然性

第一，“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的宠儿。能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呢？那只有有一种情况，生产资料不是公有而是私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它可以不受任何计划包括国家行政命令在内的任何约束。美国实行的凯恩斯主义，不是连英美两国有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自己宣告对目前资本主义的滞胀已经无能为力吗？马克思说过，这只能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才能解决。在公有制制度下，正如马克思说的“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454页）可见，

“计划经济”是公有制的必然产物。第二，公有制是人民用生命换来的。由私人所有制变为公有制，是经过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群众流血牺牲、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斗争换来的。如果我们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就必须实行“计划经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对有关国计民生和重大经济部门下达计划；至于小商品，“可以让企业

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灵活地自行安排生产，国家应当通过政策法令和工商行政工作加强管理。”这就能够既搞活经济，照顾了当前人民生活，又保证人民的长远利益。第三，没有计划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只有“计划经济”才能达到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只有“计划经济”才能全国一盘棋，对国计民生做出全面的恰当的瞻前顾后的安排，才能体现公有制，保持和发展公有制。否则各行其是，就会瓦解公有制，危害社会主义。

（三）“计划经济”的灵魂是有计划按比例规律

马克思致库格曼的信中明确指出，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是一切社会的共有规律，不同社会形态能够改变的，只是这一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社会再生产客观上要求保持的比例关系，是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和危机的破坏，强制地暂时实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是通过计划自觉安排的，而且能够经常保持的。斯大林说：“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是当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规律失去效力以后，在生产资料公有化的基础上产生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5～6页）毛泽东说，工业的进行需要有适当的计划。……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相当精密的生产计划，都是完全必要的。在农业要“订立每家耕种计划。”这就是说，所谓“计划经济”，就是要按照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办事，使国民经济各个部门按比例地协调发展。不但国营企业是“计划经济”的企业，而集体企业也要纳入“计划经济”范围，不但工业要实行“计划经济”，而农业也必须纳入“计划经济”范围，虽然范围有所不同，但只有这样才能使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得以贯彻执行。缺了农业计划，也就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内部比例，违反了有计划按比例规律。因此，必须紧紧抓住这个规律，使“计划经济”得以顺利发展。

二、实现“计划经济”的手段：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

除开其他因素外，就“计划经济”本身讲，实现的手段，要靠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不下达计划的按市场需要生产的市场调节了。

（一）必须有指令性计划

社会主义现阶段产品还不丰富，特别我国是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还不够充裕，为着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品和发展社会的需要，更必需分清轻重缓急，适当安排，反映到“计划经济”上，就要有必需坚决执行的、带强制性的指令性计划和用以指导发展方向的，不具强制性的指导性计划，以及不下达计划的市场调节。这目的在于适应现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管理体制。今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计划体制的宽严程度还会有所改变的。

在现阶段，指令性计划，尤其应予以重视。指令性计划应当包括农、工、基（基本建设）、运、物价、外贸、技术引进、财政信贷外汇、劳动工资、科研、高等院校学生和留学生，人民生活水平，消耗和经济效果等主要的总量计划。不包括这些，要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的、稳步的、按比例发展，是不可能的。

（1）农业方面，基本是集体经济，指令性指标只能包括（也必须包括）重要的农、林、牧、副、渔产品的收购和调出调入；而不能包括生产方面，让农民有更大的主动性，避免统得太死，不利于生产发展。

（2）工业方面，主要是对国营企业和部分集体企业，指令性指标应当包括得更加广泛些，重要的工业品的生产、收购、分配和调出入都要下达指令性指标，以便国家掌握更多更全面的产供销情况，更好地安排国民经济。

（3）基本建设方面，由于关系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大问题，因而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新增加的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社会事业的投资效益，以及基本建设中的大中型项目、建设周期和建设进度等，都需要下达指令性指标。

（4）交通运输方面，目前水路运输受到轮船和码头装卸的限制，陆路的汽车运输，受到汽油和运费的制约，而且大部分是短途的，因而主要运输靠铁路，所以下达指令性指标，规定铁路运输必需完成主要的物资运输量是必要的。

（5）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商品的单项价格和反映物价总水平的物价指数方面，也必须下达指令性指标，以保证人民生活并保持物价稳定。

（6）进出口贸易，关系到出口换汇、发展生产、引进先进技术装备和短缺物资，以及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在贸易总额、重要商品和技术进出口额方面都需要下达指令性指标。

（7）在我国具体条件下，国家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和外汇收支，其中用于基本建设，农工产品收购方面，这相当于决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兴衰的“定货单”。因而必须用指令性指标使国民经济得到平衡发展。

（8）其他，关系重大的全民所有制的职工总人数和工资总额；重要的科研攻关项目和重要的技术推广；高等院校的学生、研究生的招生和选派留学生总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重要产品的消耗定额；以及经济效果的重要考核指标等，也都必须下达指令性指标，共同遵守执行。

（二）还要有指导性计划

仅仅有指令性计划是不够的，关系到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比较重要的产供销，还应该指导性计划，这样才能保证经济计划更加适应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有受计划指导的执行单位，都应该以指导性计划为依据，结合社会需要和本单位实际，妥善地安排本单位计划。指导性计划，国家主要是通过各种经济政策、经济杠杆和经济法规加以引导的，但必要时也要辅之以行政手段，促使被指导的单位实现国家计划的要求。指导性计划应包括重要的农林牧副渔五业产品的生产；比较重要的工业品的生产、收购和调出调

入；全民所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人口自然增长率；以及其他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有重要作用的指标。

不论指令性的还是指导性的计划，都必须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小局服从大局，计划外服从计划内。凡不下达计划的，可以根据市场的需要，按价值规律的要求，自行安排生产和销售，即由市场调节，但这必须要在总的计划许可下进行，这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的、无政府状态，是根本不同的。

三、科学地制订计划是实现计划经济的关键

现在问题落到计划工作上来了。必须有科学的计划，才能够实现“计划经济”。

(一)制订计划必须按照党的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这就是十二大提出的工农业总产值从1981年到2000年翻两番。这二十年分两步走，头十年是打基础，后十年是大发展。离开这战略目标，计划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二)制订计划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离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计划就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的，结果就会出现速度虽然不低，但实效很少。党的三中全会以前就有过这样的情况。

(三)制订计划必须按照有计划按比例规律要求。这就说必须根据当前利润水平和财政收入的水平，恰当地安排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必须按照农轻重次序安排计划；必须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惠、互通有无原则下编好贸易计划；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正确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否则就无法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为实现计划而奋斗。

(四)制订计划必须自觉地运用价值规律。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就离不开价值规律。无论是工农产品交换，或是国营企业之间的产品交换，由于双方各自需要进行经济核算，不按照价值交换是不行的。这就是说，无论生产计划或流通计划都离不开价值规律，但是要避免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让价值规律自发起作用。例如对超过社会平均劳动太多的产品生产的企业，只要它是社会需要的，国家就除对其加紧整顿外，也往往采取内部价格和财政补贴等办法，以资补救，使卖价不提高，消费者不受损失。这就是说在编订消费计划和积累计划时必须考虑到价值规律问题。无视价值规律，就会使商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财政短缺，人民不满。

(五)制订计划必须立足于企事业单位(包括全国性、全省性、全区性的联合体)，从企事业编起。企事业单位是经济的实体，脱离经济实体的计划，很难达到预期的目标。

清远县工业企业经济责任制 发展的情况和经验

曾牧野

清远县工交战线的同志们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者。清远县现有十七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一九八〇年实现利润542万元，一九八一年实现利润926万元（比进行改革前的一九七八年的利润额增长近8倍），上缴地方财政的利润也逐年增加，一九八〇年为150万元，一九八一年为199万元（比一九七八年的34万元增长4倍多），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显著的经济效果？主要是由于这两年在一九七九年改革奖励制度、试行企业扩权的基础上，建立和实行了经济责任制。

经济责任制发展的情况和做法

一九八〇年实行的经济责任制是“利润包干，超额分成”。一九八一年有了发展，叫做“递增包干，一定三年”。

“利润包干，超额分成”的特点、要求是：把过去由县财政局直接向企业下达利润指标，企业向财局上缴计划利润的财务管理体制，改为由县经委对县财局实行利润包干、企业对县经委实行利润包干的体制。其做法是：（1）由县委出面，找经委与财局两家协商，根据上年计划利润和对下一年生产经营的预测，确定经委对财局的利润包干数。一九八〇年利润包干150万元，比上年上缴利润109万元，增长37.6%。（2）确定超额利润的分成比例：企业得一半，经委得一半。（3）经委找各企业协商，确定各企业的利润包干数，即企业的计划利润指标。（4）企业和群众要求继续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奖励制度，因为超额利润的分成到年终才结算，而奖金的结算是以月为周期，即从超计划利润中按各企业情况分别提取15—25%作为奖金，月超，月提，月奖。由于继续实行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所以县经委在确定各企业年利润包干数后，还要象过去那样，按月给企业下达利润计划指标，作为工人提

奖（指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的奖金）的依据。多超多提，少超少提，不超不提。这一制度执行结果，情况良好。一九八〇年虽然由于经济调整，电机、农机等生产任务严重不足，再加上农村甘蔗种植面积减少、蔗糖减产，因而工业产值比上年下降2.4%，但是工业盈利额仍大幅度增长。十七家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各项综合经济指标也完成得好：百元固定资产提供的利润为16.33元，比全省地方国营工业平均水平高31%；百元产值提供的利润为14.01元，比全省地方国营工业平均水平高42%；百元流动资金提供的利润为45.5元，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9.89%。

企业干部和职工在高兴的同时，又担心以上一年年终实际达到的利润额作为当年包干基数、包干基数会年年加码，产生“鞭打快牛”的不合理现象。因而他们要求上级主管部门改“环比”法为“定比”法，一定几年，逐年递增。县经委研究后，报请县委裁决，也征得县财局同意。于是从一九八一年起，实行“利润包干，逐年递增，超额分成，一定三年”的办法。基本做法与上述一九八〇年的“利润包干”大致相同，但超额利润的分成比例作了调整：企业得50%，经委得30%，县财政局得20%。（上一年县财政局没有从超额利润中享受分成）此其一；其二，最大的不同是一个“定”字，而且“一定三年”，即以一九八〇年的利润包干150万元作为基数，以后每年递增10%，确定一九八一年利润包干165万元，一九八二年利润包干180万元，一九八三年利润包干200万元。这样一“定”，就政策稳定，生产关系稳定，人心稳定，企业干部和工人们拍手称庆。各企业纷纷制订三年发展规划。砖瓦厂原打算一九八一年用部分利润分成的资金盖职工宿舍，听到“一定三年”的政策后，马上修改计划，说“早投资，早收益”，我们再苦干两年，才盖大屋。有的说：“生产上去了，职工福利的事就好办了。”工

人们自觉地正确处理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问题,出现了一场大干社会主义事业的可喜现象。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共同劳动的场合或组织,都需要管理;而管理的中心环节就是要使人人职责分明,并努力完成各自所承担的工作任务或生产经营任务。列宁在总结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时,指出:“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一定的人对所管的一定的工作完全负责。”(《列宁全集》第36卷,第554页)并向干部们发出了“学会管理俄国”的伟大号召。建立生产经营管理的责任制,是生产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客观要求。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也曾建立过各种形式的管理责任制,但不巩固,有的甚至是徒具形式、名存实亡。究其原因,乃统收统支、吃大锅饭的体制所致。只讲国家利益,不讲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利益,企业盈利多少统统上缴,企业对亏损不负任何经济责任。这就必然形成企业“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惰性局面。实行以“利润包干”为主要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正是针对这种弊端,进行改革,把企业的管理同物质利益原则结合起来,把企业和工人的合理收入同企业的经营效果联系起来。这样,就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找到了内在的发展动力,并使企业的管理责任制找到了实现、巩固和发展的有效途径。

至于清远县一九八一年“递增包干,一定三年”的做法,一个“包”字,再加上一个“定”字的经济责任制,还有其独特的优越性,就是能够赋予企业以更大的灵活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企业和工人更好地运用已经取得的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认真搞好供、产、销诸环节的衔接工作,充分发挥人、财、物诸生产要素的作用,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益。“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跃。”(《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这种把经济责任、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结成一体的管理体制,在清远县就是一个包字,再加一个定字。

关键是要搞好企业内部 的经济责任制

根据清远县的经验,实行全面的经济责任制,必须解决两个关系:一是国家与企业的关

系。通过企业(经委)对国家实行“利润包干”,使企业承担国家一定的财政经济任务,改变过去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的情况;二是企业与工人的关系。通过企业把利润包干指标,分解、落实到车间、班组、个人,使每个劳动者承担企业一定的生产经营任务,改变过去工人吃企业的“大锅饭”的情况。

解决这两个关系的基础是依靠工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因此,企业的利润包干数确定之后,经委和企业及时地把企业干部、工人的精力引导到改进管理工作,建立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怎样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一)利润包干的经济责任,一定要落实到车间、班组(或个人);

(二)必须健全企业、车间、班组的经济核算。

如何健全经济核算制?

第一,要有全面考核的经济技术指标,包括产量、质量、成本、降耗、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不能单搞利润指标,以防止和克服“大利大干、小利小干、无利不干”的消极倾向,堵塞靠歪门邪道、滥发奖金、化公为私、挖国家墙脚的种种非法行为。

第二,经济核算制要和实行合理的奖励制度结合起来,保证超计划利润提成奖的贯彻,使奖金得到合理的分配,多劳多得,多超多奖。一般做法是记分算奖。企业每月月终结算,从超计划利润中按规定提取一定比例,作为奖金总额。厂部根据各车间每月完成各项经济技术指标情况,把应得的奖金发到车间;车间根据各班组的总分,计算分值,发到班组,班组直接核发到个人。这样,在企业内部,各个车间、各个班组及个人,由于完成各项生产指标的情况不同,奖金水平也就有所差异。这种差异,正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说明平均主义分配奖金的弊病得到纠正。

(三)实行经济责任制,应该有奖有罚,该奖的奖,该罚的罚。工人若完不成规定的生产任务,或玩忽职守,造成质量、安全事故,损坏机器设备者,要给予经济上的处罚。清远县的多数企业都建立了这种奖罚结合的制度。

(四)加强成本管理、质量管理是当前改进

企业管理、实行经济责任制的两大关键措施。这几年，清远县地方工业产值增加幅度不大，但是利润额却成倍、几倍地增长，除了产量的增加、调整转产对路等因素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成本的降低。它们的措施，诸如降低物耗、节约费用等等，每年由此而减少的成本开支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几十万元。

在调查访问中，我们高兴地看到价值规律正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生产中发挥着调节作用。这里说的“调节”，不是指企业盲目追求利润，“利大大干、无利不干”的那种情况，而是说价值规律通过市场、通过竞争而加在企业、工人身上的一种强制力量，促使他们精确地计算生产量，学会经营，降低成本，使单位产品耗费的劳动量，低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量，保证产品的竞争能力，保证企业盈利。斯大林讲到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现实意义时说：“这是很好的实践学校，它促使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迅速成长，迅速变成现今发展阶段上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单行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15页）这个精神，对于我国当前改革体制，提高经济效益，加快“四化”建设是很适用的。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经济责任制的内容、特点，可以作出如下的概括：

（1）它必须承担国家一定的财政经济任务；

（2）它不仅是为了解决企业的盈亏经营问题，而且要求改进企业的管理。必须通过建立和健全企业的经济核算、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来建立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3）在处理国家、企业、个人的经济利益关系问题，必须坚持“三兼顾”的原则。

兼顾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的经济利益

一个国营生产单位，一年增加多少收入，总得统筹筹划，合理分配。一要拿钱吃饭，二要拿钱建设，个人的奖金水平要适当。“三兼顾”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早在《论十大关系》中已说得很清楚：“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

恐怕不妥。”国家利益、生产单位利益、劳动者个人利益，“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毛泽东同志强调说，“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两年来清远县在处理利益分配问题上贯彻了“三兼顾”的原则。

一九八〇年实现利润542万元的分配情况是，国家方面分配348万元，占利润总额的64.21%；企业分的钱占利润总额的8.09%，经委分的钱占3.1%；职工奖金收入占利润总额的19.6%。归还技措贷款列作“其他”项支出，占利润总额4.98%与一九七九年的水平差不多，看来是适当的。

一九八一年盈利水平大幅度提高，实现利润达到926万元。其分配情况如何？县经委算了一笔详细的926万元利润的列支账：

（1）按包干任务，上交县财政165万元；

（2）按包干合同规定，县财政从年终超计划利润分得34.02万元；

（3）归还技措贷款139.77万元；

（4）按省政府政策规定，给氮肥厂定额补贴40万元；

（5）按省政府政策规定，氮肥厂盈利160.25万元，全部留厂使用；

（6）甘蔗价外补贴23.31万元，返还蔗农利润9.38万元，两项合计32.69万元；

（7）企业年终从超计划利润中分成122.66万元；

（8）县经委年终从超计划利润中分成51.04万元；

（9）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的工人奖金181.32万元。

国家是否多得了？第1至6项，均属国家所得，合计571.73万元，占实现利润的62.1%。因为归还技措贷款是财政上允许列支，作抵交利润处理的；氮肥厂定额补贴原是纳入财政预算的；甘蔗价外补贴和利润返还是省府规定的现行经济政策，面上企业也是作抵交利润处理的。企业所得部分占利润总额的13.23%，工人奖金占利润总额的19.52%。

由此可见，县经委、县办企业在处理“三兼顾”问题上，是顾全大局的，符合国务院关于“国家所得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六十”的规定。他们

的经验是：①确定利润包干基数，处理超额利润分成，发放奖金等问题，都必须以兼顾三者利益、保证国家多收这个指导思想，作为分配利润的出发点；②县经委年终算一次总帐，通报各方（县委、县办企业、县财局、地区和省经委等单位），大家评议，分配结果若符合“三兼顾”原则就坚持做下去；若有不当就改正。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企业所得部分不大，这没有多大争议。那么工人的奖金收入是否恰当，认识上就不大一致。清远县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工人的奖金收入来自两个渠道，一是每月从超计划利润中提取的奖金，一九八一年实发奖金142.09万元，平均每人每月19.84元左右；二是从工资总额按规定的比例提取的综合奖，平均每人每月约六元。这两笔收入，合计25.84元。这个水平，比省规定的奖金控制额超过一点。但我认为这是基本合理的、恰当的。判断奖金收入是否合理，最重要的标准，是要看来自正道，还是来自歪门邪道。如果工人经过出力流汗、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了企业的盈利水平，在保证国家多得的前提下，每月多得几元奖金收入是受之无愧的。不这样分配，怎能体现超计划利润提成奖是工人超额劳动的物质报偿呢。如何适当控制与利润挂钩的奖金水平？清远县的经验，主要是通过调节超额利润提成奖金的比例（或大一些，或小一些）来进行的。这比用行政的方法下达一个控制数可能要好一些。因为通过经济手段进行适当的控制，有利于鼓励工人、企业更积极地挖掘生产潜力，争取更大幅度地提高盈利率，争取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为了贯彻“三兼顾”原则，维护国家利益，保证个人收入来源正当，清远县经委采取许多有效措施，严格地执行了国家的财经纪律：（1）一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例如一九八〇年底有一工厂搞“帐外经营”，将销售议价产品获得的一万四千九百元“利润”收入，以“股分红利”名义全部分给干部、工人。县经委发现后立即找工厂负责人谈话，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着令检讨，并发文通报全县工交企业，将这笔钱追回，收归国库，对有关人员按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程度的经济制裁（如扣罚奖金）。（2）平时建立财会联合审查、监督制度。每月各厂财会人员到县经委集中一次，检查各企业的财务经营情况；每一季度集中联审一次，全部财会人员到县经委集中，然后

分头到各厂会审财务帐目。（3）县经委财会科干部经常下厂抽查帐簿，若有违章，立即纠正。如一九八一年有一工厂少报成本开支，多报盈利数额，县经委发现后立即给予批评纠正。（4）县经委分工一位副主任专管企业财务工作。实行利润包干责任制以后，县经委严正申明：各工业企业要接受县财政、金融部门的检查、监督。

总之，严格纪律，坚持制度，就能防微杜渐，防止和克服弄虚作假、化公为私的非法行为，做到生财有道，聚财合理、用财得当。

实行经济责任制 促进企业的技术改造

改革体制、实行经济责任制后，近两年清远县经委和工业企业手中有点钱，包括利润分成、固定资产折旧费和大修理费约共七百多万元。这些钱怎么用？除安排小部分钱盖点职工宿舍、初步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外，绝大部分用于扩展生产能力。

如何扩展生产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扩大再生产有两种形式：就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旧厂之外添设新工厂，和从内含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生产规模。县经委和企业负责人以及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详细审议之后，选择了内含型为主的生产扩展道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企业的技术改造。需要重点发展的企业和需要调整转产的企业，多花一点投资，主要用于某些扩建工程和添购新的设备。例如机械厂，原生产球磨机，去年转产、发展钢窗生产等十个项目，大约花去资金245万元，其中企业自行解决156万元（利润分成与折旧基金），经委帮助解决21万元，向银行贷款和借氮肥厂利润60万元，上级主管部门支持8万元。对于生产比较正常的企业，投资主要用于改造设备、搞技术革新等。例如氮肥厂围绕“节能降耗”，革新工艺、改造设备24个项目，就投资32.71万元。几年来，清远县十七家工厂依靠企业和经委自有资金以及银行的贷款，进行挖、革、改项目有437项，其中经济效益较大的有162项；改造旧设备185台；添置新设备243台（套座）；修建厂房3万多平方米。较大规模的扩建改造项目15个是在一九八一年进行的，总投资额960万元（其中贷款625万元）。一九八一年几项主要的经济技术指标的完成情况很

好：①产量增加。在23种主要产品中，产量比上年增长的有17种，其中磷肥增长54.1%，出口日用细瓷增长30%，水泥增长15%，碳铵实物量增长10.2%，火柴增长12.7%。②质量提高。在13种可比产品中，质量比上年提高的有10种，其中超过企业历史最好水平的有4种。③成本下降。可比产品总成本为2550万元，比上年下降4.7%。④全员劳动生产率 达到6954元，比上年增长6.4%。⑤百元产值利润率为21.86元，比上年增长56%。⑥实现利润926万元，比上年增长70%。

清远县的实践，有助于我们解决两年来在经济学界中的争论：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能否让国营工业企业拥有一定的扩大再生产的资

金呢？回答是肯定的。那种认为只能把固定资产折旧基金和必要的大修理费留归企业使用、掌握的意见，是值得商榷的。当然，国营企业用自有资金扩大再生产而添置的固定资产，其所有权仍然属于全民所有，其使用权属于企业，企业要定期向国家交纳占用固定资产费用。让企业拥有部分自有资金，有利于使企业逐步改革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成为一个有生命力、能靠自身力量不断发展、不断增值的“经济细胞”，我想这正是我国进行经济改革应该达到的目标之一。我们国家可以通过经济杠杆、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干预，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



“嚼杨木”证

易知

《学术研究》八二年第四期上，有易名《“嚼杨木”辩》短文，引清人赵松谷对王维“斋时不乞公，定上空漱口”这句诗的注释为证，得出结论“杨木即齿木，即今之牙刷是也”。读后，感到不甚确切，因想给补正一下。

其实，《佛学大辞典》中“杨枝”这一词条下，就解释得很清楚，兹摘抄如下：

“杨枝：梵曰憍哆家瑟陀Dantakāstha，译曰齿木，嚼小枝之头为细条，用刷牙齿者。杨枝者义译也。……‘憍哆’译之为齿，‘家瑟陀’即是其木。”

可见“杨枝”是“义译”（应为“意译”），那“齿木”，也不是“音译”，且叫做“硬译”吧。用今天的术语来说，都该属于“意译”的范围。而“杨枝”已带有引申意味了。所以，为避免误会，注释又多说了几句：“凡西国请俗人，先赠齿木及香水等，而祝其人之健康，以表恳请之意，故请佛菩萨亦用杨枝净水。”

至于“齿木”的用法，也介绍得很清楚：

“寄归传一曰：‘每日旦朝须嚼齿木揩齿，刮舌务令如法，盥漱清静，方行敬礼’”

况且，“齿木”当初译为“杨枝”就很不准确。《大日经疏·五》上说：“彼当取优昙钵罗或阿说他木，端直嫩好者，不粗不细、剂十二指量……此二木是过去佛菩提树。若无者，当求有乳之木，谓桑谷等。”《昆尼日用切要》说得更明白：“取杨枝，律中名曰齿木。杨有四种，皆可疏齿也。”“今咸以柳条当杨枝，柳条垂下乃小杨也。若无柳处，将何疏齿？须知一切木皆可疏齿，皆名齿木，但取性和，有苦味者嚼之，不独谓柳木一种。”

由上可知，不独“杨木”与“杨枝”有别，“齿木”与“牙刷”也不等。

香港玩具业的发展

雷 强

玩具业是香港的重要工业之一。就出口销量来说，在香港工业部门中居第三位，仅次于成衣业和电子业，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就劳动就业人数来说，在香港工业部门中居第四位，仅次于成衣、电子及纺织工业，它雇佣的工人，占全港制造业人数百分之六点二。香港玩具业自一九七二年开始，在出口总值方面就已超过“玩具王国”日本而居世界第一位。而且至今整整十年，一直雄踞世界前列。现仅就其发展的状况和特点简述于下。

一、香港玩具业发展的状况

香港的玩具业是近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四十年代中期，香港只有十多家设备简陋的小型家庭手工业作坊式的玩具厂，制作一些以泥土、石料、木头、金属、纸及布等为原料的简单玩具。六十年代中，塑料工业兴起，厂商制造出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新型塑料玩具。塑料工业的发展为玩具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直至今，香港玩具出口仍然是以塑料为主要原材料来制造。七十年代初，香港电子工业大发展，电子产品纷纷出现，玩具与电子产品相结合，大量生产自动、灵巧、美观、饶有趣味的电子玩具。电子工业的发展，为玩具业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香港玩具从出口总值增长来看，一九六一年为一亿三千五百万港元，一九七一年增至十二亿五千三百万港元，一九八一年激增至七十三亿一千三百万港元。十年中平均增长率达百分之二十一。其中，一九八一年比一九八零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三。二十年间，出口总值增长五十三倍。在资本主义世界不景气影响下，香港各业刮起一片淡风，但港制玩具出口仍续增。一九八二年头四个月，香港玩具出口总值为二十三亿元港币，比一九八一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从出口数量来看，也比一九八一年同期超出百分之三十。从企业数和就业人数看，也有较大发展。一九七一年十二月，玩具厂为一千二百七十家，雇佣四万零一百七十三名工人。至一九八一年九月，玩具厂增至二千一百八十五家，工人共达五万六千四百五十五人。从玩具工业的进化来看，一九七一年香港玩具业所雇佣的工人有百分之九十二受雇于塑料玩具工厂，百分之五受雇于金属玩具工厂，只有百分之三受雇于其他种类的玩具厂。但到一九八一年，塑料玩具的重要性相对下降，雇佣工人由原来占玩具工业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二下降为百分之八十，而金属玩具及其他种类玩具雇佣的工人在玩具业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分别增至百分之十二和百分之八。在出口比例中，塑料玩具所占份额已由一九六一年的百分之八十五降至一九七

一年的百分之八十二，一九八一年又下降为百分之五十七。但是塑料玩具出口仍占香港玩具出口总值的多数；而且许多电子游戏机、电视游戏机、遥控玩具等虽不算塑料玩具，但它们的外壳及某些部件，许多是塑料做的。

香港玩具品种繁多，有人估计约有一百多万种。有用各种不同材料制成的玩偶：如橡胶、金属、塑料、布质玩偶，非电动的塑料、金属、布质玩具，电动的橡胶、金属、塑料、布质玩具，装内燃机的玩具，电视游戏机、电子游戏机、遥控玩具，光控、声控玩具。有传统性玩具，亦有取材新颖、日新月异、日益发展的电子玩具，还有近年发展起来的太阳能玩具；有一般的儿童玩具，也有具有教育意义、启发儿童智慧的“益智玩具”；不仅有适合小儿玩具，而且有各式各样的对成年人亦很有教育意义的玩具。近年来还有结合室内摆设的室内高级玩具装饰品。今天的玩具已经不是单纯的儿童玩物，愈来愈多的成年人对它发生浓厚兴趣，它已是人们不可少的文娱用品，是孩子们和成年人的“良师益友”。从一定的意义来说，发展玩具业也是一种智力投资。为满足各种各样用户需要，香港的玩具业向品种多元化方面发展，取得了很大成效。

香港的玩具工厂，大多是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仅有寥寥可数的几家。据一九七八年统计资料，玩具厂中有百分之八十八是雇佣工人不足五十人的企业。在一千八百九十家玩具厂中，只有十三家塑料玩具及一家金属玩具厂，是属于雇佣工人超过五百人的企业。

港产玩具以外销为主。按最近香港统计处发表的香港工业调查资料表明，一九七八年港制玩具中，占百分之九十五是销往海外市场，销本地仅占百分之五左右。而玩具出口又集中于工业发达的国家。〈1〉美国是香港玩具出口的最大市场。一九八一年对美国的玩具出口价值为三十五亿三千六百万港元，占港玩具出口总额百分之四十八；一九八二年一至四月份，美购入港制玩具价值共十一亿三千五百万港元，占香港出口玩具总额的一半以上，比一九八一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八十一。〈2〉英国是香港玩具出口的第二大市场。一九八一年对英国出口玩具的价值为七亿二千五百万港元，占港出口玩具总额的百分之九点九；一九八二年一至四月份，玩具出口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十一。〈3〉西德。一九八一年对西德的玩具出口价值为四亿一百万港元，占港输出玩具总额的百分之五点五；一九八二年一至四月份，玩具出口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八。〈4〉加拿大。一九八一年对加拿大的玩具出口价值为三亿五千万港元，占港输出玩具总额的百分之四点二；一九八二年一至四月份，玩具出口值比上年同期增长了百分之一百。〈5〉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一九八一年港制玩具输出价值及占港制玩具出口总额的百分比依次为：澳洲，二亿二千二百万港元，占百分之三；意大利，二亿一千五百万港元，占百分之二点九；法国，一亿七千万，占百分之二点三。以上七大市场占港制玩具出口总值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二。

日本也逐渐成为港产玩具的重要市场。现在港制一般塑胶玩具已成为日本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港产品约占日本进口的四成。一九八一年港制玩具输往日本共九亿二千三百

万港元。

为避免市场过于集中，减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香港玩具业，除发展原有的市场外，近几年来还积极开拓世界其他市场，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市场。一九八一年港制玩具对发展中国家、地区输销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如：输往南非一亿一千八百万港元，增加百分之七十三；输往委内瑞拉一亿五百万港元，增加百分之三十六；输往智利九千六百万港元，增加百分之五十四；输往中国内地六千七百万港元，增加百分之九十七；输往沙特阿拉伯八千四百万港元，增加百分之二十六；输往新加坡一亿三千二百港元，增加百分之十七。

开拓海外新市场并非易事，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与当地政局、经济发展水平和港商资本周转等关系密切，困难很多，需要作许多的努力，才能长期奏效。

虽然港制玩具在出口总值方面居世界第一位，已愈十年之久，但香港本地玩具市场，绝大部分靠进口。若按前述港制玩具中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外销世界市场，而仅有百分之五左右作为本销。据此推算，一九八一年港制玩具本销值为三点八五亿港元。而一九八一年香港进口各种玩具共九亿一千万港元，剔除转销其他市场一亿六千万港元，留供本销为七亿五千万港元。两数合计，一九八一年香港市场玩具总销值为十一亿三千五百万港元，其中进口货占百分之六十六，港制品只占百分之三十四。

在一九八一年香港进口玩具留作本销的七亿五千万港元玩具中，以杂项玩具三亿五千八百万港元为最大宗，占进口玩具本销总额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八；其次，非电动塑胶玩具是一亿二千三百万港元，占百分之十六点五；电子游戏机九千八百万港元，居第三位，占百分之十三。

香港进口玩具，以日本玩具为最多。在一九八一年香港进口的本项玩具中，日本来货占整个进口玩具值百分之三十四点八；台湾省来货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一；美国来货占百分之二十二点八；菲律宾来货占百分之九点一；新加坡来货占百分之五点一。其他由英国、丹麦、意大利、马来西亚等国供应。而在进口的非电动塑胶玩具中，日本来货数值最大，占百分之四十九点七；中国内地来货占百分之十五点六；台湾省来货占百分之十点五；美国来货占百分之九。

香港玩具市场年销逾十一亿港元，不算是个小市场。然而香港玩具市场本身却主要依赖别国、别地区进口来解决。考其原因主要是厂商认为香港玩具市场不大，本销获利不多，不予更多的重视；又害怕一旦在本地销售，产品容易为别厂所模仿、抄袭，结果会影响到本厂的产品出口竞争能力。但港制玩具本销市场是有发展前途和潜力的，近年来香港当局和厂商对玩具业本销已开始重视。

二、香港玩具业的特点

迅速发展起来的香港玩具业在生产经营上具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一种竞争力。这些特点主要有：

1. 厂商在生产与经营上适应性强，对国际市场变化反应快。诚如香港其他工业一般特点一样，香港玩具厂商在生产与经营上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对国际市场动向十分敏感，能够迅速作出反应，适应潮流。如八十年代开始，美国航天飞机一出现，香港为此仿制的玩具在一九八一年初便投放市场；星球大战电影兴起时，厂商在十多天内就制出各种星球人物玩具，迅速运销海外市场；又当超人电视片集流行时，厂商随即在港大批生产超人玩具，迅速运往海外各地展销；太阳能也被应用到玩具上来了；一九八二年香港市面已经开始出售各种太阳能玩具，如荷兰磨坊模型、直升飞机、汽车、自行车等。它们的运转不靠电池和电力，而是靠利用太阳光能或灯光的照射，使玩具活动。一种新产品从设计到生产，一般不需半年，比国外快二至三倍。这种适应性强和反应快的特点，除了香港厂商具有比较敏锐的头脑，生产条件比较优越，还由于厂商在世界各地能够及时迅速地了解到玩具市场的行情和动向，加上香港的通讯和运输条件又十分优良，使货物运输非常快捷。

2. 有关行业密切配合，形成联营和配套的生产体系。香港玩具业由于有小五金、橡胶、塑料、电子和制衣等行业的配合和支持而得到较大的发展。这些行业为玩具业供应原料、零部件和提供先进的技术，使玩具业不致于搞“小而全”或“大而全”的生产，而牵掣了厂商的设备、技术、人力和资金，延缓了玩具业的发展；玩具业与发展起来的小五金、橡胶、塑料、电子和制衣等工业搞辅助性的配套生产，因而形成相当齐备的玩具业的配套生产体系；玩具业与这些行业互相配合，联合经营，一起得到迅速的发展。

3. 重视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设备，讲究产品质量的提高。香港玩具厂一般都购置自动化模压机，一些大厂还设有电子仪器，在压注模塑和压铸自动化方面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又积极购买外国专利，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其生产条件和生产水平，在邻近仅次于日本，而高于台湾省和南朝鲜等地。香港还经常举行玩具设计比赛，借以提高玩具的设计水平，促进整个玩具业的发展。近年来由于电子业的迅速发展，玩具业与电子业结合，大量生产各种玩法新奇的电子玩具，适合各种年龄的人使用。港制玩具厂商十分讲究产品质量的提高。他们重视产量和质量的管理，产品出厂前都经过严格的检验把关，保证质量，按时交货，严守信用，在买家中享有很好的信誉。香港玩具业日益趋向高质化、多元化和电子化发展。

4. 积极培养设计人员，不断改进产品和包装的设计，以生产适合潮流的新产品。香港玩具厂商初期缺乏专业设计人员，特别是后来在电子玩具制造方面，未能生产出新颖和独特的玩具，产品多属装配和模仿性质。后来积极培养本厂的设计人员，并且经常进行市场研究，结合市场变化，不断创造出新产品适应市场需要。如前面所述，当前出现什么新事物，很快便会反映到玩具上来了。又如在设计方面由过去纯粹是儿童玩具扩大到成人玩具来了。由单纯的玩物发展到益智玩具和精致的室内摆设了。由此可见，港制玩具的进步和发展，重要的是由于厂商对产品设计方面的重视，培养了一批设计人员，使他们能及时地制造出独特的产品来。这些独特产品，大大地增强本身的竞争能力，给

企业带来更大的收益。因此，积极培养设计人员是香港玩具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是玩具业的一项重要、迫切的智力投资。

5. 香港有关官商团体的引导和支持。如香港贸易发展局和一些商业社团经常组织香港玩具厂商参加世界各地的国际玩具展览会，组织贸易推广团到世界各地了解市场行情，交流生产经营的经验，推销本港产品。并且从一九七五年开始举办一年一度规模庞大的国际性“香港玩具礼品展览会”，为港制玩具扩大影响，争取买家，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有关官商团体组织还经常提供有关国际玩具市场销售情报和资料，引导和帮助港商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香港有关官商团体机构的引导和支持，对港制玩具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目前，香港玩具业的发展，也如香港其他工业一样遭遇到不少困难。由于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衰退对香港的冲击，海外市场订单减少，给玩具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而香港本身又因为高地价、高房租、高利率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加价风的影响，致使玩具业本身工人的工资和其他成本提高，加上玩具业长期存在工人短缺的情况，等等，都不利于玩具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而在海外市场上，港制低档玩具近年来又遇上南朝鲜、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强有力的竞争。为减轻上述困难，加强港制玩具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有的厂商打算在广东经济特区、内地或澳门设厂发展玩具业。这些地方或是地广人稀，或是劳动力众多，地租及工人工资又较为便宜，可以使产品成本降低。一些技术要求较普通的工序如喷油、啤制和洋娃娃衣服的缝制等均可以在经济特区和内地合作进行。中国设置经济特区，将会对港制玩具行业的厂商到内地投资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资 料 来 源

①《香港的玩具工业与荷兰的玩具市场》，香港贸易发展局，载《香港中华总商会会刊》1982年第2期；

②《香港的玩具工业与玩具市场》（专辑），载《经济导报》，1982年第16期；

③《香港玩具业的发展》洗子恩，载1982年3月16日《羊城晚报》；

④《香港玩具出口总值二十年增长五十三倍》，载1982年6月28日《深圳特区报》。

论精神文明发展史研究与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史 扬

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历史。人类历史的发展极为复杂，就其内容来说，可以分出许许多多的专门史；把各专门史概括起来，其中就有物质文明发展史和精神文明发展史两大门类。

精神文明是随着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产物。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的条件下，文明时代是以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为基础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积累了极其丰富、极其珍贵的精神文明的瑰宝，至今仍闪烁着耀眼的光辉，这是精神文明史中的精华；同时也留下了极其卑贱、极其腐烂的精神领域的病毒，至今还散发着害人的恶臭，这是精神文明发展史中的糟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要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继承和吸取人类社会有价值的精神文明的成果，并在这个基础上，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去发展和创造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但曾为中华民族，而且曾为全人类作出过伟大贡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是历史科学的一项有意义的研究课题。

两种倾向的批判

对待历代的精神文明，有两种倾向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倾向是采取复古主义的态度；另一种倾向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复古主义对于古老的东西，一概加以肯定。鲁迅曾嘲笑这种“国粹”：即使无名肿毒，也信“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把痈疽当作宝贝。虚无主义走向另一极端，用貌似革命的口号，对历代的科学技术，文化道德，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否定。他们把无产阶级的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当作“前无古人”的东西，以为只要把历代的精神文明统统戴上“阶级性”的帽子，就万事大吉。其实列宁早在一九二〇年便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①

这两种倾向，表面上是两个极端，而实质上都是唯心史观在精神文明发展史问题上

的具体反映。开展精神文明发展史的研究，并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必须批判这两种倾向，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和方法，要求对具体事物作具体的分析。象精神文明发展史这样复杂的事物，更是不能简单地“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而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定社会的精神文明是由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所决定的。从精神文明内容的总体来说，不可能不打上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发展，又有其历史的继承性，更重要的是任何社会都有两种文化、两种文明。列宁在《革命的日子》谈到工人群众的作用时说道：“无产阶级在实际上表明，它而且只有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支柱，它的劳动创造了财富和豪华，它的劳动是我们整个‘文化’的基石。”^②在考察和研究文明发展史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忽略这个“基石”，不能忘记人民群众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所作的伟大贡献。

历代精神文明中的精华部分，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我们要珍惜地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历代精神文明中的糟粕部分，也是一定的时代和阶级的产物，我们要慎重地加以批判，剔除它的消极的东西，从一定的意义来说，也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这就是精神文明发展史研究中批判复古主义和虚无主义两种倾向的目的和作用。

历代精神文明的阶级性问题

批判地继承人类社会以往的精神文明，就必须首先考察历代精神文明的阶级性问题。

历代的精神文明总是带着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这是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所以社会历史的不同时期便有不同的社会的精神文明。每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又总是以某种思想为核心的。如封建社会的精神文明是以封建主义思想为核心，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文明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核心。恩格斯在讲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大文明时代所具有的共同特征时指出：“卑贱的贪婪乃是文明从它的第一日起以至今日底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渺小的各个个人底财富，乃是文明底唯一而具有决定性的目标。”^③这些时代的统治思想，这些时代精神文明的核心，浸透着剥削阶级的卑劣的贪欲。

这样说来，阶级社会的精神文明是否就全都具有阶级性呢？

精神文明的领域非常广阔，非常复杂。它主要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艺术等各个方面。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有的具有阶级性，有的不具有阶级性。人类用来改造自然的科学及物质生产的工具和与此有关的发明创造，是人类智力的物化，它是不具有阶级性的。有益于和服务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卫生体育事业，以及属于反映人类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共同成果的一般文化知识，也不具有阶级性。

从观念上反映一定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这一部分精神文明，从总体上说具有阶级性，但其中也决不是没有某些具有人民性或民主性的精华的。比如，描写祖国壮丽山川的文学艺术，它不仅给人们以美的感受和丰富的想象力，而且激励人们热爱祖国的山山水水。某些暴露封建官吏对劳动人民横征暴敛的作品，不论作者的出发点是什么，在客观上却是暴露了剥削阶级的贪婪、残酷，增加了人们对封建社会的剥削压迫的罪恶的认识。就道德而言，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但要作具体分析。不同阶级确实存在着不同的道德标准。统治阶级鼓吹的道德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但是，其中毕竟又含有某些为全社会所共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至于就统治阶级中的个人来说，由于各方面的修养和处境的不同，也各有差异。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④鲁迅这里讲的是中华民族，其中也包括了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战国时代官至左徒、三闾大夫的伟大诗人和政治家屈原，在任的时候，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改革政治，外御强秦；被放逐以后，写下《离骚》等充满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想象丰富、感情真挚的艺术珍品，成为对后代产生巨大影响的精神遗产。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时，勤于职守，西夏说他“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在受保守派反对，削职外放，谪守巴陵时，作《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勉人，成为历代传颂的道德规范。就连孟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要求，剥削阶级不一定遵行，但它仍不失为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道德规范。最近，王震同志也谈到：“封建时代的官僚，总的来说是压迫人民的。但就具体人物来说，还是有勤惰、好坏、腐朽和刚直之分。有的官僚除高官厚禄外，还要刮地皮，刮民脂民膏，昏聩无能，荒淫无耻。但有的人还是比较有见地、有作为的。比如在汉代就出现过张骞、班超这样的英雄人物，近代也出现过林则徐、冯子材、邓世昌这样一些民族英雄。”^⑤对于这些有见地有作为的人的文化修养、政治修养、道德修养及其情操、意志的修养，也不是没有可以借鉴和汲取的东西。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是如此。

考察和研究精神文明发展史，无疑要非常重视历代精神文明所固有的阶级内容，绝不可把阶级社会的精神文明视为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的东西；同时又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切忌简单化，一刀切。否则便会自觉不自觉地干出象倒脏水的时候把婴儿一起倒掉那样的蠢事！或者是受骗上当，从“左”的方面干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不可忽视的历代劳动人民建设的精神文明

“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⑥，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其中有不少是历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成果，包括思想道德领域，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精神文明

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业绩。

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史。生产斗争中不断出现的矛盾，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建立和发展。作为生产者的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实践中不但创造了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精神财富，还涌现出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春秋时期的水工郑国在关中地区主持修建了郑国渠，引泾水通向洛水，渠水“三百余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战国初鲁国人鲁班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建筑工匠，相传他发明了许多木工工具，还创造了攻城用的云梯和一些精小的器械。西汉时由水工徐伯主持勘测设计自长安通向黄河的漕渠，渠长“三百余里”，三年凿成，便利了航运，灌溉了“民田四万余顷”。隋代工匠李春主持设计建造了著名的赵州安济桥，桥长50.82米，宽9.6米，净跨37.37米。一千多年来这座桥经受过多次地震的考验，一直保存到现在。北宋的刻字工匠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一发明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元代初出身贫苦的一位农村妇女黄道婆创造或改进了从轧花到织布的一系列机械和技术，把海南岛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带到江南地区，推动了长江下游一带棉纺织业的发展。……这些创造发明，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的物化，它既提高了历代的物质文明，也促进了历代精神文明的发展。

中华民族以刻苦耐劳著称。这刻苦耐劳，不仅仅是属于值得称颂的劳动态度，且是一种劳动人民的美德。中华民族又是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这种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不能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侵犯的革命精神，推动了我国社会的发展，粉碎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和灭亡中国的迷梦。成为中国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文化艺术方面，我国古代许多歌谣和音乐舞蹈，直接来自民间。无数的建筑艺术、雕刻、绘画、陶瓷、织锦等等工艺美术，都出自劳动人民之手。这些产品，是我国历代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某些伦理道德观念，本来是服务于封建统治的，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类的说教，其核心是“忠君”的。但劳动人民从自己的社会地位、自己的家庭关系中，却形成了一种真挚的纯朴的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关系：对父母的孝敬，对子女的爱抚，对长辈的尊重，对后辈的扶提，以及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互助精神。这便成了劳动人民中的一种美德。

历代劳动人民建设的精神文明，不仅在当时的社会是瑰宝，直至今天有许多还是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中国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处于最底层，被剥夺了教育和文化生活的权利，这就使他们的智力开发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同时小生产的地位也束缚了他们的眼界。但是，他们在历代精神文明发展史中的建树仍然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

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⑦可以认为，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概述的正是我国一部动人的精神文明发展史。对于如此丰富、如此珍贵的精神文明的遗产，我们只能够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行认真的考察和研究，实事求是地做好批判继承的功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行高度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这就是使精神文明发展史的研究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问题。

①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选集》第二版第四卷，第348页。

②《列宁全集》第八卷，第96页。

③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0页。

④《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19页。

⑤王震：《学习历史，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红旗》1982年第2期。

⑥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⑦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广东历史学界举行学术讨论会 纪念广州起义五十五周年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八日，广东历史学会和广东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行纪念广州起义五十五周年学术讨论会。广州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四十多人出席了讨论会，并提交论文十五篇。讨论会主要讨论了广州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并对广州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陈郁同志在起义中所起的作用作了探讨。

（鸿生）

“一二九”前后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

黄 义 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消息传到广州，进步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为抗日战争在广东的开展揭开了序幕。

—

“一二九”运动前，广州爱国青年蓬勃的革命活动，已经显示着革命的新的来潮。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吞并我国东北后，又找寻各种借口向我国华北发动进攻；蒋介石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投降态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广东，陈济棠上台后，暗中勾结日本。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曾窜到广州活动，受到陈济棠等的盛情款待。由于陈济棠的包庇纵容，大批走私日货源源输入广东，并由此进入中国各地，广东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重要门户。

与此同时，陈济棠大力加强反动统治，在学校推行复古文化教育，妄图使学生钻入故纸堆，不问现实的民族斗争。陈济棠还常派特务潜入学校，监视、绑架、杀害革命学生。“一九三四年春在广州，也有百多个学生的失踪，直到同年八月一日，失踪学生的家属才接到领回尸首的通知”^①。因此，广大学生深感到“学校好似监狱，社会就好似地狱”^②。陈还把中山大学作为控制广东政局的一个阵地，通过他的“文胆”、梦想出长中大的省民政厅长林翼中把手伸进中大，搞了一个“抗日旬刊社”的假抗日学生组织，后来因怕得罪日本，改名“抗声社”。并授意“抗声社”成员把持中大各学院班代表席位，以压制抗日的学生活动。

但陈济棠的统制政策根本压抑不住进步学生的革命意愿和行动，自日本侵略东北以后，爱国学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深感不满，他们在中共广东省委（设在香港）和广州市委屡遭国民党反动派摧残破坏情况下，仍根据党中央的号召和在分散各地的个别地下党员领导下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党中央和“两广工委”关于动员人民反对日帝侵略的号召和全国各地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广州中山大学、广州大学、国民大学、岭南大学

等几十间大中学校学生和广大群众，多次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陈济棠的省府出兵抗日，并发展为群众性的抵制日货运动。

一九三二年，国民大学教授谭秀峰（即何干之，中共党员）等以中山大学、国民大学、省女师、省一中等校为据点，成立“中国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简称“文总”），受上海中国总同盟领导，团结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属下有“左联”、“社联”、“剧联”等，还成立了这些机构的外围组织——秘密读书会。并与中山大学附中学生吴华、李克筠等成立的“抗日剧社”取得联系。这期间，中大、省一中、执信、市一中等校进步学生，还创办《天王星》等刊物，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

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恐慌。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晚，“抗日剧社”在中大附中礼堂举行“一二八”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两周年纪念演出并散发抗日传单，一女学生被特务跟踪，致使广州的“文总”受到破坏。由于叛徒的出卖，陈济棠于五月间出动军警、特务进行大逮捕。主要负责人温盛刚（中共党员）、谭国标等同志，于八月一日被陈济棠杀害。“文总”及下属组织和“抗日剧社”均被迫停止活动。

爱国学生的革命火种没有被陈济棠所扑灭，他们在斗争中不断积累经验、改变活动方式。一九三四年秋，进步教授邓初民、洪深和在中大任教的何思敬（中共党员）汇集中大，陈济棠解散“文总”时没被打散的中大进步学生的秘密读书会又活跃起来。他们在洪深教授组织下排演抗日剧作。他们还支持洪深教授组织的社团，出刊物，搞世界语、新文学，唱救亡歌曲，并支持曾振声（即曾生）等同学在文明路平山堂办民众夜校。

在进步教授影响下，为迎接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进步学生进行了组织秘密团体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上半年，中大参加过“左联”的张直心、杜埃、徐青、陈维岳等成立“突进社”，其成员常与何思敬联系，在校内各学院发展组织，在广州成立新文字研究会，用新文字翻译印发党中央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的重要文章，宣传党的抗日政策。其成员还分散到各社团、班级代表会和剧社等，联络并团结进步同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原上海党中央局发行科党员王均予于一九三五年七月来广州，通过勤勤大学学生麦蒲费（即丘翠藻）的关系，在进步青年中成立秘密的“中国青年同盟”（简称“中青”），并积极发展成员，开展革命理论学习，和进行抗日讨论。此外，中大法学院杨康华（化名虞焕章）等同学，与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同学联系，成立了不固定名称的革命团体。

这时候，党的组织尚未恢复，“只有少数进步的青年团结在党的个别党员的周围建立了党的外围团体”^③。它们虽不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但“都为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而紧张地工作”^④。党中央一九三五年发表“八一”宣言后，他们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秘密刻印、张贴、散发“八一”宣言和剪贴宣传抗日的报纸；邀请何思敬、邓初民教授作形势报告。“特别是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的空前的学生运动，这种浪潮激动了广州的青年学生，积极的起来响应北平学生运动”^⑤。

二

首先起来响应“一二九”运动的是中山大学的的学生，在“中青”和“突进社”等的联合部

署下，十二月十日，中大校园到处张贴着剪报、壁报，介绍北平学生英勇斗争消息，呼吁同学们起来召开全校抗日大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天下午，中大农学院有的班开会，决定推动全校以至全市学生举行声援北平学生运动的示威游行。当晚，在文学院宿舍召开班代表会议，讨论发起召开全校的抗日大会。

经过各学生团体准备之后，十二月十二日上午，中山大学师生抗日大会在大礼堂举行。参加大会的三千多人情绪高昂，提案甚多，很快作出电慰北平受伤同学并请政府释放北平被捕学生；通电全国响应北平学生运动；停课一周开展抗日宣传并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等多项决议。示威游行定于当天下午进行。十二日下午一时，在石碑的中大全体同学和部分教职工集队后向市区进发，在市区汇合中大医学院和附中的队伍约五千人，队伍高擎着“国立中山大学抗敌示威大游行”的巨幅横额，沿途向民众散发《告同胞书》。爱国学生在《告同胞书》中斥责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并向民众表示：“今日的中国是非立刻抗日不可了”^⑥。队伍沿途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全国总动员》和《救亡进行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十二月十二日的示威游行，是广东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开始，“从此，在广州的影响和带动下，广东全省的学生救亡运动，就蓬勃而不可阻挡地向前发展了”^⑦。参加这天游行的名教授邓初民，后来在重庆著文称这一天“是中山大学最光荣的一天”。

在举行示威游行的同时，学生革命团体还组织宣传队和到各大中学校联络，使运动的规模和声势日益扩大地发展。参加宣传队的同学分别打着“国立中山大学抗日宣传队”的旗子，手臂缠着宣传员的布徽，到市区主要街道、市郊农村以至佛山等地向群众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不懂广州话的同学则为演讲的同学站岗放哨，张贴并散发抗日宣传品。到各校联络的同学，往往绕过各校当局及其御用的“救国会”的拦阻，受到爱国同学的热烈欢迎，并陆续召开抗日大会。执信、市女二中等校同学还集队到校门口迎接，听中大同学演讲，会后还组织各班讨论。市女二中还单独在市内举行抗日示威游行。

北平、广州等地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得到全省各地中小学师生的响应。如东莞县的“中青”、“反帝大同盟”和读书会，联合发动东莞中学四百多名师生，于十六日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对何梅协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二十三日，揭阳、澄海两县学生，都在县一中的发动下举行抗日示威游行。二十四日，汕头市各校学生召开抗日大会。二十五日，潮阳县各校学生罢课三天，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二十七日，阳江中学师生召开抗日大会。

为了进一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学生革命团体还与陈济棠操纵的假抗日组织进行斗争。当时，广州各校的抗日救亡运动纷纷开展起来，但活动还是分散的，而中大抗日运动的领导权则还掌握在“抗声社”分子的手上。为了形成全市学生的联合抗日救亡运动，必须建立全市学生统一的抗日领导机构，而关键是中大学生必须把领导权从“抗声社”分子的手里夺取过来。各学生革命团体经过协商，决定夺取抗日领导权的斗争首先从教育系三年级开始。在选举班抗日会代表时，“突进社”事先争取了“抗声社”有影响的一位女

同学,使许多跟她跑的女同学站到进步同学一边。选举时“中青”成员金昌华等提出曾振声为代表,“突进社”的黄焕秋等马上赞成。曾振声当选使“抗声社”的骨干分子失去到全校当抗日会代表的资格。十二月三十一日上午,再次召开了全校抗日大会,进步同学集中揭露“抗声社”分子把持抗日机构,实行“包而不办”的怠工行径,一致决定把他们清除出抗日会筹委会,重新选出曾振声、钟远蕃、李康寿等五人为临时主席团,曾振声为主席。并决定:(一)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投降,坚决反对华北自治;(二)以大会新主席团为筹备委员会,着手筹备组织中山大学抗日会,领导抗日运动;(三)即日联系全市学生举行总动员抗日示威大游行。并即席推派代表,先行出发广州与各校学生联络。

陈济棠得知全市学生联合示威游行的消息,即令教育厅通知各校提前放寒假,迫令学生离校;但抗日救亡乃大势所趋,经中大学生迅速联络,联合示威游行计划还是按时实现。当天下午二时,中大学生队伍进入市区文明路附中操场后,市三中、执信、广雅、知用、大中、教忠、女师、庚戌、仲元、禺山、圣三一等各校的进步学生,都冲破各学校当局的拦阻前来汇合。游行队伍所到之地,“民众抗日救亡空气,顿呈紧张”^⑥。队伍在向群众散发的《告同胞书》中,除陈述民族多难,危急万分,抗日救亡,迫在眉睫的理由外,还动员广大人民奋起行动,与日本侵略者决一死战。队伍到越华路“西南政务委员会”所在地示威,向当局提出质问和要求:“(一)质问西南政务委员会是否禁止全市学生参加抗日及示威游行?(二)要求抗日行动、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三)请西南政务委员会表明最近对日外交态度。”^⑦当局不敢出面答复。加入游行队伍的市民很多,学生和市民四、五千人的队伍,又一次到六二三路向沙面的外国侵略者示威。这次游行到入夜才结束。

一九三六年一月六日,中大各学生革命团体按预定计划,把校长邹鲁自南京回校后企图控制学生抗日运动所召开的师生“训话会”,开成抗日会成立大会。邓初民教授、曾振声同学等,针对邹鲁的企图,公开宣传党的抗日政策,扫了学校当局的威风。大会以压倒的多数将曾振声、陈柏昌等进步同学和邓初民、肖隽英等进步教授选入抗日会执委会,曾振声为抗日会主席。从此,中大抗日运动公开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通过个别党员组建的外围组织和进步师生的手里。大会作出了一月九日联合全市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等决定。

一月九日下午,中大学生队伍到市区后,广雅一千多学生,执信、女师、市女师、市二中、知用、教忠、仲元、庚戌、民大和民大附中等学校的进步学生,都冲出校门前来汇合,队伍近万人。加上工人、市民的支援队伍,更增至三万人左右。各路队伍汇集到长堤新填地广场,召开“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选举中大曾振声为主席。自此,一个与官办的“广州市学生联合会”相对抗的全市学生抗日领导机构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掌握了全市学生抗日运动的领导权。

“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成立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大会在曾振声的主持下决定:通电全国响应北平学生开展抗日爱国运动,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国民党

政府卖国投降的对外政策。会后继续游行，宣传队同学沿途发表演说，向广大市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参加这次游行的中学生很多，他们对省教育厅多次下令禁止学生参加示威游行的做法甚为愤激，要求领队把队伍带到教育厅去示威。队伍在黄昏时分到了教育厅，同学们捣毁了施行奴化教育的教育厅，中大附中同学还拆下教育厅的牌子，抬回附中操场当战利品展出。是晚，广雅学生还召开抗日大会，决定从十日起封锁校门，不让该校反动校长霍广河（市国民党党部委员）进校。

面对压不住的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陈济棠召开了以镇压爱国学生为中心内容的联席会议，通过八项反动措施，拼凑“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充当打手，并在中大、民大、广雅成立监视爱国学生的所谓“学生救国义勇队”，决计进行血腥镇压。

一月十三日，女二中发起全市学生抗日游行。当天上午，民大及民大附中、中大、勸大工学院、市二中、越山、市女二中等校九百多名学生在国民大学开会后出发游行，其他各校学生队伍在自己校门等候，待队伍经过时加入。当队伍行经荔湾桥时，混进游行队伍、打着“广州市民救国锄奸团”招牌的一百多个暴徒突然抛掉旗子，拔出手枪铁尺向学生袭击。学生当场被打伤一百多人，中大朱文畅同学惨遭杀害，埋伏四周的特务还绑走受伤学生冯道先（后遭谋害）等十多人，造成轰动全省的“荔湾惨案”。惨案发生后，广大爱国学生对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更为不满，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一步酝酿着更广泛、深入、持久的抗日救亡运动。

三

“一二九”前后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从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的准备上，为广东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广东现代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一二九”前后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唤起了民众，宣传了党的抗日政策。

运动后期，成百个学生抗日宣传队深入各地，“把运动的影响扩大到各县乡村的广大群众中，提高了乡村中的学生与农民的民族意识与反日的热情，把党的政策通过广大的青年学生普遍的散播到乡村里去^①。特别是“荔湾惨案”后，许多学生响应党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深入到广州榨油工会、印刷工会、邮务工会等，在“邮协”、售票员、草席业工人、生鱼栏工人、民航工人、橡胶工人、苦力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在广州市郊的石牌、长洪、上下元岗、车坡、寺贝底、岑村、龙眼洞等农村进行宣传、组织农民，开展农村斗争。“中青”、“突进社”还组织一百多位同学参加“乡村服务实验区”，把乡村教育作为抗日救国活动的组成部分。他们开办民众夜校识字班，上政治、语文、农业知识等课程，政治课以党的抗日政策为基本教材。还设立阅报处，举办时事讲演会，出壁报，成立抗日农余剧团等，并组织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

此外，中大抗日会和其他爱国学生团体办的抗日宣传刊物，在省内各地以至南方各

省扩大了影响，对宣传动员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起了良好作用。通过运动，“抗日救国”的口号深入人心，“广东的民众，无论是知识分子或劳动群众，对于汉奸卖国的行为，都表极端的愤慨，他们对救国的正确途径，也都有了相当的认识”^②。

第二，“一二九”前后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锻炼和扩大了革命青年的队伍。

运动以后，各学生革命团体得到进一步发展。许多进步学生知道有“中青”这个组织后，纷纷申请加入。“中青”负责人经过研究，决定以“中青”为核心，成立“抗日救国十人团”作为外围组织，把申请加入的几百名中学生编成十人一组，选出组长，领导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利用“十人团”成立半公开的小团体，如歌咏队、读书会等，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突进社”除在中大吸收成员外，运动后也在校外发展组织，如在广雅、知用、中大附中等各校，甚至在榨油厂等单位工人中吸收成员，其成员很快增至一百多人。“马列主义行动团”（或共产主义小组）在发展组织过程中，与对外海委的地下党员陈勉恕发生联系。此外，中大、广雅、市一中、市女师等各校，还建立各种半公开的读书会，中大还成立有“社会科学协会”等，通过各种形式的组织，把进步的青年学生团结起来。在广泛发动的基础上，一九三六年春，华南各界抗日救国会宣告成立，派出何思敬、石辟澜、周楠、方少逸（中大学生）、吴超炯（中大学生）等前往上海参加全国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大会。同年底，广东各界抗日救国会也宣告成立。

第三，“一二九”前后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广东地区党的建设。

“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广东各级党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一九三六年五月，王均予与组织接上联系，在上海见到中共北方局的黄敬。接着，王又赴天津向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李大章汇报他在广州开展工作的情况。李指示他与另一同志薛尚实回广东恢复党的组织。

薛尚实受组织委派先行到香港，找回分散在各地的地下党员。经何思敬介绍认识了中大“突进社”成员，并在中大“突进社”骨干中吸收党员。一九三六年九月，薛尚实在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方临时工委”）。十一月底，又成立“香港临时工委”。同时在中大成立了“突进社”为系统的党支部。并在华南一些地方开展恢复党组织的活动。一九三六年七月，王均予回广州后在“中青”中吸收党员，并建立了“中青”系统的中山大学党支部，其他各校党支部也先后成立。同年十月，根据“南方临时工委”指示，以“中青”为系统建立的党组织为基础，成立了中共广州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广州临时工委”），领导属下中山大学、勸勤大学、中大附中、广雅、大中、仲元、仲凯等各校党支部。东莞、中山、新会、高要等县，也在“中青”中吸收党员并成立党支部，统称“外县工作委员会”，在“广州临时工委”领导之下。“力社”的杨康华等，从一九三六年五月起，由对外海委系统的党组织陆续吸收入党。至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党中央和中共长江局陆续派张文彬、尹林平、黄文杰、梁广、张月霞等来广东，着手恢复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一九三八年四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同时取消“南方临时工委”。中共广州市委在此之前已成立，中大两个党支部也合并起来了。广东各级党组织的恢复

和建立，从根本上保证了党对广东抗日战争的绝对领导。

第四，“一二九”前后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为我党在广东地区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

这次运动主要成绩之一，“是培养了、保存了一批比较坚强的青年干部，成为抗战后发展青运的基本骨干”^①。大批经过“一二九”战斗洗礼的爱国青年，被吸收入党后很快成长为各级党组织的负责人，为党在广东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工作。如，“南方临时工委”成立时，饶彰风曾是负责人之一。“广州临时工委”及改为“广州工委”时，罗范群、杨康华、梁嘉、吴超炯等先后曾担任全面或部门的负责工作。广东省委成立时，饶彰风、罗范群、麦蒲费、曾生以及吴华、梁嘉等，曾是省委委员、部长或部门委员等。抗战开始后，很多同志成为抗日救亡团体的发起者、组织者和领导者，甚至担任抗日武装部队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如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以及粤东、南路和各地的“青抗”、“农抗”、“妇抗”等，就是由“一二九”的参加者为主体发动起来，进行组织并领导的。他们为抗日部队输送了大批指战员。在抗日部队中，“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士更是肩负重任，威震华南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就是当年广州抗日运动的领导者，副司令员是“中青”成员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是“力社”的杨康华。“珠江纵队”政委曾是罗范群、梁嘉，其第一大队长是“抗先”的欧初，政委是“中青”成员梁奇达。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不少“一二九”的老战士，为党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朝鲜籍的中共党员金昌华，抗战后赴延安，改名程光华，在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的秘书时，于一九四二年夏在太行山反扫荡战斗中，与左权一起壮烈牺牲。“中青”骨干钱兴，抗战时任广西省委书记，省委遭国民党破坏后，回广东坚持斗争。一九四八年任西江区工委副书记时，与敌人周旋作战中牺牲。中共党员、中大学生陈柏昌、谭家驹、林耀簇等，在反共高潮中被汉奸和伪军谋害。中共党员、勤大学生麦蒲费、中大学生李克筠、黄泽成等，则为抗日救国操心，积劳成疾病故。这些党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子，为党的革命事业献身的伟大精神，如同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永垂不朽！

① 《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第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版。

②③⑤⑩⑬ 《关于广东青年工作的报告》。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七日，广东档案馆藏。

④⑦ 杨康华：《平地惊雷》。《激流》，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⑥ 《本校学生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昨由石碑列队入本市大巡行》。《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⑧ 《中大员生紧急会议决定召集全市学生举行抗日巡行》。《循环日报》，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

⑨ 《一二九运动》第119至120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

⑩ 《中大宣传队今日出动》。《循环日报》，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

⑫ 《一二九时期的广州学运》。《大众生活》第10期，一九三六年一月十八日。

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

郭景荣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爱祖国发展到革命救国，这是广大华侨爱国思想的一条主线。为了求得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广大华侨积极支持和参加了辛亥革命；之后，他们又为捍卫共和，推翻袁世凯的专制独裁统治而继续战斗。本文拟就爱国华侨在反袁斗争中的贡献进行初步探讨。

(一)

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为了建立独裁政权，派出爪牙刺杀了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接着残酷地镇压了“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接着又解散国会、废弃约法。至此，共和民政，荡然无存，人民又陷入苦难的深渊。孙中山等再次流亡到日本，革命进入了艰难困苦的低潮时期。

孙中山不愧为一位百折不挠的伟大革命家和爱国者，他不以困难挫折改变其革命之志。孙中山把流亡在日本的同志组织起来，并鼓励他们说：“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①他痛切地感到，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②为再造共和国，孙中山决心“力洗从前积弊”，“务在正本清源”，^③建设一个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之政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规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决心发动第三次革命。

在辛亥革命中作了重大贡献的广大爱国侨胞，眼看袁世凯倒行逆施，帝制自为，危害民国，感到无比愤恨。当孙中山通告海外华侨建立中华革命党支部，讨袁救国，再造共和时，他

们即纷纷加入中华革命党，响应和支持孙中山领导的第三次革命。这一时期的中华革命党组织，比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组织有所发展，中华革命党海外支部分布在世界各地，从亚洲到欧洲（英国利物浦支部），从澳洲到非洲（南非洲支部），在美洲则从北美扩展到中美和南美，甚至航行在太平洋上的许多轮船亦建立起了分部。^④加盟人数之多，地域分布之广，可说是前所未有的。

海外华侨“犹心焉祖国，热心力宏愿，胞挈共矢”。^⑤以巨港支部为例，“已新进党员五百人之谱，其余津津乐道恐无虚席者，尚不知其数，”^⑥足见人心之奋勇。又如波士顿，计华侨居留该埠者七十余人，1915年6月14日，波士顿分部成立开幕，加盟者二十余人；在开幕之夕，又有十一人加盟。计是年新进党员五十四名。1916年又新进党员十余名。这样，波士顿埠全体华侨基本加盟。^⑦

随着中华革命党在海外华侨中的扩展，广大爱国华侨更和国内斗争息息相关，此呼彼应。当袁世凯窃卖国家，与日本帝国主义秘密签订二十一条条约的消息传到海外时，广大华侨立即起而反对。菲律宾各华侨团体四百余名代表，于1915年3月11日集会，组织了“华侨救亡团”，以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其布告书中大声疾呼：“我侨胞亦属中国国民之一部分，……我侨胞既属母邦，又为桑梓，其难忍坐视之情，不更深于他人乎。……宁以颈血溅日人，毋化佞倭屈膝听命于日人之廷，致无以对祖国于地下。然则我侨胞又乌可静听政府之误国乎！”^⑧“华侨救亡团”选举蔡联芳为临时正总理，戴金华为临时副总理，吴克诚为司库，许化育为正外总，薛敏老为副外总，黄灿三、郑汉其为监理员。“救亡团”建立后，立即向北京政府和闽、粤地方政府分别发出电报，坚决

要求严拒日本无理要求，表示：“宁战毋让。侨誓以生命财产为后盾。”^⑨据统计，当时“海外拍电约三百余通，未签约以前则主战，既签约以后，则诘问其故。”^⑩但袁氏对此置若罔闻，一字不复。广大华侨益发群情激昂，认识到日本之所以敢提出“廿一条件”，是中国政府掌握在独夫民贼之手。因此提出了“要想御侮必先惩国贼”^⑪的口号。

1915年7月5日，在美国三藩市举行全美洲同志恳亲大会，这是一次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的誓师大会，是对海外华侨革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这次大会规模宏大，盛况空前，日本横滨，澳洲纽丝伦、雪梨，英国利物浦，秘鲁，古巴，加拿大，墨西哥，檀香山等党部，还有航行在太平洋的各轮船党部，均派代表参加，共商讨袁计划。据载，“会期远播，竟尔震动袁家政府，局蹙不宁。且驰电驻美公使领事等，百计阻止，然终莫遂其欲。”^⑫英国利物浦国民党分部代表在会上表示：要“饮马黄河，屠龙苍海，出斯民于水深火热，措国家于泰山磐石，……某等寄迹异邦，眷怀宗国，与诸君子同感，推陷颡制，重建共和。”^⑬马贇馨在会上代表广大华侨表明了坚决讨袁的态度，他指出：“今之执政者，其凶顽贪鄙，固人人得而唾之矣，而其罪袁氏实尸之”，因此，“吾人而欲救国，不可不先扑杀此獠，所望同心同德，实行革命，前仆后继，不成不止。”^⑭

各地区华侨对这次大会寄予很大的希望，加拿大湿比厘埠国民党分部给大会来电呼吁：“会合群英，讨袁拯溺。”^⑮士顿埠国民党分部来电：希望这次“英雄大会，共商救国，着着进行。”^⑯这次大会不仅反映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情的进一步高涨，而且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了国内反袁斗争的开展。

（二）

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以后，即倾注全力组织和发动反袁武装斗争。他在派出同志分赴南洋、美洲等处筹款的同时，亦秘密派遣革命骨干潜回内地策划军事行动。1915年夏末，组织了中华革命军，设立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军军部。接着，在各地掀起了反袁起义。

孙中山在为拯救祖国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对广大爱国华侨崇高的爱国精神和牺牲精神，有着深刻的感受。在策划讨袁斗争、组织武装队伍

时，孙中山在给南洋侨领邓泽如的信中指出：“须以敢死得力之同志为本位，然后坚固不摇，战胜一切。南洋同志，久受熏陶，且不乏壮勇可造之资。”希望他“注意速为物色此等人士，资遣到东，……再加以军事上之训练，用备他日中下级军官之选，此策甚关要。”^⑰这是孙中山对海外广大爱国华侨具有深刻了解而提出的祈望。

海外华侨积极响应，和全国人民一起担负拯救祖国危亡的重任。他们由组织军事研究社，到建立讨袁敢死先锋队，进而办航空学校，做了许多工作。

一、培养军事人材，为回国参加武装讨袁作准备。1915年2月，美洲国民党鉴于袁贼无道，国势危难，认识到“欲挽救吾国，使立于不亡之地位，……非颠覆专制魔君之袁世凯，必不足以建设强善政府，振刷国民外交”。^⑱于是成立华侨军事研究社，发布了“美洲华侨军事研究社简章”，指出“今日如不进行革命则已，苟为革命党，则实习兵事，诚为莫大之急务。”认为学习兵士，使之具有军事常识，“则一旦有事，可成劲旅，大之可投身革命军，以尽杀贼救民之天职。”^⑲该社学习的学科为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爆药学、筑城学、交通学、军制学、野外勤务、步兵操典及一切典范令等。

1915年4月，美洲华侨在加拿大组织军事社进行训练，军事总社设在问顿城，胡汉贤任社长，马超凡任副社长。当时仅问顿城就有华侨党人数百人参加，他们当中多属青年工人及店员，白天做工，晚上集中训练。军事总社派出蔡鹤朋、黄惠龙往加中沙市加寸城组织军事分社后，各主要城市亦陆续成立军事分社，如加西的域多利埠，温哥华埠，加中的卡忌利埠、列必珠埠及加东的多伦多埠等，都次第成立了军事分社，进行军事训练。设在东京的军事部还给列必珠埠军事分社寄去周应时著《兵站要略》四十册，以资参考。在美国，由于禁止外侨活动，故美国华侨有愿意参加回国讨贼的，由伍横贯、黄培等暗中组织，与加拿大军事总社联系。^⑳学习军事，随时候令回国讨袁，反映出加拿大各埠华侨的强烈的爱国热情。

二、组织华侨敢死先锋队，回国参加讨袁武装斗争。这次华侨归国效力的，美洲、南洋、吕宋、安南各地皆有。袁世凯公开称帝后，广大爱国华侨怒不可遏，再也按捺不住回国讨贼的决

心，由罗省高铁德、钵仑陈煊、贝市伍横贯发起，在加拿大首先组织了讨袁军，即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以大战号召，相率海外健儿归国效力，同赴疆场，以期扫除叛逆，还我共和。”^②1916年1月初，美洲加拿大国民党支部制定和颁布了《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规则及章程》，规则中指出：“国贼纵横，民生涂炭，共和将坠，帝制复萌，正是吾人枕戈待旦，疆场效死，救国之大可时期，杀贼之良善机会。可恨飘流异域，亡命他乡，徒闻内地之噩耗，未遂生平之志愿，每念及此，能不歔歔，……与其间接呼号，空谈无补，莫若直接效力，实地进行，此吾人组织加属华侨敢死先锋队之所由也。”同时阐明“本队之组织，原为回国效力，实行三次革命，反对帝制，以保护共和为宗旨。”^③这些情感激越的呼唤，把祖国和同胞的危难展现在侨众面前。为报效国家，华侨青年纷纷报名参加敢死先锋队，一时报名参加者约五百人。后经东京总部指示正式命名为“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1916年2月，讨袁军华侨敢死先锋队奉东京总部电召，分三批到达日本横滨候命，共三百余人。在日本又加入一批队员，约一百多人，总共五百多人。^④五月初，孙中山派夏重民等带领华侨敢死先锋队回国，进入山东潍县，受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指挥，将华侨敢死先锋队改编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华侨义勇团”。不久，华侨义勇团即参加暗袭济南的战斗，后因日本反动势力的破坏，暗袭济南未能实现。

三、建立航空学校与飞行队，以培养航空人才，派遣回国效力。计先后学成归国者有杨仙逸、陈侠民等数十人，而华侨敢死先锋队东渡日本前夕，华侨捐有三架飞机给孙中山，又在华侨中挑选一部分人，延聘日本教官进行训练，“组织飞机队，胡君汉达等十余人皆日夕练习，期于一试，虽未见实践，然其声威已播矣。”^⑤

广东是我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开展反袁斗争较早，爱国华侨参加战斗的和牺牲的也较多。其主要事迹是：

谋刺龙济光。中华革命党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立即组织武装讨袁。1914年10月，邓铿、朱执信先后领导了潮州、黄冈及惠州等地的起义，但都失败了。此时，有人提出对袁贼的鹰犬龙济光进行狙击暗杀，既可促成反动势力内部之混乱，又可振奋民心士气。钟明光是南洋霹雳

暗邦埠华侨工人，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对袁世凯的暴虐无道甚为愤激，闻孙中山已派人在香港发动讨袁，遂回港待命投效。暗杀龙济光之事决定后，钟明光承担了刺杀的任务，他慷慨表示，必要时愿与龙贼同归于尽。五月二十八日，钟明光写了一份绝笔书致南洋坝罗国民党支部，字里行间，充满着他对祖国、对四万万同胞深沉的爱。1915年1月间，钟明光出发到广州。7月17日，轰炸龙济光，伤其左足，卫队死者十七人，伤者无数。^⑥但钟明光因走避不及被捕，数日后壮烈牺牲。钟明光虽刺龙未遂，但其壮烈事迹轰动全国，龙本人亦成惊弓之鸟。在修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时，孙中山曾为温生才、陈敬岳、林冠慈、钟明光四烈士修建了墓园，永为纪念。

第二次劫夺肇和舰。广东华侨决死队，开始仅十余人，由谢八尧、罗金兰主其事。1916年1月初，北洋舰肇和号由沪来粤，驻防黄浦港，革命党人马伯麟等，愤于在沪抢舰之失败，准备第二次劫夺起义，得到朱执信的全力支持。2月12日夜发难，由李天德派铁血团团员成创周等十一人，会同马伯麟等三人、华侨十一人，组成敢死队进行劫舰行动，由马伯麟指挥。他们乘坐在澳粤间水路行驶的永固轮船，但因水流湍急，不能迫近肇和舰，而其行动又被守兵发觉，向永固开枪扫射，他们只得将永固船驶向沙滩，登岸而逸，而马伯麟、郑慕开及华侨六人被福军拘捕。除马伯麟外，余皆殉义。

光复汕头。1916年4月，罗翼群先后派罗立志（华侨）、高寿等人赴汕头运动防军起义，经与防军统领蓝葵芳等取得默契，准备相机起义。不料高寿失慎，炸弹发生爆炸，惊动了驻汕头之潮梅镇守使马存发，搜查全市。罗立志遂决定提前起义，与事前集中在汕头待命的十余名华侨，及罗立志就地联络的三、四十人，组成敢死队，携带手枪炸弹，夜袭潮梅镇使署，马存发狼狈逃走，使署卫士悉数被缴械，汕头遂告光复。

（三）

反袁斗争一开始，革命党人便碰到严重的经济困难。1913年12月，孙中山在给邓泽如和南洋各同志的信中说到：“经济一坏，不特目前无进行之款，即同志中之衣食，亦多不能顾者。前日大雪，在东之亡命客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弟虽尽力设法救济，而力微不足以遍。”^⑦艰

难困顿之状况于此可见。而解决革命经费，当时唯有依靠素有爱国光荣传统的海外广大华侨。

在第三次革命筹募经费中，孙中山根据辛亥革命时期在华侨中筹募军饷的经验，在东京成立了筹饷总局，领导和统筹筹款事宜。同时，制定出筹饷章程，分发到海外各支分部，海外各支分部则成立筹饷局，按章进行筹款工作。1914年末，孙中山委邓泽如为南洋各埠筹款委员长，南洋各主要支部先后成立了筹饷局。目前从有据可查的史料中可看出，从1914年10月20日至1915年9月4日，委任了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分部筹饷局职员共二百七十名，计八十三个支分部筹饷局。孙中山事先在东京印制了“中华革命党债券”，作为收据凭执。中华革命党公债券，面额分一千元、一百元、十元、五元、一元五种，均以日元为单位，照辛亥革命时期办法两倍偿还。为鼓励捐输者，还规定了“中华革命党奖章种类”，如购公债券一万元以上，给金质一等有功章；如购一千元以上，给银质二等有功章；如购一百元以上，给铜质三等有功章。这些措施推动了在海外的筹款工作。

1914年10月，南洋华侨闻邓铿、朱执信在广东领导革命军起义，讨伐袁世凯的走狗龙济光，即“由南洋汇款万金至港。”^①当时，英、荷各处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商务败坏，土货停滞”，^②但广大华侨一了解劝销公债事，皆愿倾囊相助。当许崇智、邓铿到南洋筹款时，“区慎刚认购公债券一万元，黄心持三千，郑成快、朱赤霓、李源水、关芬、林成就、杨寿楠、冯业生、谢八尧各人，均认购债券逾千。”^③华侨中革命党重要骨干分子，以霹雳埠区慎刚、梁燊南二人出钱最多，计每人皆捐十万元以上。安南西贡之李卓峰、曾锡周、冯培生，堤岸之黄景南皆各出资数万，亦当时所罕见。^④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称帝，国内外同胞十分愤慨。19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等反袁势力联合起来，组成“护国军”，西南宣布独立，起兵讨袁。消息传到海外，广大华侨就极力支持。起义之初，经费异常短缺，出征之时，兵饷已欠三月未发。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素仰“海外父老昆弟，睽怀祖国”，致电海外华侨请助军饷，“复共和于危亡”。^⑤唐继尧还分别写信给柏蔚文、林森，请任护国军政府南洋、美洲筹饷代表，“劝谕侨胞，踊跃输将，共襄义举，”^⑥

剪除袁贼，维护共和。“南中侨胞，闻滇中义师颺发，皆引领宗邦，欢欣踊跃，近日来电称贺，认捐巨款者，大不乏人。”^⑦当第三及第四旅出发时，“得南洋华侨助款现金六十五万，并由某处运到步枪、山陆炮各军需品多件，此间军人，益兴高采烈。”^⑧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分率军队向川省、桂省出发讨伐袁世凯后，南洋爱国华侨又“电汇一百余万”，“美洲华侨、澳洲华侨来电认捐，闻数在二百万左右。”^⑨使讨袁护国运动的经费得到源源不断的资助。

在讨袁斗争中，海外广大爱国华侨捐助经费所起的作用，正如邓铿在报告其讨龙之役时说的：“劝募军饷，源源接济，使铿为米有炊，勉为巧妇”，“方今同志，皆有前扑后起之精神，若不得海外同志助以糗粮，亦终不成奏其效果。”^⑩亦如《中华革命党史料》中说到的：“袁世凯帝制之复灭，未始非赖我挚亲爱国侨胞，节衣缩食，慷慨仗义，有以援助之。”^⑪

综上所述，广大爱国华侨在反袁氏帝制复辟、捍卫共和斗争中，是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孙中山曾把华侨的贡献概括为：“此次推翻帝制，各埠华侨，既捐巨资以为军费，而回国效命决死，以为党军模范者，复经相接，其坚忍勇往之忱，诚不可多得者也。”^⑫海外广大侨胞这种爱国献身精神，是值得我们称颂的。

①《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二。

②《孙中山选集》上卷。

③《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三。

④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计有：地洋丸分部、西伯利亚丸分部、满洲丸分部、蒙古船分部、春阳丸分部、清堤船分部、南生船分部、吉生船分部、高丽船分部、亚细亚皇后船分部、天津丸分部、衣士顿船分部、福生船分部等。

⑤《中华革命党史料》。《革命文献》第四十五辑，第502页。

⑥同上，第648页。

⑦同上，第470—471页。

⑧洪卜仁辑：《菲律宾华侨反对廿一条件的爱国运动》。

⑨《公理报》（菲律宾马尼拉华侨报），1915年3月13日。见洪卜仁辑：《菲律宾华侨反对廿一条件的爱国运动》。

- ⑩《中华革命党史料》。《革命文献》第四十五辑，第387页。
- ⑪《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四期，第134页。
- ⑫《中华革命党史料》。《革命文献》第四十五辑，第298页。
- ⑬同上，第305—306页。
- ⑭同上，第309—310页。
- ⑮同上，第306页。
- ⑯《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三。
- ⑰《中华革命党史料》。《革命文献》第四十五辑，第423—424页。
- ⑱同上，第423—424页。
- ⑲胡汉贤：《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美洲华侨敢死先锋队组织始末》。见《广东文史资料》第十九辑。
- ⑳《中华革命党时期函牍》。《革命文献》第四十八辑，第95页。
- ㉑《中华革命党史料》。《革命文献》第四十五辑，第504—505页。
- ㉒同⑩

- ㉓《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三。
- ㉔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 ㉕同⑲。
- ㉖孙中山：《致慎刚、螺生、源水函》。
- ㉗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绩》，第160页。
- ㉘同上，第131页。
- ㉙《广东文史资料》第二十五辑，第85页。
- ㉚《讨袁史料》(二)。《革命文献》第四十七辑第200页。
- ㉛同上，第203页。
- ㉜《护国军记事》，第二期。
- ㉝同上第一期。
- ㉞《护国军纪实》。《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
- ㉟邓泽如：《中国国民党二十年史绩》第145—146页。
- ㊱《中华革命党史料》。《革命文献》第四十五辑，第410页。
- ㊲《孙中山先生廿年来手札》卷三。



是“低昂远判”，而不是“低昂遂判”

宋杰鑫

洪仁玕《戒浮文巧言谕》，扬州师院中文系编的《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年出版）和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等一些新版的资料书都这么录道：“推其原故，盖由文墨之士，或少年气盛，喜骋雄谈，或新进恃才，欲夸学富。甚至舞文弄墨，一语也而抑扬其词，则低昂遂判；一事也而参差其说，则曲直难分。”其中“低昂遂判”，商衍鎏《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却作“低昂远判”。我们认为：该作“远判”。

查《戒浮文巧言谕》收在《钦定军次实录》卷内最后一篇，原刻本是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1861年）新刻的，1957年在江苏常熟发现，今藏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原刻本也作“低昂远判”。其实，“低昂远判”强调了由于“抑扬其词”，使一句话的重要性发生很大的差异。这与下文“一事也而参差其说，则曲直难分。”同是指责浮文巧词对实际事义的歪曲。这才合乎洪仁玕他们的本意。如果说成“低昂遂判”，“遂”是“就”的意思，那就成为：“低昂就因而有所分别。”其语气显然和缓得多，这不合洪仁玕的本意。

“远判”为什么弄成“遂判”？我们认为：可能“远”的繁体字跟“遂”较相似，传抄时搞错了，以后便以讹传讹。

汉魏的浮华士风

胡守为

学者对汉魏的政治制度、思想意识以及统治集团政治地位的变化等问题，已有不少重要的论著。近日读三国史，有感于士风对曹魏政权的兴亡关系甚大，写成读书笔记，未必能补前说的不足。

(一)

所谓“浮华”，如《颜氏家训·名实》所说：“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简言之就是名实不符。汉魏时期士大夫常常提出名实的问题，便是针对浮华而发。浮华本属一种道德风尚，但对东汉以后的政治，却有着重大的影响，汉魏时期，大族与寒族之间的斗争，便包含着浮华之风的问题。要明白浮华之风与政治的关系，得先从东汉的选举制度说起。

东汉的宦宦道路，主要通过征辟、察举，而以社会名声为选拔标准。因此，人们为了进入仕途，非要在社会上博取好名声不可。在儒家大族当权的东汉社会，要成为名士，自然须合乎儒家的政治道德标准，这就是说，东汉名士便是儒家道德行为的表表者。东汉以名取士，却引起了许多弊端。如樊英以道术见称，隐居壶山之阳，以清高获得声誉，多次被辟召，都不肯出山，反而名气越来越大。汉顺帝强迫把他送到京师，他还敢面折皇帝。后来终于拜五官中郎将，光禄大夫，“及应对，又无奇谏深策，谈者以为失望。”（《后汉书·樊英传》）这就是李固给黄琼的信中所指“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例子。这样的例子不是个别的。有些“名不副实”之甚者，乃至弄虚作假，骗取社会舆论，沽名钓誉，以求在官场青云直上。东汉儒家最重孝行。这是基于家族为单位的伦理观念。孝子必能为忠臣，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于是士大夫便以孝行树立名声。出身著名大族的袁绍，母丧去官，守孝三年之后，又称父死时年幼，应补行父服，于是在父母的家庐一共住了六年。据袁山

松《后汉书》所记，袁绍本袁逢庶子，过继伯父袁成。袁绍为袁成守丧，实超出常礼，此举被中常侍赵忠讥为“坐作声价”。另有一个名赵宣的，葬亲之后，索性在墓道中行服二十余年，博得很大的名声，于是“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后汉书·陈蕃传》），而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中所生。袁绍的矫情，赵忠的作假，是东汉以名取士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浮华之风由此而起。

本来只要有一定的考核制度，弄虚作假自然无所遁形，可是在东汉时候，人物的鉴定，全靠评议，即所谓“臧否人物”。《后汉书·郭泰传》说：“林宗（泰）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同书《许劭传》说：许“好人伦，多所赏识。……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郭泰和许劭都是东汉末年人物评议的权威，凡得到权威好评的，便可取得社会声誉，直接影响其政治生命。因此，人物评议不只是社会舆论的喉舌，且具有政治上甄别的职能。

东汉品评人物，操纵于当权的大族手中。《后汉书·符融传》说：

“时汉中晋文经、梁国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耀上京，……三公所辟召者，辄以询访之，随所臧否，以为与夺。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学，并见李膺曰：‘二子行业无闻，以豪杰自置，遂使公卿问疾，王臣坐门，融恐其小道破义，空誉违实，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论渐衰。”

符融本亦好人伦之俦。晋文经、黄子艾二人“行业无闻”，非大族名士可知，竟然左右三公辟召，当不为名士派所容，符融便以“小道破义”，不遵循大族的标准为理由，由大名士李膺出面干预，晋、黄二人只好退出评议的舞台。又《后汉书·许劭传》云：

“曹操微时，常卑词厚礼，求为已目，鄙鄙其人而不肯对，操乃伺隙胁劭，劭不得已，

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这段故事，《后汉书》与孙盛《异同杂议》所记略有不同，但曹操未出名之时，求许劭给予品评，则是一致的。《后汉书·许劭传》又云：

“初，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

汝南大族许劭、许靖主持的月旦评，每月更换题目，是东汉末年评议人物的中心。汉魏时期讨论人物评议的著作，应有不少的，流存至今较重要的只有刘邵的《人物志》。这是一部专门探讨人物评议的原理、方法、内容以及汉魏间人物评议得失的著作。刘邵认为由于个人的局限，要使人物品评议能恰如其分，真正做到名实相副，并不容易。他在《七缪》中概括为七点：“一曰察誉有偏颇之谬；二曰接物有爱恶之感；三曰度心有大小之误；四曰品质有早晚之疑；五曰变类有同体之嫌；六曰论材有申压之诡；七曰观奇有二尤之失。”刘邵只是从常理说明评议人物不易得实，因而举荐多非其人，而未识当时大族借此结党营私，使名实相去更远。

评议人物原有一定的品类，但其造语往往空泛，如称李膺“谡谡如劲松下风”，只能神领而已。《世说新语》记载了很多这类的评议。这种玄之又玄的评议，竟成了风气，且有一个名称叫做“清谈”，《三国志·刘邵传》夏侯惠荐刘邵书云：“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此处“清谈”便是指人物的品评。又《后汉书·郑泰传》云：“孔公绪（伉）能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孔伉为儒家祖宗孔丘的嫡传，东汉时候的大族。他品评人物爱恶由己，褒贬随意，故有“嘘枯吹生”之功。这段话虽是郑泰投董卓所好而发，但“嘘枯吹生”确是当时大族评议的写照。

王符在《潜夫论·考绩篇》中对东汉根据评议选举官吏的弊病，议论说：

“群僚举士者，或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谗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器阔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愚顽应治剧。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

可见选举名实不相副，已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晋人葛洪作《抱朴子》对此亦曾分析，他在《名实》

篇中设问答：

“门人问曰：‘闻汉末之世，灵献之时，品藻乖滥，英逸穷滞，饕餮得志，名不准实，贾不本物，以其通者为贤，塞者为愚，其故何哉？’抱朴子答曰：‘……夫佞者鼓珍赂为劲羽，则无高而不到矣；乘朋党为舟楫，则无远而不济矣。……夫贤常少，而愚常多，多则比周而匿瑕，少则孤弱而无援。’”

葛洪认为东汉末年出现“品藻乖滥”、“名不准实”，有两个原因，即贿赂与朋党，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

范曄在《后汉书·党锢传》总论中曾列举了当时名士相互标榜的例子：

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学中语曰：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御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

君、俊、顾、及、厨等，都是品评的类别。范曄举的是名士互相标榜的实例，也是借品评而结党的证明。当时的太学生站在名士一边，为之推波助澜，于是浮华之风盛行一时，阿党比周亦登峰造极。范曄又说：“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朋党之祸对东汉影响至大，东汉王朝的灭亡，与此有直接的关系。

（二）

大族的浮华朋党不但同宦官集团对立，亦遭寒族的反对。寒族既无门阀，又鲜能跻于名士之流，在征辟、察举的选举制度下，仕进之途无疑受阻，故他们自然以浮华之风为攻击对象，深恶此风所形成之朋党。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转移到寒族之手，浮华之风不断受到打击。曹操是寒族的代表人物，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

“孤始举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恐为海内人之所见凡愚，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济南，始除残去秽，平心选举，违迁诸常侍，以为强豪所忿，恐致家祸，故以病还。”

曹操的自述，很可以了解东汉寒族的处境。曹操的父亲乃大宦官曹腾的养子，虽然买了个太尉官衔，仍为儒家大族所不齿，袁绍就骂他“赘阉遗丑，本无令德”。曹操自知非“岩穴知名之士”，在社会上难以立足，他虽有“好作政教以建名誉”，“平心选举”的意愿，即做到名实相副，以才选士，然而不为大族所容，只好称疾归乡里。到了曹操掌握大权，情况便发生变化。他雷厉风行扫荡浮华之风，几次下令表明他对选举的态度。在《举贤勿拘品行令》中称：“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汗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公开阐明他与儒家以孝行取士的不同，如确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即使不仁不孝，也应举用。在《求贤令》中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号召“唯才是举”。在《整齐风俗令》中，他针对当时浮华结党的风气，指出：“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他列举过去四个以白为黑的例子，声明“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此令可视为曹操讨伐浮华之风的檄文。曹操主张“唯才是举”，并非曹操用人只重才而不重政治态度，因为曹操选举重才正是反儒家大族重德而行，实质上是一场政治斗争。

曹操反浮华之风说到做到，最著名的例子当以诛孔融事件。孔融的父亲便是清谈泰斗孔伋。孔融有“高名请才”，与平原大族祢衡“跌宕放言”，互相标榜，“衡谓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颜回复生’。”这般行为正遭曹操所忌，他把祢衡发往荆州，假手他人将祢衡杀掉。他向孔融发出警告说：“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后汉书·孔融传》）可是孔融并未收敛，且屡屡发言讥讽曹操，加以“宾客日盈其门”，有结交朋党之嫌，当然不为曹操所容。在杀孔融的令文中，他首先指斥孔融名不副实，说：“世人多采其虚名，少于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诬诈，不复察其乱俗。”然后数他向祢衡宣扬“父母与人无亲”、“违天反道”、“败伦乱理”即不孝的罪状。孔融本是浮华之徒，说他名不副实大概不错，至于指摘他不孝的罪名，恐怕有点冤枉。孔融的罪名是由路粹告发的，就算路粹所告发皆非诬词，在曹操的统治下，也不致行大辟之刑，因为在曹操的求贤令中申明，不孝不但不能构成罪名，而且要人们不要因

不孝而埋没人才。很明显，浮华才是孔融招致杀身之祸的原因。

曹操在选举上排斥浮华之徒，从毛玠的事迹中也可见。《三国志·毛玠传》说：

“太祖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选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能进。”同传注引《先贤行状》说：

“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

毛玠“少为县吏”，似非出身上层的人物，他完全按照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的方针，把那些有名无实的人拒于仕途之外，打击朋党，故深得曹操的器重。

与毛玠同典选举的崔琰，为何最后被迫自杀，是曹魏统治集团的一重疑案。《三国志·崔琰传》注引《先贤行状》称：

“魏氏初载，（琰）委授铨衡，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朝廷归高，天下称平。”

由此看来，他职掌选举是有成绩的。可是崔琰荐举的杨训，于曹操封魏王之际，“发表称赞功伐，褒述盛德”，被讥为“希世浮伪”。崔琰复阅杨训所上表，给他写了一封信，说：“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被指为“傲世怨谤”，有变天思想。史书说曹操听信谗言，竟将琰下狱处死。如《先贤行状》所说，崔琰“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文武群才，多所明拔”，应得到曹操的信任。而“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亦可解释为崔琰教训杨训不识时务之词，为何曹操因一句谗言，便弃之如敝屣？颇疑崔琰本人就是浮华之徒。崔琰出身清河大族，在社会上“甚有威重，朝士瞻望”，曹操对他既“敬”且“惮”。敬的是他的社会影响，惮的是他的政治态度与曹魏政权不一致。如对孔融一样，曹操对崔琰虽授与丞相东曹掾、尚书等职务，却未尝疏于防范。《三国志·崔琰传》说崔琰称司马懿“聪哲明允，刚断英畴”，称崔林“大器晚成”，对孙礼、卢毓则“名之曰：‘孙疏亮亢烈，刚简能断，卢清警明理，百炼不销’。”可见他不但未能整顿清议，而且自身还保持浮华的士风，举荐“希世浮伪”的杨训，事非偶然，加在狱中仍“通宾客，门若市人”，类似孔融的情况，遭曹操之大忌，非把他除掉不可。毛玠对崔琰表示同情，也不能再司选举之职。崔琰案实是

建安后期曹操打击浮华士风的一次重大事件。经过曹操的大力整顿，浮华士风受到压抑，吏治用人，称一时之盛，曹魏之强大，非只得地利而已。

魏讽案是曹操后期打击浮华士风的另一次重大事件。建安二十四年，丞相西曹掾魏讽乘曹操出征汉中之机，在邳发动叛乱，很快被平息。魏讽的事迹不详，《三国志·武帝纪》注引《世语》说他“有感众才，倾动邳都。”《刘虞传》注引《虞别传》说他“不修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魏讽属浮华之徒可以无疑，不过“不修德行”这一点，却与东汉儒家大族不同。此案牵连甚广，坐死者数十人，其中有曹魏名臣张绣、王粲的儿子，刘虞的弟弟。相国钟繇、中尉杨俊因此被罢官或贬官。名将文稷的儿子文钦也应死罪，曹操看他父亲的面上，把他赦免。由此可见，这次与浮华之风有关的事件，其主要人物却是曹魏统治集团新贵的子弟。然则曹操曾深恶痛绝、打击不遗余力的浮华士风，又在曹魏政权中蔓延了。

(三)

浮华士风在曹魏政权的蔓延，与选举制度的变化不无关系。何夔为丞相东曹掾，向曹操建议说：

“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太祖称善。”

他认为东汉末年由于战乱，使评议不能行，用人不重德，当政权一旦稳定，用人应恢复乡闾评议。曹操早就有“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思想（见《论吏士行能令》），他晚年同意何夔的建议是可能的，但在他生前有没有实行，不得而知。在他死后，魏文帝曹丕时，很快就由陈群正式建立为制度。《资治通鉴》卷六十九黄初元年二月条云：

“尚书陈群以天朝选用不尽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第其高下。”

《通鉴》此条采自《傅子》（见《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五），《傅子》成书离此时不远，所记大致可信。识鉴人物，区别其高下，便是东汉评议的复苏。

到了魏明帝曹睿当政之时，浮华之风已成了

曹魏政权深为忧虑的问题。《三国志·董昭传》记太和中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

“伏惟前后圣诏，深疾浮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撻，毁坏风俗，侵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誉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

董昭陈述当时士风的流弊，“合党连群，互相褒叹”，情况与东汉末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董昭在奏疏中指出浮华之风来自曹魏有权势的人，以致执法之吏“莫能纠撻”。他还指出“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乃浮华之风产生的原因。魏明帝据董昭的奏疏，于太和四年二月下诏，肯定了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为当时浮华之风的症结所在，并表示了整顿浮华之风的决心。可是他却任用卢毓为吏部尚书，负责选举。卢毓乃涿郡大族，父植，东汉北中郎将，曾是“名著海内”的名儒。卢毓继承家风，受命为吏部尚书后，用人及选举，“先举性行，而后言才”，（《三国志·卢毓传》）一改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重新恢复东汉大族的选举标准。

浮华之风转移到曹魏统治集团后，其清谈的内容除品评人物外，还高谈玄学。魏晋之际，玄学讨论的中心是所谓“四本论”，《世说新语·文学》“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注引《魏志》云：

“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傅嘏论同，中书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四本论原为讨论才与性的关系四种不同的观点，才指才能，性指德行。主才性同者、合者，以性为本，才为末，认为有德行然后有才能。主才性异者、离者，则以为才性不相关，重才能而不必有德行。在南朝时，讨论四本论的文章已不多见，现今《艺文类聚》卷二十一引袁准的《才性论》，可谓硕果仅存。《才性论》说：“贤不肖者，人之性也。贤者为师，不肖者为资。然则性言其质，才名其用明矣。”袁准论性为质，才名其用，属才性同的观点。可见才性同异之论，实涉及名实问题，性与才或德与行一致，便是名实相副。性与才或德与行不必统一，便可解释为有才之士，不

必有行了。主张才性合者显然继承儒家大族的传统观念，以经明行修为立世之本；而主张才性异者，则坚持曹操的“唯才是举”的方针。因此，才性的争论，仍然围绕着人物评价进行，其不同于东汉评议的，在于才性之谈更富有理论性。曹魏后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仍是大族与寒族之争，前者以司马氏为代表，后者以曹氏为代表。陈寅恪先生于《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一文中，论述主张才性同异的政治背景，认为主才性同者为司马党，主才性异者为曹党，是很正确的。

《三国志·王昶传》载昶戒子弟书云：

“夫孝敬仁义，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人若不笃于至行，而背本逐末，以陷浮华焉，以成朋党焉。浮华则有虚伪之累，朋党则有彼此之患。”

王昶出身太原大族，为司马懿所荐举，当属司马党。他谆谆告诫子侄勿染浮华之风，并非只是儒家的说教，亦包含着当时两大集团壁垒之见。

太和、正始年间，浮华之风大为盛行，《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世语》云：

“是时，当世俊士散骑常侍夏侯玄、尚书诸葛亮、邓扬之徒，共相题表，以玄、畴四人为四聪，诞、备八人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熙、孙资子密、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此，以父居势位，容之为三豫，凡十五人。（明）帝以构长浮华，皆免官废锢。”

这批新贵名士由于秽名远扬，儒家大族卢毓、王昶之流抓住其弱点加以抨击。明帝也感到不整顿浮华之风，会危害曹魏政权，于是将夏侯玄、邓扬等十五人“免官废锢”。可是明帝死后，曹爽为了对抗以司马懿为首的大族集团，倚重浮华之徒为自己的党羽，被罢黜的邓扬等人“乃复进叙，任为腹心”（《三国志·曹爽传》），任用夏

侯玄为中护军，何晏、邓扬为侍中尚书，李胜为河南尹，并扼要害部门，自以为大事可定。然而高平陵之变，曹党很快便土崩瓦解，曹爽、何晏等八家遭族诛。历史来一个反复，昔日以儒家大族浮华之徒为打击对象的寒族，而今换了位置。曹党所以片刻间一败涂地，浮华之徒在社会上失去支持是重要的因素。

曹魏后期发生的“淮南三叛”，是曹党和司马党的武装冲突，其主角与浮华之徒有关。文钦曾受魏讽案牵连，前已述及。毋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三国志·毋丘俭传》），正元二年与文钦联合反司马氏的诸葛诞为“八达”之首，也“与夏侯玄、邓扬等相善”，“言事者以诞、扬等脩浮华，合虚誉”（《三国志·诸葛诞传》）。毋丘俭、文钦在淮南举兵，遣使申连诸葛诞，诞因与文钦不和，不但没有响应，而且助司马师讨文钦等。及夏侯玄、邓扬被诛，毋丘俭被夷灭，他自知难保，甘露二年，司马昭征他为司空，实欲夺其兵权，诸葛诞于是也在淮南叛乱，兵败被杀。自此，曹魏政权中有势力的浮华之徒，基本上被消灭，而司马氏也完成了夺权的最后步骤。再过五年，司马炎重演曹丕禅代的故技，曹魏政权灭亡。

《晋书·傅玄传》云：

“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

司马炎即帝位不久，广泛征求意见，傅玄为他总结曹魏的统治教训，着重陈述“虚无放诞之论”即浮华之风对曹魏灭亡的影响。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当然，曹魏政权的递嬗，自有其深刻的原因，但浮华士风对曹魏政权的兴废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实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方孝岳先生的治学方法

李新魁

方孝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音韵学家、经学家和文学家，他的学术成就，以及治学严谨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都值得我们学习。下面，仅就所知方先生的治学方法，向读者做一介绍。

方先生一八九七年九月十七日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他原籍桐城，是著名的桐城派学者方苞的后代。他的父亲方盘君，曾任安徽省学堂的董事长。

十四岁以前，他在家乡的私塾读书。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八年七年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附属中学及大学文科。大学毕业后，一九一九年开始，他担任北京大学预科的国文讲师。一九二〇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不久，他便离开上海到日本东京大学进修两年，在此期间，翻译出版了《欧洲大陆法律思想小史》。一九二四年，从日本回国，在北京华北大学任教授，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二九年两年间，转至东北大学师范学院任教。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二年，又返回华北大学。一九三三年起，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一九三九年，返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任职。一九四八年，重返中山大学，从此在中大工作了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一年被迫退休。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病逝于湖北京山县。

方先生一生热心教育事业，辛勤培养后辈，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潜心学术；他热爱新社会，拥护中国共产党，被选为广东省一至三届人大代表。十年内乱期间，他虽然遭受冲击，仍念念不忘人民的教育和科学事业。他的为人品德，和献身我国学术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方先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他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成就也是多方面的。

方先生早年即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担任中山大学中国文学教授。他对我国文学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这反映在他所写的两部著作《中国散文概论》和《中国文学批评》（均收在刘麟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八论》中，世界书局1936年出版），这两本论著曾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他年青时还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的讨论，曾写有《我之改良文学观》（收在郑振铎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等文章。

在研究文学的同时，方先生还致力于经学的研究。解放前，他出版了《左传通论》（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之一）。解放后，又出版了《尚书今语》（一九五九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经学典籍之一。其深奥难懂是众所周知的。《尚书》有古文、今文之分，其中有不少是后人伪托的篇章。方先生选择其中比较可靠的、具有代表性的几篇作品，如《尧典》《皋陶谟》《禹贡》《洪范》《大诰》等作深入的研究，汇总起来写成《尚书今语》一书。这部著作所研讨的《尚书》原作篇数虽然不多，但却凝聚了他数十年来精研经学的心血。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深厚的学力。他善于吸收汉儒司马迁、贾逵、服虔、郑玄和清儒江声、孙诒让、段玉裁等人的研究成果，又发挥自己的特识，提出许多独具只眼的见解。他把音韵学、训诂学、文字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学识汇通起来，对《尚书》里的许多历来感到难解的问题作了出色的论述。

方孝岳先生的学术成就，更主要是表现在音韵学上。解放以后，他把主要精力用于音韵学的研究，写下了数量甚丰的著作。他写的著作计有：

《汉语语音史概要》、《广韵研究导论》、《广韵声类》、《广韵韵图》、《广韵便览》、《广韵又音谱》以及《集韵说文音》等。

《汉语语音史概要》论述了汉语共同语音发展的全过程；对语音史研究的目的、任务、方法、资料及名词术语等问题提出了中肯的论述和解释；对语音学的重要典籍和古代语音学者的主要学说进行了批判。方先生这部论著虽然篇幅不大，却是他的音韵学和语音史研究成果的集中概括，包含了他对音韵学上各种问题的研究心得和见解，是学习和研究汉语语音史的一本重要读物。

方先生治音韵学，用力最勤的是《广韵》。他对《广韵》及其所涉及的典籍进行了多方面的综合比较、整理和研究。尤其是对《广韵》的反切系统以及由这个反切系统表现出来的《广韵》音系，进行了透辟的研究，提出许多精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广韵》给予宝贵的指示和极大的助益。

方先生还写了许多单篇论文。主要有《关于先秦韵部的“合韵”问题》（《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4期）、《论谐声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韵读》（同前，1957年第3期）、《广韵研究怎样为今天服务》（同前，1959年第1、2期合刊）、《略论汉语历史上共同语语音和方音的关系——附谈戴震的音韵学的评价》（同前，1960年第3期）、《跋陈澧〈切韵考〉原稿残卷》（《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跋唐写本〈经典释文〉残卷》（同前，1963年第1期）、《上古音概述》（同前，1978年第2期）、《论〈经典释文〉的音切和板本》（《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关于敦煌残卷〈尚书释文〉若干问题之讨论》（《语言文字研究专辑》，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对上古音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如谐声系统、合韵问题、古韵拟音、通语与方言的关系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对明清时代的许多古音学家如顾炎武、江永、戴震、段玉裁等人的研究工作作了中肯的评价。另外，对《经典释文》和《切韵》《广韵》等书的音切做了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指出它们制切用切的特点。这些论著和论文对于推动我国音韵学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

方先生的治学方法，一方面得之于家学渊源，一方面得之于学校教育和书本传授。他本是桐城派的后裔，又是近代古文家马通伯的女婿。青少年时期，便受到治学的熏

陶，富有学养。在圣约翰大学读书及留学日本期间，又涵泳于西洋新学之中，吸收国外治学的方法。解放后，他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吸收马列主义的新观点。他把新旧之学熔于一炉，冶炼融化，终于能在自己的研究中取得卓越成就。

方先生的治学方法，概括起来，共有五个方面。

（一）掌握流变

方先生治学的方法，首先是善于“掌握流变”，树立比较牢固的发展观念。“掌握流变，观其会通”是他常说的一句话。他在许多论述中，都强调建立马列主义发展观念的重要性，如他在《论诸声音系的研究和“之”部韵读》一文中开头便说：“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发展观点，在先秦诸声音系的研究上也是完全要掌握的。”他不但树立了这种观念，而且时时运用“掌握流变”的方法来分析、衡量前代学者研究工作的得失。他反对“食古不化”，反对以今律古、以古概今。他在《汉语语音史概要》中说：“我们不能把这一时代的东西硬套到别的时代头上去。”（11页）而这种毛病，正是前代学者所常犯的。他指出这种毛病，告诫我们要注意避免这种毛病。例如，他对过去古音学家提出上古音“家读姑，马读姥”等说法，指出其不恰当之处，认为“这正是中古的现象，而不是上古的现象”；他还指出“过去古音学家所谓‘古音多敛，今音多侈’的说法，实在适得其反”，认错了语音在不同时代的发展和表现。他批评清儒朱骏声、严可均等人颠倒古今关系，忽略语音材料的时代性。他说“例如从‘需’得声的字，在《诗经》是‘侯’部，而他（指严可均）只因为‘需’从‘而’声而放在‘之’部，说《诗经》‘需’声字的押韵是‘转音’。象这种情形，在他的书里各部都有，而且字数很多。他可以不顾押韵的事实，别无其他可以说是‘正音’的例子，而硬把现有的事实当作‘转音’。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也常有类似的毛病。例如‘戟’字在《诗经》押韵只见过一次，就是《无衣》的‘泽’、‘戟’押韵，是鱼部的字。朱氏只因为《说文》‘戟’读若‘棘’，把戟字放在之部，而认为《无衣》是转音。他没有注意《说文》的‘读若’只是汉人的训诂音读，而不是本音，所以有这样的误会。朱氏又有《古今韵准》一书，把后来韵书里面的字按着谐声偏旁分别划归先秦韵部，而不顾有些字根本是后起的字，和古代韵语并无关系。严可均也是不明白《说文》所载的谐声字也本有许多后起字，本是一种发展的东西，而把它看死了。”他认为“专抱着谐声偏旁来编配后来韵书的字，或编配《说文》里面的字，都是一样的主观”。他对江永“专就《诗经》押韵所用的字来证明古音”，认为“十分正确”。说“江永反对顾炎武硬拿上古音来安排《广韵》里面的字，指出‘字似同而音实异，韵既别则等亦殊’，实在是极宝贵的意见”。这种赞赏，就是建立在他的发展观点上面的。他批评孔广森“拿元代《中原音韵》的声调来比拟上古声调”（65页），“拿现在的北音来讲《诗经》”（27页），主张古无入声，那是理解有误，是欠缺语音发展观念的表现。他批评章炳麟把《切韵》的元音系统看得太简单，说“章炳麟认为《切韵》里面许多相近的韵部，只是介音方面有开、齐、合、撮之分，而不是元音不同”，“他是拿后来的音来看《切韵》的音”（125页），也是缺乏历史发展观念。因此，他特别强调对过去的语

音材料，必须十分注意它的时代性。指出“过去有些人存在过一些偏向，我们不应该再犯”。他这番话，贯串于他的整个研究工作之中，他自己很重视区分不同时代的不同材料，并运用“掌握流变”的方法进行分析。如他编金文韵谱，归纳先秦韵部，就纯用见于金文和出现于先秦典籍的字，而不杂用后代出现的后起字。又如，他在《尚书今语》中，对“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这两句话的解释，认为把它说成是“光辉照耀到四面八方”是“以词章家用字之法观古史”。他论述《尚书·尧典》中的“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时，认为前人把帝尧的这一行动，渲染为“禅让天下”的美谈。指出“禅让天下之说，乃晚周诸子托古之言。庄周之徒托之以鸣高，韩非托之以言古帝王之劳苦，故无乐乎有天下”。而事实上，还是孟子所说的“尧老舜摄”、《荀子·正论》所说的“以舜继尧，朝不易位，国不更制”差为近是，并不是什么“禅让”。古书中所说的“讴歌讼狱不之丹朱而之舜”，“此则一家之理想，当时人民盖无此自由也”。他指出“自王莽托虞后以受汉禅，而曹魏之际亦有‘舜禹之事，吾知之矣’之言。不必论其传统观念之是非，而其为以后拟前，谬误则一”。（《尚书今语》15页）这些都是以后世之事来笼罩古人，犯的都是以今拟古或强古就今的毛病。这种毛病，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所不取的。

（二）总揽全局

方先生的研究工作，十分重视“整体观念”，处处运用“总揽全局”的方法。就古音研究来说，他提出要“掌握系统，注意变迁”。他认为研究古音，不应零敲碎打，只注意个别音类或个别字音的研究，而是“要以语音的体系为重要纲领”，“其中韵母体系尤为重要”（68页）。而语音的研究，又不能离开文字、训诂等方面的研究，它们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应该把音韵、文字、训诂等汇通起来，构成一个整体来研究。他在谈到上古音的研究时说：“如果不知道这个上古音系，即不能离开文字形体而了解古代许多语义之间的相互关系。”（68页）

他的整体观念，不单表现在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上，而且也表现在研究方法的掌握上。他提倡“考古与审音并重”，两者不可偏废，考古与审音构成古音研究方法的整体。所以，他比较欣赏江永和戴震等人的研究工作，认为他们比较能够做到两者相结合。而对陈澧，他认为陈氏“对于反切的研究，只限于字面的‘系联’，而不去从事审音的工作”，（《跋陈澧〈切韵考〉原稿残卷》）所以陷于片面。

由于他既重视考古，又重视审音，所以他的研究，不管是在音类的考查、《诗经》入韵字的归纳、谐声偏旁的整理等方面，都做到精细入微，而对上古、中古、近代各个时期语音系统音值的拟构，也能博取众家之长，精核异同，拟测出比较合理的音读，做到“合理会时”。他对古音的拟构，十分注重从系统性出发。例如他拟测上古音，先从阳声韵出发，订出它们的音读，认为它们在汉语演变的过程中，最为稳定。然后从阳声韵、阴声韵、入声韵三者之间的系统性和整体关系以及它们的“对转关系”来拟相对的阴声韵和入声韵的读音。做到条理清楚，简而有当。这些都反映了他善于从“整体观念”出发，

运用“系统推断”、“总揽全局”的方法来研究古音的音类和音值。

方先生为了使自己的研究真正达到“考古与审音并重”的目的，十分重视等韵的研究，因为等韵是我国传统审音的方法，是中国式的语音学。清儒精研审音之学，主要就是深入研究等韵。等韵能为古音的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和理论。方先生对这一点有十分明确的认识。他说：“我们对于等韵图表，一方面可以用来了解各时代的韵书，一方面对于认识各时代的实际语音更有所帮助。因为韵书的字有定，而图表排列的方法随时无定，这就是它们的价值了。清代学者研究先秦的音也常常利用等韵，所谓‘从《广韵》出发来上推先秦’，不靠等韵，也无法从《广韵》出发的”。（10页）他的见解是正确的，而他又正是运用等韵这个工具来研究《广韵》和上古音韵，他编制《广韵韵图》和《广韵声类》，就反映了这一点。他重视等韵，以等韵作为审音的重要手段，用它来与“考古”的方法配合运用，确是收到十分显著的效果，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三） 观其会通

方先生治学很注意对辩证法的运用，这是他在解放后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结果。辩证法的核心是不孤立、片面、静止地看问题，按方老自己的话说，就是“掌握流变，观其会通”（2页）。他在研究工作中，确是做到会通而不执着。例如，他对上古时期《诗经》韵脚字和中古《广韵》系统反切上下字的归纳，确能运用辩证的方法。他在归纳《诗经》押韵字时，既按押韵的正例列出本韵的字，又根据偶尔通用的情况列出“合韵”的字，如之撮中在“之时台丝兹尤裘”等字之后列出“合韵对转”的“试”字，在“狸貽”之后列“异”字，“来”字之后列“服赠牧亟塞”等字，在“采已以矣祀耜殆止”等字之后列“合韵旁转”的“茂”字，在“纪士”之后列“造”字，在“喜在宰梓史”等字之后列“氏”字。这样做，既可以看到《诗经》韵脚字中的“基本成员”，了解《诗经》韵律中的一般状态，又可以了解到押韵字与其他有关系的字通转、合用的情况。本韵字反映了《诗经》的韵类大系，“合韵”字表现了当时各地方音的歧异。

对《广韵》反切上、下字的归纳，也是采用相同的方法，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主张把《广韵》的反切上字分为五十九类，比陈澧分为四十类、黄侃分为四十一类、曾运乾、陆志韦分为五十一类、白涤洲、黄淬伯分为四十七类、董同和分为五十四类都多。分得多的原因，是他避免了陈澧等人机械地运用“反切系联法”的结果。他说：“各‘类’反切，虽各自成套，用字的界限大致都很清楚，但也有些‘类’，用字界限并不是十分清楚的，不过韵图上的位置毕竟有些分别，这就要看声韵配合的整个趋势而不能拘守近代陈澧所谓‘反切系联’。例如‘端、知类隔’多见于二等韵。二等韵的知组可能不象三等韵的知组舌面化那么显著。帮、非两组用‘反切系联’的方法尤其难分，但也是随韵母的不同而反切用字的趋势有了相当的区别，即除东三、钟、微、虞、废、文、元、阳、尤、凡十个韵唇音字母为非组、反切纯为‘方、芳、房、武类’而外，其他各韵唇音皆属帮组，而又可分为两类，其中‘博、普、蒲、莫类’独立性很强，而‘卑、匹、皮、弥类’时有混杂，

这就是它们的界限了。”(105页)方先生对这三类反切上字的区别,就是本着会通而不执着的精神,既见其同,又察其异,同、异之间,有彼此区别的大限,按此推求,当分当合便灼然可见。他既注意反切系联之间的正规关系,又注意到“类隔”的存在。但对“类隔”之切,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他认为“类隔毕竟是少数,无碍于共同大类的存在”。(109页)他认为陈澧对《广韵》反切的考订“仍有许多疏忽,他所分的音类并不完全可靠。最大的疏忽是随便利用‘又音’把不同类的反切变为同类,而不知道陆法言对这些‘又音’是有取有不取的。”(《跋陈澧〈切韵考〉原稿残卷》)陈澧的作法,显然缺乏“观其会通”的精神。

(四) 控其枢要

方先生治学的又一个特点,是善于掌握大同,明其小异。他在音韵学的研究和论述中,时常提出“语音大系”和“发展大势”的观念。这些提法,是他的善于“提纲挈领、掌握大要”的治学方法的具体表现。

汉语语音的发展,非常具体而复杂,历史上出现过的语音材料,也纷纭多歧。但语音是无形的东西,古代语音,现代已无法重闻。要深入研究语音史,正确处理材料,是重要的一环。言过于凿,则令人难以置信;言过于繁,则令人难以掌握。因此,研究和论述的方法,必须繁简得宜、抉精择要。方先生采用“语音大系”和“发展大势”的观念,正是善于控其枢要的表现。他认为汉语“很早就有共同音系……但不能没有更早来源所遗留下来的分歧”。“在这个大系之中也有方音的出入”,“所谓通行音系是在一个大系之中包括一些方音差别,内容并不简单”。(76页)对反映这样一个语音大系的《切韵》系统,不应只看到它表现纵的发展(古今之异)的方面,还应该看到它横的牵连(南北之别)的另一个方面。他说:“《切韵》是兼包古今音的演变和当时一般语音大系,在这个大系中有许多方音的出入。所谓古今音演变即表现在方言对应之中,如东、冬二部同摄音近,当然有许多地方是不能分的。但有些地方是能分的,其所以能分,正是由于东、冬二部基本上有不同的来源。”“我们始终认为《切韵》是寓古今演变于各地方音的反映,正是陆法言自序所谓‘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唐长孙讷言所以称赞他这部书能够‘酌古沿今’。”(123—124页)《切韵》的内容既是如此,在探究它所反映的语音现象时就必须求其总的格局和总的趋势,掌握大的系统,而不能极求个别音类的细枝末节。他说:“《切韵》音系在分类细密之中并不是没有大类的概括。这种概括即表现当时普通音的幅度。”(141页)不能以为《切韵》是代表一时一地的单一音系,结果就会导引出象高本汉那样的结论,认为中古音系内容丰富而上古和近代音系简单,把汉语语音的发展看成是“两头细中间粗的怪现象”(76页)。因此,他反对对各种语音材料过事吹求,提倡揆其大要。他在谈到上古的声母时说:“由于谐声字来源复杂,时代和方音差异,问题很多,或由音节与音节之间相互影响,异化、同化种种关系,或由训诂改读,或者是某些字的谐声偏旁本身不无问题,不能一律都从音理上作生硬的推敲;所以我们对于谐声系统虽然

知道它大致整齐，但对于这些例外的情形也应该慎重处理。”（77页）他批评高本汉对上古复辅音声母的拟构方法，认为“不应该把所有这种交叉关系（如“各”-[k]与“洛”-[l]有关系，便拟为kl-、gl-等复辅音形式）都一律简单化地这样看待；尤其是具体某一个字究竟怎样读法，更不应该过于‘以今例古’”。（78页）他提出“有些特殊现象暂时应该阙疑的只好阙疑”，反对“描头画角”、“削足适履”的做法。对于通转等现象的解释，应适可而止，不可滥施巧辞，释所不当释。他说：“例外的通转，我们不能勉强加以解释，象严可均、章炳麟虽然都有贡献，但他们把上古韵系搞成无韵不可通，无韵不可转，那又使人难于捉摸了。”（73页）

（五）打好基础，求精求细

方先生的治学态度，十分谨严。他反对粗浮的作风和夸饰之谈，治学务求精细。他虽然对古学有深厚的根底，但仍在书本上耕耘不辍，数十年如一日。他所读过的书，批语、注文之多，朱、墨之繁，令人惊叹。由于他谨严治学，而且博览群书，所以他的著述，引证宏博，论辩答难，极尽精微，令人叹为观止。

方先生治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在他注重原材料的研习和整理上。他治经学、文学和音韵学，对这些领域里的古代典籍，除十分认真阅读之外，还做了许多分析整理的功夫。他读《经典释文》，编成了《六朝书音反切谱系》，读《广韵》，则编成了《广韵声类》、《广韵韵图》和《广韵又音谱》；读《集韵》，则编成了《集韵引〈说文〉音》，等等。他治音韵学，十分强调熟读《广韵》，一九六二年，他因为指导后学很有成绩，当时《南方日报》的记者向他采访，问他如何指导年青教师，他回答说：“方法就是熟读《广韵》，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此外别无妙法。”他的话虽很简单，但却表现了他治学上的严谨态度和重视基本材料以及求精求细的精神。他对年青人的要求是这样，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读过的几种《广韵》板本，每一种都写满了他的批语以及与其他韵书韵图比勘的材料。

重视基础，是方先生治学的一贯态度和方法，是达到求精求细的根本途径。他认为基础是治学之本，基础打好了，各种各样的学问都可以做，都能做得精细。一九五七年，他在我请他审阅的一篇文稿所写的批语中说：“要从基本方面加深加厚，第二步才是博览，这是必要的程序。”先打好基础，再求博览，然后由博返约，这是方先生历来主张的治学方法，也是他长期钻研学问的经验之谈。他的经验，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社会主义文艺与共产主义理想

黄 展 人

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方针。社会主义文艺既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大的精神武器。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服务，社会主义文艺肩负着不可代替的重要而特殊的使命。同时，这一使命也给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繁荣开辟了宽阔途径。

共产主义思想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核心，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和优秀传统，也是它区别于历史上一切进步文艺的根本特点。

文艺是人类通过审美方式去认识和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它受一定时代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受经济、政治的影响，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在阶级社会中表现为强烈的阶级性。高尔基说过：“文学从来不是司汤达或列夫·托尔斯泰个人的事业，它永远是时代、国家、阶级的事业。”创作的实践也说明，一定的文艺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作家在创作时，必然按照自己的立场观点、世界观去观察和反映生活，总是按照自己的美学理想进行审美评价，从而表达一定时代或阶级的思想感情。历史上的进步作家几乎都是站在那个时代的先进立场，以先进的审美理想去反映和评价生活，符合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前进的要求，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如欧洲资产阶级萌芽和上升时期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等等都是如此。社会主义文艺是世界上崭新的文艺。它是以人类社会最先进、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为指导，以共产主义审美理想去反映和评价现实，为消灭一切阶级剥削，反对压迫，解放全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斗争的无产阶级文艺。社会主义文艺的这一根本性质决定了它必然要通过艺术的方式，对人民进行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教育。

社会主义文艺是随着无产阶级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和发展在人民生活的现实沃土中萌芽、发展并繁荣起来。马克思、恩格斯曾热切关怀无产阶级文艺的诞生和成长，要求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文学要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及其必然灭亡的趋势；同时要把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作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反映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歌颂叱咤风云的革命的无产者。一八七一年欧仁·鲍狄埃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写下了震撼世界的《国际歌》，这首“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把共产主义

思想传遍全世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普及。一九〇六年高尔基的《母亲》深刻表现了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斗争，第一次在无产阶级的文学史上塑造了巴威尔、尼洛芙娜的光辉形象，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朽的史诗，为十月革命胜利后三十年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国际上无产阶级文艺早期发展的事实说明，反映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优良传统。

在我国，随着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革命文艺逐步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百花竞放，美不胜收。仅就长篇小说来看，《创业史》《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三里湾》《山乡巨变》《保卫延安》《三家巷》《上海的早晨》，等等都是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社会主义文学优秀作品。大批象江姐、许云峰、卢嘉川、江华、杨子荣、朱老忠、张嘉庆这样的社会主义艺术形象，以他们闪射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芒的艺术力量，教育和鼓舞着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前进。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文艺如何反映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表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提供了初步的经验。

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实践告诉我们，要正确地理解和表现文艺作品中的社会主义倾向、共产主义思想，必须全面地、历史地、科学地去理解共产主义思想及其在现阶段的具体内容，正确处理作品真实反映社会主义现实生活与表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关系；处理好表现共产主义思想与题材、人物多样化的关系；并按照文艺的规律去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首先，为实现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进行的社会主义实践，为文艺表现共产主义思想提供了现实主义基础。社会主义文艺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它主要描绘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首先是一种运动。在我国，这一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和领导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就开始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因此，共产主义并不是冥冥的空想，它早就作为一种实践，作为一种现实的不断发展的理想，普遍存在于各种社会主义创造之中，而且这一创造还造就了许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感情和道德风貌的新人物。正如胡乔木同志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今天的现实实践，是共产主义理想指导下的现实实践；我们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现实实践基础上的理想。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文艺思想内容的辩证法。因此，要求文艺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用以教育人民，是现实生活对社会主义文艺提出的客观要求，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忽视了这点，就背离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基本的现实生活基础。

现阶段，文艺表现共产主义思想，首先要真实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要通过具体的真实的生活描写，表现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这就要求我们的作家深入生活，把美好的、高尚的东西发掘出来，努力塑造最美好最高尚的灵魂。一方面，要努力

去发现和塑造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另一方面，要正确反映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反映我们时代的面貌，展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就能使文艺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深入到广大人民心灵中去，鼓舞人民为实现新时期总任务而努力奋斗。近几年来涌现一批反映四化的好作品，努力塑造出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例如蒋子龙笔下的乔光朴、车篷宽、刘思佳、解净，他们虽然身分不同，性格各异，但都正视生活、苦干实干，具有社会主义革新精神。又如《高山下的花环》中的人民战士梁三喜，他在保卫祖国的战斗中，大智大勇，敢于牺牲。他们身上闪耀的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给人教育，令人鼓舞。

其次，文艺表现共产主义理想，题材无比宽阔，人物是丰富多彩的。

十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充满蓬勃生动的创造，为文艺创作提供了最丰富、最广阔的天地。文艺要反映和表现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创造和共产主义追求，就必须大力提倡题材和人物形象的多样化，以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和各种各样的新人形象，去充实和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近年来，文艺在这方面已经迈开了新的步子，但是，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许多新的题材领域还尚待开垦或深入发掘。生活不息，创作源泉永不枯竭。那种无视现实广阔的生活题材，回避现实，寻求“自我表现”，甚至宣称“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的主张，是文艺创作的死胡同。

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总是在矛盾斗争中曲折前进的。社会主义的新人新事也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落后腐朽事物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文艺创作，当然不能回避这些尖锐的、深刻的矛盾斗争，歌颂新人新事永远不可能是孤立的，它必须同揭露和批判旧事物有机地统一起来。现实主义的社会主义文艺应当肩负起歌颂与暴露的双重任务，题材的开拓和深化，也离不开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的矛盾关系的揭示，离不开一些反面形象的塑造。小说《乔厂长上任记》《三千万》等成功的经验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不论是歌颂还是暴露，目的是扶正压邪，作品所表现的主导方面应是人民的力量，是社会主义阶段中不断增长壮大的共产主义因素，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必然趋势。那种为暴露而暴露，使人们看了灰心丧气，永远教人哀叹的作品，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

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是多方面的。这也要求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不断开拓新题材领域。我国是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着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民族精神文明传统，我国人民有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创业史。这部历史，也为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了广大深厚的题材宝库。社会主义的文艺在表现当前的新生活的时候，还可以从这一宝库中掘发矿藏，汲取血液。题材不论古今，只要作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去正确地取舍，锤炼，并用丰富生动的艺术形式加以表现，即使是历史题材，也可以创造出闪耀着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使人民从中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得到今天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得到民族的高尚的美感教育。题材不论大小，重大的题材固然有利于表现重大的思想内容，但即使是一些平凡细小的题材，只要

赋予高尚、健康的审美情趣，也将有助于人们丰富知识，认识生活，收到寓教于乐，愉悦心身的作用。

第三，按照审美特点，塑造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以情动人，以美感人，发挥文艺特有的潜移默化，陶冶心灵的审美教育作用，是文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特殊规律。

革命现实主义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优秀传统。恩格斯在批评《旧与新》时，要求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场面和情节中流露出来”。几年前讨论真实性问题时，把“真实地描写现实的关系”看作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同时和有关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原则联系起来，重视了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重视了艺术的典型化，这样就使我们的文艺创作开始摆脱了过去曾一度出现过的假、大、空的廉价的说教，唾弃了那种背离现实生活真实的“瞒和骗”，获得了生机，出现了新的繁荣趋势。但是，近年来也有一些作者离开思想倾向性和艺术典型化，片面强调事实的真实，产生了某些带自然主义偏向的作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重要的一点，就是忽视了在描写现实生活时，在革命理想的指导下真实地揭示现实的关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形象，在典型化的过程中把现实和理想辩证地统一起来。文艺创作是一种美的创造。共产主义精神力量和艺术的美的力量的融合，是社会主义文艺强大生命力所在。我们的作家应该以共产主义审美理想来观察现实美，对表现对象进行审美反映和评价，并以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把这种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表现出来。文学史上一切进步的，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方法，表现形式，都可以吸取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健康形式。因此，我们要使文艺更好地表现共产主义理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服务，就不能不提倡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不能不在坚持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同时，有选择地继承和吸取古今中外各种表现形式。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才能百花盛开，春色满园。

文艺要表现共产主义理想，首先要求作家树立起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假如说时代把这光荣的任务赋予文艺，那么这份光荣首先属于社会主义的作家。面临着文艺如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如何在社会主义大军前进中发挥战鼓和号角的作用，如何为民族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应该勇敢地，自觉地担负起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拿出闪耀着共产主义理想光芒的精神产品，献给人民，献给我们的事业，献给养育我们的民族。

来 函 照 登

近读《学术研究》1982年5期“《三国志》校记二条”，觉所校并非创见，作者恐未翻检《三国志集解》，该书引诸家证建安元年斩刘辟事甚详，而《陔余丛考》亦有辨证。《荀彧传》“马超”应为“马腾”，《通鉴》建安二年条已改正，印象中他书也有考证，一时未查出。“书海酌蠡”常出新意，丰富人们知识，本甚有益处，若刊登前人旧说，便失立本栏之原意。所说未知当否，仅供参考。

胡守为

82.11.23

丘逢甲及其诗歌

杨 桦

丘逢甲(1864—1912)是近代台湾著名的爱国诗人,也是清末有影响的民族志士和教育活动家。早在本世纪初,梁启超就把他同黄遵宪(公度)并提,同誉为近代“诗界革命之钜子”^①;南社中坚柳亚子更有诗赞曰:“时流竞说黄公度,英气终输仓海君;战血台澎心未死,寒笳残角海东云。”^②丘逢甲在抗敌护台、捍卫祖国领土完整统一的正义斗争中,确曾起过积极作用,他的诗作饱和着台湾人民的血泪,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丘氏的研究工作,近年才引起注意。下面,拟就个人所接触的材料,对丘氏生活的时代,生平思想及其诗歌创作,作一概括性的评介。

一

丘逢甲,又名秉渊,字仙根,又字吉甫,号蛰庵、仲闾、华严子,诗文别署“海东遗民”、“台湾遗民”、“南武山人”。后思去旧更新,慕博浪椎秦的义事,改号“仓海”,世称“仓海先生”。1864年11月28日(清同治三年、甲子),他出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一个塾师家里^③,父亲丘龙章字浩臣,为台湾府学生员,刚正清朴,毕生致力于乡梓教育,人称“潜斋先生”。逢甲有兄弟姐妹十四人,他排行第二,幼随父教读,性聪颖过人,七岁能诗,十四岁应童子试,获全台之冠,深得台抚、学使丁日昌的赏识,被誉为“东宁才子”(东宁,台湾的别名)。1884年,中法战起,台湾首当其冲,逢甲“尤感国家民族之患,益留心中外事故和西方文化,慨然有维新之志”,常“以天下为己任,恒为大吏陈国家大计”^④先后作《穷经致用赋》、《全台利弊论》、《何以安置余勇》等,受到台湾各界的器重。1883年秋,参加福州乡试中举,旋赴京会试,中己丑科第三甲九十六名进士^⑤,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⑥。但他无意仕途,引见后,即以亲老告归。在台中宏文书院、

台南罗山书院、嘉义崇文书院等处主讲^⑦,兼授中外史地、劝阅报章,并替《全台通志》等刊撰稿,针砭时弊,鼓吹维新,在社会思想界声誉雀起,受到台湾士民,特别是青年学子的景仰与拥戴。弃官从教的生活,使逢甲较有机会接近人民,对民间疾苦有一定体察。例如,在早期诗作《老番行》、《农歌》中,他对台湾山胞为奸吏所迫,辗转流徙的凄苦命运和农民终年辛劳的清朴生活,即表达了真切的同情与关注;在《谈史》、《夜话近事》、《述怀》中,他追述了自己乞归从教的原因。对于盘剥台民、卷银内渡的劣绩败行,逢甲更深恶痛绝,曾作《去思词》予以辛辣讽刺:

千箱百篋运脂膏,饱挂归帆意气高。

岂是郁林无石载,宦囊已足压波涛。^⑧

1894年5月,“明治维新”后崛起远东的日本,趁朝鲜内乱,蓄意挑起战端,平素关心国事的丘逢甲深为战局的前途而担忧。甲午海战失利,旅大沦入敌手,使他预感到台岛正面临强敌入侵的危难。他对友人说:“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此地,彼能忽然置之乎?”^⑨是年中秋前后,逢甲即“倾家财以为兵餉”,着手组织义军,以“抗倭守土”号召乡里,对乡亲们说:“吾台孤悬海外,去朝廷远,不啻甌脱。朝廷之爱吾台,曷若吾台民之自爱,官兵又不足恃,脱一旦变生不测,朝廷复能顾吾台?惟吾台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祖宗庐墓之地,掷诸无何有之乡,吾侪其何以为家耶?”^⑩中日初战,割台之议未起,逢甲对内外形势即有此认识,虑及台岛前途,设计护台方案,可谓忧深虑远。后来事态的发展,果不出丘氏所料。

1895年春,日军灭清北洋水师、踞我中庄、营口之后,果南下侵占澎湖,肆意勒索。腐败的清政府派卖国贼李鸿章赴日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大哗,但

清政府不顾民命，执意割台让日，派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为“割台专使”，日本则派桦山资纪为“台湾总督”，率军南下，双方赴台办理交接事宜。

割台凶讯传到台湾，人们“若午夜暴闻轰雷”，“奔走相告，聚哭于市，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①逢甲获悉“马关条约”内容，悲愤填膺，电争电吁，卒不得挽，乃啮指血写书连续上奏，要求废约抗战，然清廷终无所动，逢甲为之气塞，愤曰：“台湾者，吾台人之所有，何得任人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②在“无主可依”，强敌入侵的艰危形势下，他首倡自主自救之说，议立台湾为“民主国”，“其间忠义之士尤慷慨愤激，痛骂清廷之负台民而力赞逢甲之议”^③，驰电清廷，宣告“台湾土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众挽台抚唐景崧、帮办刘永福率官军分守台北、台南，逢甲出任义军统领（一称大将军）守台中，合力抗敌，卫国护台。

但是，腐败昏愤的清王朝为配合日军取台，不仅电令台湾文武官员内渡，且电饬沿海各省不得向台济运饷械兵丁，极力牵制台湾人民的抗敌斗争。唐景崧对英勇善战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素怀妒忌，尽管丘反复陈以大义，但唐终不为所动，致唐刘两军孤守，贻敌以可趁之机。五月十四日，台北失守，唐仓卒换装遁回厦门。台北既失，永福坚守至九月初，弹尽粮绝，军溃城陷。唐、丘虽有师生之谊，但丘对唐之所作所为，亦至为不满，曾责叹曰：“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尚不能整饬军纪，徒畏葸游移，坐令其讹变。”“误我台民一至以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④

丘逢甲、林朝栋共守台中，兵力较弱，饷械不足，但义军多募自本土乡民，杀敌心切，惟因仓卒扩营，缺乏训练。台北沦陷后，官兵游勇四窜淫掠，日军收买奸细引路，沿铁路南侵。逢甲先“剿游兵于城内”，闻日兵至，复聚义军“伏于途而击之。”于新竹一带血战二十余昼夜，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所部星散。丘匿山林荒谷间，日军重金严索，延至闰五月底，形势更趋恶化，于进退维谷中，乃从部将谢道隆谏，奉父母内渡泉州，同年秋转广东潮州。行前，倚装匆匆，满腔孤愤，自命“海东遗民”，作“离台诗”六首，痛斥清廷及李鸿章之流的卖国罪行，其哭辞故国山河，矢志驱仇复土之悲壮情怀，感人至深：

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

扁舟去作鸱夷子，回首河山意黯然。

英雄退步即神仙，火气消除道德编。

我不神仙聊剑侠，仇头斩尽再升天。

1895年秋内渡后，丘逢甲举家定居于粤东镇平山村。（今广东蕉岭县文福乡淡定村）^⑤更号“仲阏”，自建“心泰平草庐”，名其堂曰“培远堂”，堂侧两厢命为“念台精舍”和“岭云海日楼”。时以雪耻复土为念，改长子丘琮名为“念台”，常对后辈说：“台湾同胞四百万，尚奴于倭，吾家兄弟子孙当永念仇耻，勿忘恢复。”“我希望汝辈树捍卫国家民族之勋业耳！”^⑥与友人言及往事，“惟翘首仰天、连发叹声。”^⑦赋诗自励，别署“台湾之遗民”。

经历了抗敌护台斗争的洗礼，丘逢甲的思想认识有了发展和深化。痛定思痛，他自觉回天无术，内渡后又见国事日非，列强瓜分豆剖中国之阴谋步步进逼，忧心如煎。丘氏认为，振奋民气、开发民智，培本荣枝乃当务之急。故内渡不久，即打消了逃禅归隐的念头，以己之长致力办学，先后在潮汕韩山书院，东山书院、景韩书院等处主讲、向青年学生热情介绍新思潮和西方文明，积极引导他们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后因受地方守旧势力排挤，乃联合何士果、温仲和等创办“岭东同文学堂”于汕头。1900年春，赴港澳、马来亚、新加坡等地筹款办学，曾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会晤。返粤后又在镇平创办初级师范传习所、县立中学堂和城东、员山等校，另派人去邻省兴办族学。丘逢甲创办的新式学堂，立意培养志在报国之新进青年，主张“来学生徒，志趣远大者为上”、“不分畛域，以广造就”、“修金格外从廉”。力倡“学习有用之学”，告诫青年“毋为科举所累”。^⑧他力主革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增设算学、格致、生化等新式课程。丘逢甲的教育活动，深得开明人士好评，潮、惠、梅地区先进青年“趋之若鹜”。辛亥革命时的不少活跃人物如姚雨平、邹鲁、林震、陈炯明等均曾受教于丘氏门下。1906年，丘氏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聘，出任两广学务处视学及广州府中学堂与两广方言学堂监督。1908年，被举为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东省谘议局成立，出任副议长，主持实际工作，力主禁烟禁赌，为民兴利除弊，成为当时广东地区最有声望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之一。

丘逢甲在潮、穗办学期间，正是以孙中山为

首的革命党人积极活动，社会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的动荡年代。他面对万民哀怨、民变蜂起的社会现实，又亲历过人民抗敌护台斗争的洗礼，他的门生弟子不少又是坚决反清的青年志士，这使他在感情上倾向新兴同盟会党人。从那些朝气蓬勃、“惊世骇俗”的激进青年身上，他看到了祖国民族的希望，发出“眼中突兀少年在，令我郁郁心颜开”的由衷赞叹。出长省谘议局期间，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地位，延揽古应芬、邹鲁、陈炯明等到局任职，特聘朱执信任教，便于他们开展活动。另与新军将领广为结交，借重修南海韩碑亭等活动联络感情，对庚戌新军起义及黄花岗起义中幸免殉难的忠勇青年，多方调护^⑩。辛亥武昌首义成功，丘趁机向粤督张鸣岐等晓以利害，为广东和平光复作出一定贡献。^⑪随后丘出任广东革命军政府教育部长，被举为粤省代表之一，赴南京参加中央临时政府组织工作，当选为中央参议院议员。目睹大好革命形势，丘逢甲倍为振奋，自谓“内渡十七年，无若今日快心者”^⑫欣然命笔赋诗、热情赞颂辛亥革命：

郁郁钟山紫气腾，中华民族此中兴。

江山一统都新定，大纛鸣笳谒孝陵。

正当革命需要丘逢甲献诚出力之时，他不幸身染重疾、吐血不止，南京会议期间即中途退席，仓卒南归。返抵镇平淡定山村时，病情已严重恶化。昏迷中仍忧念国事，闻清帝退位，南北和议告成，面露欣慰之色；及悉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临时总统，则忧心忡忡，谓“袁之为人，孙之意志，吾知之矣，前途未可乐观也。”延至1912年9月25日这位终生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终于溘然长逝，终年49岁。弥留之际，他还深情嘱咐亲属：“葬须南向，吾不忘台湾也”^⑬再次表达了他对故乡台湾的深挚感情。

丘逢甲本是进士出身的封建书生，但他淡泊仕途，乞归从教，在清廷执意割台，强敌入侵的艰危形势下，他奔走呼号、首倡自主自救，并毁家纾难，组织义军，参加抗战，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气节和台湾人民“义不臣倭”维护统一的爱国精神；他所倡立的“台湾民主国”，是民族意识高涨，人民抗敌怒潮推动下的产物。对维系人心，共御外敌，起了一定作用。不应笼统斥为少数官绅“虚声抵抗”的“姿态”。它与当今“台独”分子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近代史家王芸生先生的观点是比较客观和公正的，他说：“当割

台之势已不免之时，台湾有宣布自主之一幕，其事虽昙花一现，然颇足表现我中华民族之精神，尚胜于不战而亡也。”^⑭至于台中义军的二十余战，确曾给入侵者予重大杀伤，阻滞了桦山资纪企图一举南下的战略行动，为永福固守台南赢得了一段时间。^⑮义军残部转战台南、本世纪初镇平人罗福星等返台约期起事，^⑯这些都说明刘永福、丘逢甲等人在台湾人民抗敌爱国斗争中的积极影响。内渡后，丘逢甲始同情康梁变法，继而支持同盟会党人的活动，这说明他能顺应历史潮流而进，不愧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朋友和热心教育的社会活动家。

二

丘逢甲不仅是力谋抗敌护台的爱国志士和有影响的教育活动家，而且是近代台湾著名的爱国诗人。丘诗数量甚丰，世传作有万首，早期写有《台湾竹枝词》、《感事诗》、《柏庄诗草》等；本世纪初，先后有《蜚庵诗存》、《罗浮游草》、《金城唱和集》等问世。丘谢世后，遗稿经其弟瑞甲、兆甲辑为《岭云海日楼诗钞》，由丘氏门生邹鲁等自刊本部分赠亲友。民国廿四年，诗人长子丘琮（念台）择《诗钞》中三百篇，辑印为《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因“跋”中有讥评当局媚日的文字，遭到查禁。故迄今为止丘诗流布不广，中年以下，识者寥寥。

通览《岭云海日楼诗钞》，其情溢于言表，内容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炽烈的爱国怀乡之情和驱仇复土的雄心壮志，是丘诗中最常见的重要主题。诗人在台湾出生长大，对故乡素有深挚感情；内渡后万感交集，积愤难平，丧土亡家之痛使他寝食难安，岭南的山川风习，本与台岛无大差异，这更勾起他去国怀乡的幽愤情思，明月清辉，北雁南归，使他倍感飘零、离乱之痛：

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

——《春愁》

三年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

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飞梦渡鲲洋。

——《元夕无月》

诗人恨不能将无尽的哀思和未酬的壮志，化作“怒涛”、“利剑”，“涌东海”“汲鳌山”，“斩长蛇”，“屠饿蚊”，为收复故国山河而重着戎装，

完成未竟之事业。即使病魔缠身，他也不忘国耻家仇，嘱咐友人“所须药物是当归，有客天南叹式微。未报国仇心未了，枕戈重与赋无衣。”（《病中赠王桂山》）。

“丛菊空留他日泪，故园烽火未曾收”，诗人内渡后，一直记挂着台湾人民的抗敌斗争，想方设法同乡亲旧部取得联系，互通音问、相互激励。他叮嘱大家牢记民族传统，永远心向大陆，共谋中华的统一。“大九州当大一统”台湾回归祖国，实现民族统一的神圣事业必将实现。在《送颂臣之台湾》一诗中，诗人深情写道：

亲友如相问，吾庐榜念台。全输非定局，已溺有燃灰。弃地原非策，呼天愧见哀。十年如未死，卷土定重来。

王气中原在，英雄识所归。为言乡父老，须记汉官仪。故国空禾黍，残山少蕨薇。渡江论俊物，终属旧乌衣。

诗人在思想感情上和乡亲部属相通相随，“碧血纵埋非汉土，赤心不死尚唐年”，坚信他们抗敌护台、忠于祖国的斗争精神彪炳史册，堪与日月同辉。

二、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及由此招致的严重恶果，吁请国人认清形势，救亡图存，是丘诗的另一重要主题。丘逢甲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动荡的历史年代。这时，世界资本主义逐步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力图奴役其他民族、掠夺殖民地，以获得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的斗争日益激烈。在清政府腐败统治下，地大物博而国势日衰，人口众多而民心涣散的旧中国，势必成为它们掠夺的重点对象。特别是甲午战后，列强趁势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炎黄子孙沦为亡国奴的危机空前严重。丘逢甲对此有较清醒认识，他见日本得陇望蜀，踞台后又垂涎闽粤（“有人图写闽山去，着色争夸势力圈”），辽东、九龙、胶州湾相继被俄、英、德侵占，先后作《岁暮杂感》、《九龙有感》、《闻胶州事书感》等予以揭露，发出了“祆庙屡闻生愤火，蓬山又见起边尘。青州酒断愁难遣，黄海舟迟信未真。慷慨出门思吊古，田横岛上更何人？”的深沉感叹。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诗人作《述哀》以泄忧愤。面对“海上纷来九头鸟”，“九州无处不胡尘”的危急形势，逢甲忧心如焚，他认为沙俄在甲午战后即出兵东北，占我旅大，染指新疆，强筑中东铁路，威胁最大，“戎首实自罗喉倡”，若不抓紧自强力

御，后果不堪收拾：

九边烽火迫金台，客唱新添塞上哀。
更筑长城防不得，鸢章南下老羌来。

——《题康步厓中翰（咏）出塞集》

帝国主义不仅霸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且肆意进行经济文化侵略，既破坏了我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摧残了新兴民族工商业的幼芽，大量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遭到掠夺，以致主权断送，白银外流，国势日衰，黎民苦不堪言。在《汕头海关歌》中，诗人满怀悲愤，尖锐揭露了列强宰割旧中国的种种惨状：海关大权旁落，“新关主者伊何人？短衣戴笠胡羊鼻。”洋货与毒品充斥中国市场，民族工商业备受打击（“日日洋轮进出口，红头旧船十九废。土货税重洋货轻，此法已难相抵制”）。更有甚者，他们还直接诱骗青壮年出洋，残酷榨取廉价劳动力，炎黄子孙沦为“猪仔”、奴隶，其惨相目不忍睹：

以其货来以人往，人艖迫窄不能位。岁十万人出此关，倭指归来十无四。十万人中人毙半，载往作工仰喂饲。可怜生死落人手，不信造物人为贵。中朝屡诏言保商，惜无人陈保工议。我工我商皆可怜，强弱岂非随国势！

外国的经济文化侵略与渗透，加速了旧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的过程。沿海商埠畸形繁荣，淫靡之风日盛，不少人“醉生梦死恣行乐”，近海城镇出现了“江头日日呼画船，珠歌翠舞年复年”的颓靡景象。在《澳门杂诗》、《九龙书感》、《香港书感》、《珠江行乐词》等诗篇中，对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后造成的种种恶果，诗人都汇诸笔端，针对“东南已无干净土，半壁江山半腥血”的形势，发出了“思之应下哀时泪”和“热血苦难消”的深沉感叹。可以说，甲午战后列强侵略中国的重大事件，在丘诗中都有反映，代表作如《汕头海关歌》、《海军衙门歌》、《述哀答伯璠》、《岁暮杂感》、《闻胶州事书感》等，与黄遵宪同类题材的诗篇一样，反映了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尖锐矛盾，具有诗史的价值，为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的苦难与耻辱，提供了一份生动的教材。

三、针砭时弊，暴露清廷之腐败昏愤，抨击权奸显宦的卖国求荣，呼吁上承民族之优秀传统，下开革新自救，擢用忠良之通路，励精图治，使我中华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清廷弃台卖国之丑恶行径，丘逢甲早已郁愤不平，内渡后

见吏治日暗，国事日非，更万感交集，常抚今追昔，借凭吊忠魂，追念文山来寄托自己报国无门、忠良受抑的幽愤情思，假古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如《凌风楼怀古》，《铁汉楼怀古》），对权奸污吏以人民血泪尸骨换取功名利禄的无耻罪行严加痛斥。如在《海军衙门歌》中诗人辛辣讽刺了他们腐败无能卖国求荣的卑劣面目：

我不能工召洋匠，我不能军募洋将。衙门沉沉不可望，若有人兮坐武帐。早知隶也实不力，何事挥金置兵仗？战守无能地能让，百万冤魂海中葬。购船购炮仍纷纷，再拼一掷振海军。故将逃降出新将，得相从者皆风云。……

庚辛之后，丘逢甲从一系列惨痛事变中逐渐认识到，山河破碎、国衰民穷有更深刻原因；整个官僚集团腐败黑暗、病入膏肓，难以救治。“一官便具奴才性”，朝廷则“何人怒喜为怒喜，不知国仇况国耻”，甚至认贼作父，绞杀民众，“同一国民教异，昨日义民今日匪”。统治者骄奢逸乐，嗜血成性，为搜刮民脂民膏，竟借筹办海防经费之名，派大员赴粤主持开赌，收取赌饷。针对这种祸国殃民的肮脏措施，诗人在《纪事》中予以辛辣鞭挞：

何止诛求在市租，上供只道急军需。相公南下纾筹策，报国居然仗赌徒。

对于官场中那些贪婪歹毒，“全无心肝”，吮吸民血的“蝎”“蝇”“蝨”“蛆”之流，诗人深恶痛绝，曾作《虫豸诗》《新乐府》等予以讽喻。诗人对清王朝统治集团终于绝望，遂把视野投向新兴社会力量，逐渐倾向排满革命。

四、同情人民疾苦，探究社会病根，由赞助变法维新进而同情讴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清政府为支付历次战争失败后的大量赔款，把沉重负担转嫁到国内各族人民头上，巧立名目，强征暴敛，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更兼水利长年失修，水旱灾害频繁，中国人民陷于空前未有的苦难之中。1908年，诗人曾作《述灾》诗记述水患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炎天久不雨，一雨遂泛滥。三江势俱涨，有地皆水占。平乡水过屋，高市水入店。……灾民露天宿，屡徙常倚担。生者鹄面立，死者鱼腹敛。天心夙仁爱，忍使民昏垫。无家百万人，仰视宁无憾。虽有泛舟粟，救死亦云暂。来日良大难，安能久遍

贍？平生愧禹稷，饿溺常在念。彷徨起中夕，侧目江云暗。

诗人念及灾民流离乞讨的悲惨情景，愧疚自己无力解救人民苦难，寝食难安。丘逢甲济世有心而武无地，他收到挚友带来的“香米”，欣喜至极，但捧起亲手做好的喷香米饭，内心却涌起深重的忧伤：“颇闻被灾处，草木无根皮。不知饥民况，能再支许时？念此不能餐，北望挥泪洩！”（《晓沧惠香米兼以诗贖、赋此为谢，并送之汀州》）这种同情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在《诗钞》中时有所见。即使逢年过节，他也警醒家人毋忘黎民百姓，“满城多少贫儿屋，难过钱荒米贵年。”（《除夕示时甫三绝句》）

吏治黑暗、外患频仍，天灾人祸接踵而来，人们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越来越多。在《戊申广州五月五日作》中，诗人写道：

年来民穷盗益多，群盗如毛不可栉。……民言官苛迫民变，官言革命党为孽。彼哉革命党曷言，下言政酷上种别。假大复仇作槩，横流海外灌海内，已似洪流不可绝。……

急剧动荡的民情世态，使诗人预感到这是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前奏，他渴望春回大地、万象更新的时代早日到来：“莽莽平原郁旱尘，草痕绿浅不成茵；东风吹起蛟龙梦，一夜雨声千里春”（《春感》）。维新改良已无补于事，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党人，正以唤醒民众，复兴祖国，倡行民族大义的新兴力量出现，他们深得人心，其势如滚滚洪流，任何腐颓势力也阻遏不了。眼见新思潮、新风尚激励民众，新事物如雨后春笋，诗人拍手称快，欣慰作歌热情欢呼“中国睡狮今已醒”的巨大变化。武昌首义成功，诗人更欣喜若狂，直接讴歌辛亥革命的胜利。

丘逢甲诗歌揭露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尖锐矛盾，描绘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风云，抒发了台湾人民矢志驱仇复土，渴求和捍卫祖国统一的悲壮情怀，他在中国近代反帝爱国运动史和近代文学史上，无疑应当占有一席历史地位。

三

丘逢甲诗歌的艺术风格，清末民初即引起世人的注意。近代著名爱国诗人黄遵宪与丘逢甲交谊很深，黄氏称赞丘诗“真天下健者”，梁启超则

把丘、黄同推为晚清“诗界革命之巨子”。近代中国侨居新加坡的著名学者丘菽园在《诗中八友歌》中写道：“吾家仙根工悲歌，铁骑突出挥金戈；短衣日暮南山阿，郁勃谁当醉尉呵”。诚然，悲壮雄健，是丘诗的重要特色。丘逢甲幼负报国效时之大志，青壮年时期亲历了抗敌护台的烽火，备受亡国丧家之痛，内渡后又饱尝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这种独特的生活际遇和心理感受，陶熔了他特有的诗歌风格：苍凉沉郁中腾跃英气，雄强激宕而又明朗自然。正如江山渊所说：“诗本其夙昔所长，数十年来覆颠顿于人事世故家国沧桑之余，皆足以锻炼而淬砺之。其所为诗尽苍凉慷慨，有渔阳三挝之声，如飞兔腰裘绝足奔放，平日执干戈、卫社稷之气概，皆腾跃纸上”^{②6}丘逢甲眷念家国的感人诗作，字字饱和着台湾人民和他自己的血泪辛酸，读后使人潸然泪下，但它却不使人消沉，诗人矢志雪耻复土。“卷土定重来”的坚强信念，贯串始终，“郁勃”激越之情，强悍炽烈，力透纸背，给人以精神上的振奋和激励。

丘诗风格，除世人称道的悲壮激越之外，还有清丽深秀的一面。逢甲自幼熟读诗书，他早年景仰杜甫，诗风平实严谨，曾有诗云：“平生我愧杜工部”（《与高啸桐同客广州》），还说：“于时我正从韩公，捕逐八荒两翅疾”（《东山谒韩祠毕及子华长句次韵寄答》）内渡后，丘诗既保持了杜甫的特点又吸取了陆游的雄直和清丽，形成新的风格。逢甲曾有诗自况陆游：“吾生于放翁，所遭百不同。同者惟此心，天或哀吾穷”（《以摄影心太平草庐图移写纸本》）。丘、陆两人的时代、经历不同，但这两位爱国诗人都是生活在祖国山河破碎，关系民族存亡的特定时代，都有力挽狂澜的雄心抱负，内心都郁结了报国无门，忠良受抑的满腔悲愤，两人忧国忧民之心极易相通。抗敌事败，逢甲仿效放翁，以“心太平”三字自题草庐（“吾生似放翁，筑室思山陬”《神龟祠》），积愤难遣之余，也览胜吟咏，放怀山水，写了不少讴歌自然，托物言志的篇杂，这类诗作文采婉丽，风格自然清新，含意深永，别具一格。

对诗歌中各类艺术体裁的运用与把握，丘逢甲也比较娴熟精到。丘菽园说：“仙根诗各体皆佳，才气亦大，全集自以七律为上驷”^{②7}他的律诗工整平实，用典贴切，而歌行体和排律则雄劲豪迈，元气淋漓，纵古论今，熔抒情、叙事、议论于一炉，势如大江东下，一泻千里，壮阔雄浑，

卓然大家风度，显受李白、杜甫的积极影响。丘逢甲既有别于“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梁启超语）的谭嗣同，也不同于重在写实、诗风严谨的黄遵宪，他设法突破传统格律的限制，采用古文家的“伸缩离合之法”，力图将严整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揉合起来，写作了不少形式上较为自由洒脱的歌行体和新乐府，如《七洲洋看月放歌》、《古铜兵器歌》、《日蚀诗》等重在抒情的长诗。诗人让想象的骏马驰骋于天上人间，构思奇巧，意境雄奇开阔，形象瑰丽生动，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丘诗中的五七言绝句，另有一番特色。诗人观察精细，感受敏锐，善于捕捉现实生活中那些富有特征性的图景，简洁勾出一幅幅生动明丽的艺术画面，寓情于景，传达出自己对各种自然美的独特感受。例如，同是岭南深秋景色，在诗人笔下，有的五彩纷呈，格调爽朗，如《秋溪即目》：

“绿减蕉阴夜有霜，园柑红柿间丹黄。扁舟坐爱秋溪晚，七曲屏山半夕阳”。有的本色天籁，浑朴自然，如《山村即目》：“一角西峰夕照中，断云东岭雨濛濛。林枫欲老柿将熟，秋在万山深处红。”有的小诗含意蕴蓄、耐人寻味，借描绘特定自然景色，对某种社会现象进行讽喻，如《春日杂诗》：“极目春城夕照中，落花飞絮木棉风。绝无衣被苍生用，空负逃天作异红。”有的小诗受到客家民歌的明显影响，语言通俗晓畅、质朴明快，如：“春山草浅宜畜羊，山半开畜合种姜。比较生涯姜更好，儿童都唱月光光”（《游姜畬题山人壁》），这类诗作，以民间口语入诗，琅琅上口、易于传诵。有的还吸取了反映新思想、新知识的新名词、新术语（如《海中观日出歌》）。丘逢甲的这些大胆实践，响应了黄遵宪提出的“我手写吾口”的文学主张。梁启超对此有过中肯评价，他认为丘逢甲“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经见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②8}，确是别具风格，适应了时代的新要求，同黄遵宪等人一起推进了近代诗歌发展的新潮流，这对晚清“险奥聱牙”的“同光体”，是一个有力的冲击。

象其他起过进步作用的思想家、文学家一样，丘逢甲也有他的局限与弱点。他虽然参加过台湾人民抗敌护台的爱国斗争，但对唐景嵩这类官僚、“恩师”过份信赖和依靠，对人民群众的潜在力量和伟大作用则认识不足，以至形势急剧逆转之际，悲愤怅惘而不知所措，未能自始至终坚

持与台湾人民一道进行较长久的抗敌武装斗争。内渡初的一段时间，尽管对媚敌卖国的投降派至为不满，但却幻想光绪帝再次执政、擢用“忠良”，重振朝纲（如《日蚀诗》）。他的部分诗作流露出逃禅归隐的消极思想（如《还山书感》）和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如《烈妇墩行》），有的则是应达官命妇之请而写的酬酢之作，铺陈典实，堆砌雕赘亦有所见，有些诗作在艺术表现上给人以雷同之感。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②③}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丘逢甲在近代爱国运动史和近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贡献，定将得到比较公正客观的科学评价。

①②③ 梁启超：《饮水室诗话》。

④ 柳亚子：《论诗六绝句》见《柳亚子诗词选》第33页。

⑤ 关于丘逢甲的出身，多认为“台湾望族”。据丘氏家谱、丘琮《丘公逢甲年谱》及丘氏后人口述，丘逢甲曾祖丘仕俊时由粤迁台，在台中东势一带拓殖经营，祖父丘学祥亦务农，精武术，到第三代，即丘逢甲父亲丘龙章（字浩臣）这一代，才转向文事，考上秀才，家境小康。戊子年（1888）逢甲乡试中举后，始迁台中柏庄新宅，不久柏庄亦为日军所焚。

⑥⑦ 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⑧ 丘琮《年谱》作“中式八十一名进士，殿试膺唱赐二甲进士出身”。今据《柏庄诗草》手稿本及《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所载，改为“己丑科第八十一名贡士，己丑科第三甲第九十六名进士”。按丘琮撰《年谱》时，恐尚未见到上述两书。

⑨ 关于丘逢甲的官职，世人多据连横《台湾通史》，说丘“联捷进士后授兵部主事”。实误。据丘琮《年谱》，实为“工部虞衡司主事”，今台中丰原仍存有丘逢甲当年自立之“进士纪念碑”，碑上镌明“工部主事”。乡间有谓丘为武

进士者，逢甲曾“戎纪以诗”（见《岭云海日楼诗钞》卷五）。

⑩ 丘氏中进士后返台主讲之书院，丘琮《年谱》载为台中府衡文书院、台南府罗山书院、嘉义县崇文书院，今从《柏庄诗草》和连横《台湾通史》，作如上改动。

⑪ 丘逢甲《柏庄诗草》手稿影印本第28页。按此手稿本为戊午（1978）年所发现，现由丘氏后人珍藏。

⑫⑬⑭⑮⑯⑰ 江山洲《丘仓海传》原载《小说月报》民国四年六卷三号。

⑱ 江山洲《徐骥传》，转引自《中国近代史》第247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⑲ 据丘氏后人口述，丘本“奉旨归籍海阳”，因诗人父亲恐子弟在沿海城镇染上劣习，有损“耕读之家”本色，遂举家迁回祖籍粤东镇平，择淡定山村定居，逢甲本人则在潮汕等地办学。又南朝时海阳县治所在今广东梅县，镇平旧属梅州，故名。

⑳ 丘琮《山古怀录》，载《仓海先生丘公逢甲诗选》第15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廿四年版。

㉑ 未刊丘逢甲手稿之一，《创设岭东同文学堂缘起》。

㉒⑳ 参见宋庆龄主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二集中温翀远、邓警亚、张麟村等人的文章。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

㉓ 丘复《仓海先生墓志铭》，载《南社文丛》第四卷。

㉔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三卷第30页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

㉕ 参见《中国近代史》第2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㉖ 参见王芸生《台湾史话》第76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㉗⑳ 丘菽园《挥麈拾遗》，转引自《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第553页，阿英编，中华书局1958年版。

㉘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

从给梁启超的信看黄遵宪晚年的思想

汪松涛

关于黄遵宪晚年的思想，目前尚未理出一个明晰的轮廓，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一些歧见。有的同志认为黄遵宪晚年的诗歌作品，“明显地否定了君主立宪的思想”，有的同志则认为黄遵宪始终不改“鄙视人民，害怕革命的反动立场”。如何实事求是地、较客观地评价黄遵宪晚年的思想，仍然是黄遵宪研究中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从一九〇二年起至一九〇五年黄遵宪去世前数日止，黄遵宪大约一共写给梁启超十来封书信，这些书信是目前我们研究黄遵宪晚年思想情况的主要依据。书信现尚未正式刊布，只是在一些人的研究著作或单篇论文中有过片段的引用。本文根据黄由圃托人手抄的黄遵宪与任公书稿，拟就书信的主要内容，对黄氏晚年的政治思想，作一些初步的归纳和分析，以期整理出一条基本的线索。

一、南归时的精神状态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六日，慈禧发动了政变，随即对改良派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康、梁出走，六君子遇难，新党人物被罢黜一空，新政诏令一概废除。黄遵宪在他的《感事》诗中记述了维新党人受到的沉重打击以及这场变故在人们中间造成的恐慌。他说：“父子相从泣狱扉，老翁七十荷征衣。一家草索看生缚，三寸铜棺待死归。凿空虚槎疑汉使，涉江奇服怨湘妃。可怜时俊才无几，瓜蔓抄来摘更稀。”“是非新旧纷无定，君看寒蝉噪众官。”在反动派的屠刀面前，不少人噤若寒蝉，思想上一片混乱。

当政变发生时，黄遵宪正在上海卧病，准备病愈后赴日本，就任出使日本国大臣。对政变的发生，黄遵宪是毫无精神准备的，思想上也极为震惊。他在南归之后的《致陈伯严书》中，谈到了这次事变给他的最初印象：“一切如梦，并不

知长安奕棋有许多变局。至八月六日读训政懿旨，十三日得杀士抄报，乃知有母子分党变故，然亦谓于己无与也。至十七日得湘电，有‘沦胥及溺’之语，虽稍稍震惧，然犹谓过甚之辞。至二十三日知湘中官吏一网打尽，始有余波及我之恐。明晨未起，即已操戈入室，下钥锁门矣。”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对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他没有在这种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突发变故面前张皇失措。据曾经跟随黄遵宪在湖南办过保卫局的青年周孝怀的回忆，当黄遵宪被困于上海洋务局时，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曾经专程由北京赶到上海，去看黄遵宪，说：“你的事交给我，不用着急。”黄遵宪却极严肃地答复伊藤：“这是中国内政，你不必干预。”可见黄遵宪仍然保持着十分清醒的政治头脑。黄遵宪还勉励周孝怀：“你读过中国许多诗书，你看过我写的《日本国志》，每当变革时代，这种局面是史不绝书的。你想必知道，这种局面是不能长久的。……你们年青人不必对这个时代去歔歔感慨，必须对未来的局面仔细观察。……万不可气馁，尤其不可气忿，忿气是要误事的。”“国家不是一天的国家，事要慢慢来办。几百年积下的毛病，尤其要慢慢来治。”（见周孝怀《黄公度臬台》，未刊稿，原件存全国政协。）

由于种种原因，黄遵宪得以幸免于难。光绪二十四年（1898）九月一日他由上海启程乘船南归嘉应州。维新事业蒙受的挫折，前路该如何行走，他的心就象眼前那奔涌的海涛一样，不能平静。《放归》一诗，深刻表现了这位爱国诗人此刻内心的悲忿与徬徨：

绛帕焚香读道书，屡烦促报讯何如。
佛前影怖栖枝鸟，海外波惊涸辙鱼。
此地可能容复壁，无人肯就问夤舆。
玉关杨柳辽河月，却载春风到故庐。

回到嘉应故居“人境庐”后，黄遵宪将原来的“人

境庐”稍事扩展修葺，住了下来。能不能就此走一般士大夫的退居林下的老路呢？不能。一幅点缀于庭院园林间的对联，表现了他当时那种不甘失败而又无可奈何的内心苦闷。联云：

药是当归，花宜旋复；

虫还无恙，鸟莫奈何。

国难当头，爱国的责任心使他不能妥协，看着墙壁上张贴的时局全图，黄遵宪思绪万千。

二、痛定思痛

南归之后，黄遵宪过着一种表面上看来优游闲逸的生活。或与儿孙嬉戏；或短衣楚制，独行山野；或招乡人戚友饮。然而，他的内心却没有一刻宁静。

嘉应州，“山县僻陋，闻见稀阔”，“所居地电报邮局均不能通，平生故人，以党祸未解，亦无敢寄书慰问者。”（《致陈伯严书》，未刊稿）黄遵宪一时几与海内外的政治运动隔绝，他怀念壮烈牺牲于反动派屠刀之下的维新志士，思念尚活在人间的变法同志，尤其记挂着流亡日本、他寄予无限希望的梁启超，企望着南来的鸿雁“可能沧海外，代寄故人书。”（《雁》）

但是，更多的时间，黄遵宪是在回顾自己的历程，整理自己的思想，从中探索变法失败的原因，磨砺自己的斗争意志。这就是他说的“数年闭门，读书以广智，习劳以养生，早夜奋励，务养无畏之精神，求舍生之学术，一有机会，投袂起矣，尽吾力为之，成败利钝不计也。”（黄遵宪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致梁启超书）

通过最初的反省，黄遵宪在思想上形成了下述几点明晰的认识：

1. 戊戌维新的失败，原因在于维新党人的冒进。他在对周孝怀的谈话中，就说过“这次的失败，就是新派人‘求快’两个字的失败。”

2. 欲新国，必先新民。他说：“要收拾人心，须知‘总督’是不足重的东西，只要二指宽的一道上谕来，三天之内就得交卸。如果人心不归服你，不但马上卷铺盖，以前即使费尽许多心力，作了许多事，一卷铺盖都一齐完事”（周孝怀《黄公度臬台》）。黄遵宪从维新运动瞬息瓦解的事实中，痛感人心的重要，痛感民众的觉醒，民众思想意识的提高，是维新事业成功的必要条件。

3. 度诸今日之国情民情，仍以立宪政体为宜。

这几点基本认识，后来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书信中，曾经反复加以阐述。

光绪二十八年（1902），黄遵宪与梁启超建立了通讯联系。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前后写给梁启超的一封长信中，黄遵宪明确地谈到他对现阶段中国政体的认识。他说：“公言中国政体，征之前此之历史，考之今日之程度，必以英吉利为师，是我辈所见略同矣。……中国之进步，必先以民族主义，继以立宪政体，可断言也。”在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的信中，黄遵宪更明确地谈到他对国家政体的认识过程。他说：“当明治十三、四年（按：时黄遵宪任驻日使馆参赞），初见卢骚、孟德斯鸠之书，辄心醉其说，谓太平世必在民主国无疑也。既留美三载，乃知其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吾国。自是以往，……以立宪为归宿，至于今未改。”

黄遵宪对于政体的这种认识，大致是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他认为“今日大势在外患，不在内忧也。今五大洲之环而伺我者，协而攻我者，不独日本日夜伺吾隙以邀吾利。”（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日前后致梁启超书）在外强环伺的情况下，不能以国家内部的争斗来“授之隙而为之柄”（同上书）。二是当时民众的觉醒程度。黄遵宪认为民众的思想尚未受到民主的启迪，对国民的义务和权利尚无认识，这样的思想基础，建立一个“民主国”还不可能。他说：“自尧舜以来逮于今日，生长于吾国之民，咸以受治于人为独一无二之主义。其对政府不知有权利，实由对于人群不知有义务也。以绝无政治思想之民，分之以权，授之以政，非特不能受，而且造邪说而肆谤诬，出死力以相抗拒。以如此至愚至陋之民，欲望其作新民以新吾国，其可得乎？”（同上书）三是对清政府顽固派势力的估计。就在上面的同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故论今日政府之弱，可谓极矣，而以之防家贼，治内扰，犹绰有余裕也。事无幸成，徒使百数十英豪，万数千良儒血涂原野，骸积山谷，非吾之所忍闻；反诸爱国者之初志，亦必悔其策之愚拙，事之孟浪也。”黄遵宪认为反动顽固派的力量，对外虽懦弱无能，对付手无寸铁的人民则尚绰绰有余。在这样的力量对比情况下，勉强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徒使志士损躯，生灵涂炭，于事无益。基于上述考虑，他认为先以民族主义，也就是消除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然后继

之以立宪政体，“其势较顺，其事稍易”（同上书）。

与上面的认识相联系，在实现君主立宪的斗争策略方面，黄遵宪也主张“渐进”。他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十八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吾辈终不能视死不救。吾以为当避其名而行其实。其宗旨曰阴谋、曰柔道；其方法曰潜移、曰缓进、曰蚕食；其权术曰得寸进寸、曰避首击尾、曰远交近攻。”在同一封信里，黄遵宪还对主张“渐进”的原因作了解释，他说：“吾非不知时危事急，无可迁延，持缓进之说者，将恐议论未定而兵已渡河，揖让救火而火已燎原。虽然，此坏劫厄运由四五千年积压而成，由六七大国驱迫而成，实无可如何也。……世界之进步必积暂而至，实不能蹕等而进，一蹴而儿也。”

三、提出普及教育是救国之不二法门

在黄遵宪的政治思想中，民众教育被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与他的“国之文野，必以民之智愚为程度”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在光绪三十年七月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仆近见日本之以爱国心，团结力摧克大敌也，专以普及教育为目的。既发端于一乡，并欲运动大吏，使遍及全省。虽质效过缓，然窃谓此乃救中国之不二法门也。当道能提挈之，辅助之固善，否则乡之士夫相应相求，或亦可造此规模。不幸而吾民之知德力未及建立而吾国遂亡，然人格略高，求所以保种而兴灭，或亦稍易。”事实上，黄遵宪南归之后主要的实践活动也是在他的故乡兴办教育，他把教育看作改变国民精神的根本途径，以极大的热情投入这项工作。光绪二十九年（1903），黄遵宪邀集地方人士设立嘉应兴学会议所，自为所长，创办务本中西学堂，同时筹办东山初级师范学堂。在《敬告同乡诸君子》这篇兴学启事中，他说：“鄙人环游海外，历十数年，深知东西诸大国之富强，由于兴学，而以小学校为尤重，名之曰普及教育，谓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也。又名之曰义务教育，谓乡之士夫，族之尊长，各有教子弟之职，各负兴学之责也。又名之曰强迫教育，谓子弟既至学年，而不就学校者，施罚于其父兄也。”“普及小学校，系专为大局计，专为将来计。”在该文的末尾，黄遵宪还提到准备专门为年既长成而有心向学者设立

补习学堂。他热切地呼吁“诸君子同心协力，亟起而图之。”光绪三十年黄遵宪又派门人杨徽五、从堂侄之骏二人往日本习速成师范，准备学成回国任东山师范学堂教师。与此同时，还资助嫡堂弟由甫与四子季伟、长孙延豫同往日本留学，以求通过游历而拓其学识。甚至在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给梁启超的信中，劝说梁启超“不如编教科书之为愈也。于修身伦理，多采先秦诸子，而益以爱国、合群、自治、尚武诸条，以及理化实业各科，以定时宜……定趋向。”直到去世前五日给梁启超的绝笔信中，仍念念不忘此事，希望当时四处碰壁，弄得有点灰溜溜的梁启超能够“降心抑志，编定小学教科书，以惠我中国，福我小民”。

通过普及教育，传播维新思想，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维新人才，开拓民智，发扬民气，以为将来计，这就是黄遵宪兴办教育的出发点。也正是把普及教育视为新民立国之本，黄遵宪才在他的晚年，殚思极虑从事这项工作。他的这种想法和作法，今天看来，自然是“教育救国”之空想，但是，作为当时来说，他的出发点和所取得的成绩，仍然是可贵的。

四、可贵的新的思想因素

黄遵宪南归后的数年中，从政治思想的总体方面来看，虽然没有明显的根本变化，戊戌维新的失败，并没有使他产生如康、梁，尤其是康有为那样的混乱，那样急剧的动摇和倒退，他依然不改初衷，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注视着列强的动向。在《夜起》一诗中，他写道：“正望鸡鸣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沉阴噎噎何多日，残月晖晖尚几星。”对沙俄的侵我东北无比忿慨，对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前途极为忧虑。在《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中，对卖国贼李鸿章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和猛烈的抨击。诗中云：“平生自诩杨无敌，诸将犹夸石敢当。何意马关盟会日，眼头铅水泪千行。”“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表现了对出卖民族利益的败类的轻蔑。他也依然恪守他的政治信念，企望着立宪政体的实现能带来祖国富强，人民幸福。但是，在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我们却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中出现了一些极为可贵的新因素。这些新因素概括起来，至少有下列数点：

1. 严酷的现实，使他越来越对当道丧失信

心。黄遵宪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十八日给梁启超的信中明白地说：“今日当道实既绝望。”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前后写的长信中也说过：“今回窳将一年，所用之人，所治之事，所搜括之款，所娱乐之具，所敷衍之策，比前又甚焉。展转迁延，卒归绝望。然后乃知变法之诏，第为避祸全生，徒以之媚外人而骗吾民也。设有诘于我者，谓公之所志尚能望政府死灰之复燃乎？抑将坐视国家之舟流而不知所届乎？仆亦无辞可答也。茫茫后路，耿耿寸衷，忍泪吞声，郁郁语谁。”“今者时势，必将古今名臣传，循吏传中之善政一一举办，亦无补于民，无补于国。”从这些话看来，黄遵宪倒不一定是象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始终对光绪抱着希望。相反，倒是可以看出他的失望，他思想上的朦胧的觉悟。这种失望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必将日益加深，而这种不可变更的失望，也终将使他面对新的选择。

2. 与康、梁在观点上的分歧。黄遵宪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国家危机日深的年月，革命的力量在酝酿、积聚，逐步发展成为一种运动。改良派中如康、梁一类头面人物，逐步走上与崛起的革命潮流相对抗的道路。他们或作危言，混淆视听，分散革命力量，企图把革命纳入他们的轨道；或鼓吹谬说，麻醉民众，使革命者解除思想武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黄遵宪对于康、梁的某些观点和做法，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歧见。

他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十八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说：“近得南海落机山中所发书，……此函所云中国能精物质之学，即霸于大地，以之箴空谭则可，以此为定论，则未敢附和也。渠谓民主革命之说在今日为乌狗，在欧洲则然。今之中国原不必遽争民权。苟使吾民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无公德，无团体，皮之不存，毛将焉傅？物质之学虽精，亦奚以为哉！”对康有为的“技术救国论”进行了批判。

光绪二十八年春，黄遵宪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对康有为鼓吹“保教”，宣扬对孔子的宗教迷信，企图以“孔教”来牢笼人心的做法，阐述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往者湘中曾举以语公，谓南海见二百年前天主教之盛，以为泰西富强由以行教，遂欲尊我孔子以敌之。不知崇教之说，久成糟粕，……居今日而袭人之唾余以张吾教，

此实误矣。……今日但当采西人之政，西人之学，以弥缝我国政学之敝，不必复张吾教，与人争是非，较短长也。……孔子第因人施教，未尝强人以必从也。……既无教敌，又不设教规，保之卫之，于何下手！”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康有为“保教”之说的荒谬。

黄遵宪对梁启超一向是期许甚高的，两人的关系也极深厚。梁启超在《嘉应黄先生墓志铭》中云：“启超以弱龄得侍先生，惟道推义，以海以教。获罪而后，交亲相弃，亦惟先生咻噢振励，拳拳恳恳，有同畴昔。先生前卒之一岁，论书启超曰：‘国中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可见二人的交谊确非泛泛。但是，对梁启超的一些政治观点，黄遵宪也是不轻易苟同的。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前后，黄遵宪致书梁启超，对梁启超所鼓吹的“破坏主义”表示了反对。他在信中说：“公所草新民说，……皆吾腹中所欲言，舌底笔下之所不能言。……然读至冒险进取、破坏主义，窃以为中国之民不可无此理想，然未可见诸行事也。……以如此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之民，而率之以冒险进取，耸之以破坏主义，譬之八九岁幼童，授以利刃，其不至引刀自戕者几希！”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不愿公以非常可骇之义，破腐儒之胆汁，授民贼以口实”，警告梁启超“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求公加之意而已。”

当梁启超鼓吹“破坏主义”不成，一变而为“以保国粹为主义”时，黄遵宪又对梁启超的“保国粹即能固国本”的荒唐论调，明确地表示反对。他说：“若中国旧习，病在尊大，病在固蔽，非病在不能保守也。今且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杪致梁启超书）“谓保国粹即能固国本，此非其时，仆未敢附和也！”（光绪三十年七月致梁启超书）与此同时，对梁启超的忽“左”忽右，变化无常，提出尖锐的批评：“言屡易端，难于见信，人苟不信，曷贵多言。”（同上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卖国贼李鸿章病卒之后，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把李鸿章描写为“一身而系中国之安危的伟人。对于同一个李鸿章，我们从前面所引的黄遵宪《李肃毅侯挽诗四首》中，就可以看出，黄的态度就与梁的态度是大相径庭。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梁启超又想为刽子手曾国藩作传，写信给黄遵宪，征求黄对曾的看法。黄遵宪在复函中对梁启超的这一动机，也是大不以为然。他说：曾国藩“其学问能兼综考据、词章、义理三种之长……，然此皆破旧陈腐迂疏无用之学，于今日泰西之科学之哲学，未梦见也。……其所以尽忠以报国者，在上则朝廷之命，在下则疆吏之职耳，于现在民族之强弱，将来世界之治乱，未一措意也。”“窃以为史家之传其人，愿后来者之师其人耳。曾文正公者，……事事皆不可师。而今而后，苟学其人，非特误国，且不得成名。”（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致梁启超书）率直地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

从上面所列举的几点事实来看，应当说黄遵宪晚年的政治思想与康、梁之间已经存在一些明显的分歧，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重大差异。

3. 黄遵宪晚年在对人民的态度上，也有微妙的变化。黄遵宪在早年写的涉及太平天国起义的诗歌中，曾经表示了对太平军的强烈仇恨。说是“吾家本富饶”，现在是“历劫无一遗”了。因而他痛骂太平军是“跳梁贼”、“鬲兽”、“群蛙”，诋毁太平军是“夜夜迎新娘”“今日阿哥妻，明日旁人可”的乌合之众。对“剿灭”太平军余部汪海洋部的左宗棠大加赞赏。但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给梁启超的信中，却批评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视洪、杨之徒，张总愚、陈玉成之辈，犹僭盗贼，而忘其为赤子，为吾民也。”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的信中又说：“因念中国之民，正如失母断乳之婴儿，有人噢咻之，哺字之，不论何食，即啼声止而笑颜开矣。……可怜可哀，搁笔三叹。”这些言论，都说明黄遵宪在对社会的了解加深之后，他思想上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因素的加强。

4. 从黄遵宪晚年给梁启超的书信中，给他人的书信中以及他存留下来的诗歌作品中，我们还没有看到他公开攻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物以及他们的言论的文字。较多的情况则是认为在现阶段，民主革命之说很难实现。他仍然确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是爱国之士，而且并不排除将来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的可能性。

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前后写给梁启超的长信中，他说：“若夫后生新进爱国之士，有唱革命者，唱类族者，主分治者，公亦疑其非矣。姑无论理之是非，议之当否，然决其事之必

不幸成也。”“今之新进后生，爱国之士，……唱为革命类族分治诸说，其志可哀，其事可悲。”“风会所趣，时势所邀，其鼓荡推移之力，再历十数年、百余年，或者胥天下而变民主，或且合天下而戴一主，皆未可知。”在光绪三十年七月的信中，黄遵宪又表示，虽然自己主张立宪，却对于他人的提倡革命，主持类族，“闻之而不以为妄”，甚至觉得必须有几种不同的政治学说，“互相簧鼓而充政乃得成立”。他所不同意的是革命派在学堂中倡革命之说，认为学堂乃是造就人才之地，非鼓舞民气之所。他特别举出了上海爱国学社的例子，认为“徒使反动之力破坏一切”，使“新学之输入，童稚之上进亦大受其阻”，感到十分惋惜。黄遵宪的上述言论，在对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态度、感情上较之康、梁均有显然的差异，并不是如康梁那样的“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那样的势不两立。

5. 革命形势的发展，使蛰居于山村的黄遵宪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风雷的激荡，他一向坚持的“君主立宪”的理想，也不能一成不变。在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给梁启超的信中，他就埋下了伏笔。“弃而不可留者，年也；流而不知所届者，时势也。再阅数年，加富尔变而为玛志尼，吾亦不敢知也。”声明了自己的思想在时势的作用下发生这种质的变化的可能性。在去世前的四、五个月他写的最后一组诗《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中，写到梦见梁启超携己头，向谭嗣同、唐才常哭诉革命派对改良派的斥责：“君言今少年，大骂余非夫。当服九世仇，折槌射天弧。孰能张网罗，尽杀革命徒？汝辈主立宪，宁非愚且迂？”在另一梦中，他更谈到“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他为自己年既老，不及俟河清之日而惋惜。姑勿论是真梦假梦，黄遵宪将这组诗如此郑重其事地寄给梁启超，无疑是要借梦境，借梦中的梁启超的结局、梁启超的哭诉以及“他人之言”，来说明他自己思想深处的激烈斗争，反映出他积极的思考与探索。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中看出黄遵宪原来的君主立宪的信念的动摇。

五、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如下的结论：

黄遵宪晚年的政治思想，虽然由于对封建统治者业已成为帝国主义的帮凶和走狗认识不清，

对于民众的觉醒程度估计不足，找不到唤醒民众的根本办法，同时也由于他与外界的革命运动的隔绝，不能具体去感受时代的脉搏，他不象当时的章太炎那么痛快，“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他对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一直是顾虑重重，忧心忡忡，而始终未能跳出改良主义的窠臼。但是，由于至死不渝的强

烈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和献身精神一直是他晚年思想中的基本支柱，这就使他终于能不走到反动的营垒中去。而且由于在他的思想的内涵中存在这些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相通的因素，加上他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广泛阅历，如果天假之年的话，在革命潮流的裹挟之下，他完全具备由一个改良主义者进到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可能性，他晚年思想上出现的许多新的萌芽就是一种明显的征兆。



《康有为政论集》诗歌系年小议

止 水

汤志钧先生编选的《康有为政论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是目前所见收集得较为完备的康有为论著集。略读一过，兹就集中诗歌系年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以供编选者和读者参考。

《康有为政论集》20页所录《苏村卧病写怀》组诗四首，是研究康氏青年时代思想的重要资料。编选者系于一八七九年。按，组诗第三首有句云：“南望九江北京国，拊心辜负总酸辛。”当是怀念九江朱次琦和在北京的张鼎华而作。张氏在一八八〇年春自广州还北京，《康南海诗集》中有《送张十六翰林延秋先生还京》诗可证。故一八七九年张氏尚在广州。第二首有句云：“登楼俯仰古人往，展卷徘徊夜梦空。”古人，指其师朱次琦。往，谓朱氏逝世。又云：“迟迟佳日供多病，黯黯虚名负此翁。”系从朱氏《春感》诗：“迟徊佳日供多病，省识名心愧不才。”化出。朱次琦卒于一八八二年春。故《苏村卧病写怀》组诗亦当系于是时，时康有为二十四岁。

35页《除夕答从兄沛然秀才，时将入京上书》诗，编选者系于一八八七年。按，康氏第一次入京上书为一八八八年，此诗写于将入京时，当系于是年。除夕，为光绪十四年戊子除夕，即一八八八年二月十一日。

63页《苦蚊行》诗，编选者系于一八八八年。按，康氏一八八八年冬十二月上书不达，后受到顽固派的攻击，居于宣武门外南海会馆，作此诗以寄讽。故《苦蚊行》当作于一八八九年夏天蚊子大盛之时。

64页《上书不达……著〈广艺舟双楫〉成，浩然有归志》诗，编选者系于一八八八年。按，《广艺舟双楫》撰于一八八九年春夏间（见《广艺舟双楫序》）康氏于一八八九年九月出京归广州。诗题谓有“归志”，当系于一八八九年夏末秋初。



略谈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

高晨野

历代研究唐诗的学者们，在评论七言绝句中的优秀作品时，王之涣的《凉州词》是属于“压卷之作”的。

但是，这首名作在历史上曾被人妄改过——将诗题换成《出塞》，将第一句改为“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无疑“点金成铁”，有悖于诗人的原意。究其根源有三：其一是对“凉州”的地理沿革未弄清楚，特别是对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未弄清楚；其二，对“玉门关”及“孤城”在唐边塞诗中的特定含义未弄明白^①；其三，对唐代七言绝句的特殊要求——“风调”不理解。史铁良同志《也谈王之涣的“凉州词”》（《文学评论》1980.6.）和李飞平同志的《是“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学术研究》1981.1.）两篇文章，就存在上述问题。史文有两个论断：一曰“《凉州词》与凉州无直接关系”；二曰凉州境内无黄河，“《凉州词》写的是玉门关一带的景象，……纯系写实，明显地与黄河了不相涉，没有理由把黄河引进本诗”。这两点的根据是：“唐代凉州仅在甘肃武威一带，辖地不广，与玉门关相距甚远”。这个说法正确吗？符合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吗？

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唐朝人作诗，往往拿汉朝作比，特别是边塞诗，可以说是照例拿汉朝作背景。翻翻《全唐诗》，这类例子比比皆是，例如：“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白居易《长恨歌》）；“汉家天子好经过，白日青山宫殿多”（卢纶《华清宫》）；“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杜甫《兵车行》）；“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高适《燕歌行》）；“汉军屯在轮台北”（岑参《轮台歌》）；“日暮汉宫传蜡烛”（韩翃《寒食》）；等等。这里的“汉皇”、

“汉家天子”、“汉将”、“汉宫”、“汉军”等，其实就是唐皇、唐家天子、唐将、唐军、唐宫。这是什么原因呢？记得二十年前我的老师彭铎先生说过：原来唐朝人不只是看不起隋朝，就连整个魏晋六朝也不在眼下，唐太宗一开始就以上承汉统自命。唐人既然有这么一种自豪感，而汉唐两朝开边的情况又有点相同，于是诗人们就大有文章可作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几乎完全可以顶替现实题材，以今方古，借古讽今，就使得这些边塞诗冠绝今古。再如王昌龄的《从军行》中，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之句，其中“楼兰”本是汉代时西域的一个国名，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鄯善县东南，因其当时勾通匈奴屡次攻掠汉朝通西域的使臣，后来在汉昭帝时傅介子奉命前往，用计刺杀了楼兰王。所以“楼兰”在唐代已不存在，而唐诗中屡次出现“楼兰”也只是借用汉事喻唐事，用“楼兰”泛指在西北边塞地区进行骚扰的外族敌人，主要指吐蕃奴隶主的军队。

正是基于唐人在边塞诗中照例拿汉朝作背景这一原因，唐诗中“凉州”一词也是借用汉代“凉州府”的概念为其具体内容的。

西汉初置凉州，为武帝十三刺史部之一，东汉时，凉州刺史治所在陇县（今甘肃张家川）。当时凉州的辖区是很广阔的，在《后汉书》卷三十三“凉州刺史”部下，就列有陇西郡、汉阳郡、武都郡、金城郡、安定郡、北地郡（今宁夏县）、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张掖属国、张掖居延属国等十二郡，共有城九十八座，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全境，加上宁夏的宁夏县、青海省的青海湖以东的湟水流域以及陕西的定边、吴旗、略阳、凤县，内蒙古自治区的额济纳旗的居延海

西部,还有新疆的罗布泊(即《汉书·地理志》敦煌郡的“蒲昌海”)以东。所以当时的凉州是横跨黄河的。唐人诗写凉州以汉代地域为概念,这从唐人诗中对“凉州”范围的描述,以及诗中反映出的“凉州”、黄河、《凉州词》三者之间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比如:李端在一首《千里思》中写道:“凉州风月美,遥望居延路,沉沉下天云,青青缘塞树……”,既然是“凉州风月美”,何故又扯到远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的“居延”了呢?原来“居延”在汉代属于凉州府所辖的“张掖居延属国”之地。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张籍的《陇头》一诗:“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谁能更使李轻车,收取凉州归汉家”。这里的“陇头”即“陇西地”,它在唐代是属于“陇右道”的,而在汉代却属于“凉州府”,因此诗人才说“收取凉州归汉家”。在唐诗中很多地方描述了“凉州”与黄河的关系,其中较典型的有薛逢的《凉州词》:“昨夜蕃兵报国仇,沙州都护破梁州。黄河九曲今归汉,塞外纵横战血流”。这里的“沙州”(敦煌)、“梁州”(即“凉州武威城”),以及黄河,都是凉州府地区的风物,在唐人眼里黄河与凉州府是同命运的。在唐肃宗以来,吐蕃统治者兴兵侵占了唐王朝的河西、陇右两道所属的河、湟地区——青海湟水流域及湟水同黄河合流的一带地区——这给河、湟地区人民带来了很大灾难。诗人杜牧针对此事写了一首题作《河湟》的诗,描绘了河湟流域人民在吐蕃奴隶主的奴役下,虽然改事游牧,不穿汉服,但内心深处仍然思念唐朝:“……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河湟地区在唐代虽然分属陇右、河西两道,但在汉代却同属“凉州府”辖地,所以诗人才很痛切地感叹:而今只有那歌咏凉州地方风物的《凉州歌》还在天下流传,但这块凉州府所属的河湟失地何时才能收复呢?后来,在唐玄宗大历三年,河、湟地区复归唐朝后,该地老幼千余人到长安庆贺,这时杜牧在《今皇陛下下一诏征兵,不日功集,河湟诸郡,次第归降,臣获睹圣功,辄献歌咏》一诗中,描述当时的情景是:“听取满城歌舞曲,《凉州》声韵喜参差”。杜牧这两首诗很典型地表明了唐人心目中“凉州”的范围以及其与黄河、《凉州歌》三者的关系。

另外,甘肃黄河以东的“陇西”,在唐代是属于“陇右道”的,而在汉代它却是“凉州府”的中心。

由于唐人以汉比唐、借用汉代“凉州府”的概念,因此唐诗中“河西”与“陇西”往往分而不清,有时二者几乎就是“凉州”的代名词。比如:王维的《陇西行》:“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雪,烽火断无烟”。写的是“陇西”,但远及河西的“酒泉”;而在耿伟的《凉州词》“国使翩翩随旆旌,陇西岐路足荒城;毡裘牧马胡雏小,日暮蕃歌三两声”一诗中,歌的是“凉州”,实际上却描写了“陇西”一带;再如张籍的《凉州词》“风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诗中的“风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在唐代是属于黄河以东的陇西,但诗中却以“凉州”之地视之。以上三诗中“河西”、“陇西”不分,就是从汉代“凉州府”的范围说的。这类例子在唐边塞诗中太多了,象“征马长嘶青海北,胡笳夜听陇山头”(岑参《凉州词》)、“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白居易《西凉伎》)等,都是就汉代“凉州府”的辖境说的。唐人的这种习惯用法,在后代诗人中也相沿下来,如元代诗人高启的《凉州词》中就写道:“陇头高处愁西望,只有黄河入海流”。

总之,由于唐人诗中的“凉州”是以汉代凉州府的范围为内涵的,把陇右地区也包括在内。这样,东起陕西定边、吴起、略阳、凤县,西至新疆东部的罗布泊东岸,南从青海省青海湖东部的湟水流域(唐陇右道治所曾设于青海乐都),北到内蒙的额济纳旗的居延,就成为唐人眼中“凉州”的地域。明白了这个背景,就不会对其中“凉州”、“黄河”、“凉州词”之间的关系发生误解。

其实,王之涣这首诗本来就是“黄河远上”,与王之涣同时的芮挺章在天宝三年编成一部唐人诗选——《国秀集》,集中选编了唐代开元初年至天宝三年这三十年间“自天官侍郎李峤至进士祖咏凡九十人”的作品共二百二十首,其中所载王之涣的《凉州词》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这说明唐人明白“凉州”是借用汉代凉州府这一特定含义的。直到宋代郭茂倩辑录的《乐府诗集·横吹曲辞》中,才出现了将诗题改为《出塞》、将第一句改为“黄沙直上”的异文,这是后人不明唐人以汉为背景的手法而发生的误会。这类妄改的例子无独有偶,比如将卢纶的《送郭判官赴振武》一诗的“黄河九曲流,缭绕古边州”两句,妄改为“黄沙九曲

流，缭绕古边州”，将诗题改为《边思》便是。不知道这“黄沙”是怎样“九曲流”的？另外，必须指出的是，王之涣这首诗并不是“描写玉门关周围景色的”。诗人的立脚点和观察角度当是在凉州府境内黄河边一座军事要塞（孤城）旁的高山上，而不是在“玉门关”下。因为“玉门关”一词，在唐边塞诗中是“专名”用作“通名”，只是“西北边防”的代称，并非确指“玉门关”^②，这在古代汉语修辞学中称为“指代”用法。这只要翻翻《全唐诗》中有“玉门关”或“玉关”的诗就明白了。

推论的正确与否，首先决定于前提的正确与否，既然史铁良同志文章中两个论断的根据错了，那么其论断正确与否也就不言而喻了。不过他在谈到“凉州词与凉州并无直接关系”时，举的一个例证尚须剖析一下。他说“如王翰也写过两首《凉州词》，其中‘葡萄美酒夜光杯’，写的是西域的特征……”。这个看法由来已久，也很有代表性，以前许多唐诗选注本及文章中都这么说。比如：“夜光杯里盛满了红红的葡萄酒。……使人一见就知道是道地的西域风光，因为葡萄酒、夜光杯，就是西域的特产”（刘树勋《唐宋诗选讲》）；“夜光杯，《十州记》：周穆王时西域献夜光杯，杯可盛酒三升，夜晚杯放异彩，酒汁甜美可口”（《唐宋诗百首浅释》）等。其实这都是误解。在西汉初期，西域大宛的苜蓿、葡萄始传入内

地，但经过七百多年后到唐代时，凉州境内及内地很多地方不仅大量种植葡萄，而且也酿造葡萄酒了，这在唐人诗中就有很多反映。比如：大诗人元稹在《西凉伎》一诗中就写到：“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扑地桑柘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红楼”；刘禹锡的《蒲桃歌》写得更详细：“野田生蒲桃，缠绕一枝蒿。移来碧墀下，张至日日高。分歧浩繁缛，修蔓蟠诘曲。……有客汾阳至，临堂瞪双目。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读了唐人的这些诗，你还能说此时葡萄酒还是西域特产吗？其次，关于“夜光杯”，不能引用周穆王时的那个传说去附会，因为唐代凉州府酒泉郡就制造名副其实的夜光杯（至今甘肃酒泉还生产中外闻名的夜光杯）。从以上两点看，王翰《凉州词》中的“葡萄美酒夜光杯”，并不是“道地的西域风光”，而恰好是道地的凉州府风光。所以，那种以这首诗为例证认为“《凉州词》与凉州无直接关系”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这也可以从以上所引的张籍、薛逢、耿伟、岑参等人的《凉州词》的内容得到证实。

①、②均见拙文《“孤城”、“杨柳”及“玉门关”》（载甘肃《社会科学》81.2.）





广东省社会科学界举行纪念马克思逝世 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

广东省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于去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从化温泉举行。这次讨论会是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和广东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举办的。

讨论会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原理，探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与会的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法学、文学、教育等学科的代表，围绕讨论会的主题，分别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运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涵义和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及广东的传播；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理论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教育思想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专题。在讨论中，同志们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特别是联系当前实际，讨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涵义和具体表现；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实行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问题，更是生动活泼，争论热烈，既有现实性，又有一定的深度。同志们认为，这样讨论，起到了互相启发，互相探讨，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作用。

代表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检验并为实践所证明了真理。它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尽管马克思主义创立迄今已一百多年，历史发展了，时代不同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正确的指南。我们纪念马克思，最实际的行动就是努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学习、继承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志们还一致认为，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理论工作的方针。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历史，研究实际。当前，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就是理论研究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也是社会科学能够得到发展的唯一正确道路。社会科学工作者一定要振奋精神，同心同德，刻苦钻研，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努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方面的客观规律，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广东省理论宣传战线、高等院校、党校、干校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一百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社联副主席张江明出席了讨论会并致开幕词，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省社联常务副主席王致远致闭幕词。

讨论会共收到论文九十五篇，近百万字。大会还成立了论文选编小组，负责选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论文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鸿生）



广东党建学会举行首次学术讨论会

广东党建学会最近在广州成立，同时举行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会收到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共二十四篇。会议围绕怎样学好新党章，加强党员教育，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争取党风根本好转这个主题，对党建学科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党建学科的教学研究与党的建设密切相关，搞好党建学科的教学研究，对加强党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与会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有不同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它是研究无产阶级政党这一特殊矛盾运动规律的，重点则在于研究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党的建设和领导作用的规律。不论从党的建设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历史看，还是从党建学说研究对象所固有的矛盾特殊性看，都应当明确认识党建学说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党建科学有其严密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具有鲜明的党性、实践性和战斗性。党建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要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使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都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同志们在讨论中强调，执政党的建设要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过去旧时代的一切有产阶级政党，往往随政权的取得而终结其革命性，而共产党在取得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仅仅是新的革命长征的开始，共产党执政以后仍然存在变质的危险性。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以及执政党的地位都要求我们党永远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同志们还认为，执政党在新时期怎样更好地发挥领导作用，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应该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是改善党的领导的前提和目的，从当前的情况看，尤其要着力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的四化；加强党在工农和知识分子中的工作，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党，使党风根本好转，是当前改善党的领导的主要措施。

与会同志还就执政党的党风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不少同志认为，党内不正之风的思想根源，是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对我们党侵袭的结果，同时也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我们党带来的恶果。由于党内不正之风形成之后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我们不能认为只要路线回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党风就会自然而然好转。有的同志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党的作风对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影响，认为党的作风和党的路线是相依为命的，它还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风气，党的思想作风是全社会精神文明的支柱。

许多同志认为，不断提高党员和党的干部的质量，在党执政后尤其重要。党员和干部队伍面临如下三个问题，其一是如何看待权力的问题；其二是如何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党的纯洁性，坚定性和巩固性的问题；其三是如何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从外行变为内行的问题。一些同志指出，新时期的建设任务对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而党员的合格与否，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转化，因此对党员的教育就提高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还认为进行党员的共产主义教育必须解决教材问题和教学的方式、方法问题，同时要建设一支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教师队伍。

有的同志还对我国党政机构臃肿的性质、原因和解决办法进行了探讨。

与会同志还认为，党建学科的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需要进一步清除“左”的影响，努力克服研究基础薄弱，资料不足等困难。在研究执政党建设的问题时，要着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分析研究，同时也要研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情况。

大家认为，十二大为党建理论教学研究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新党章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学说和我国建党的实践，特别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了。表示要在大好形势下应该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努力开创党建教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

（省党校党建教研室 梁展鹏）



广东人口学会举行一九八二年年会 探讨控制我省农村人口的新办法

广东人口学会一九八二年年会，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从化县召开。会议联系广东的实际，以控制人口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系为中心，探讨了我在控制农村人口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解决的办法。

到会的同志认为，我省人口近年出现回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人口本身的因素，也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因素。但目前影响农民要求多生育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①由于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土地已相对固定给农民使用，部分农民认为要劳动致富，就要增加劳动力，这必然影响农民要求多生孩子。②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家庭经济收入增加，认为自己具有多养育子女的经济条件。③农民认为在目前政策许可下劳动力多可以进行适当的家庭分工，这也使部分农民要求多生孩子。④目前有些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削弱，“老有所养”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因而使一些农民要求多生，尤其生男孩。⑤计划生育工作未能根据新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原有的奖罚政策较难兑现，造成盲目多生的现象。

部分同志认为，要控制我省人口的增长，一是需要逐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使之能进一步加强物质生产的责任，又能加强控制人口生育的责任。二是做好耐心细致的工作，不断提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责任心。三是考虑颁发计划生育法，对那些组织劝不听，行政管不住的极少数人，给予法律强制。四是加强计划生育工作队伍的建设。五是各级党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领导，把实行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落实到基层。

参加这次年会的有我省各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学者、专家和省、地、县部分计划生育部门的领导同志五十多人。提交这次年会讨论的论文、调查报告共二十四篇。叶选平副省长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

(李蒲弥)

省逻辑研究会年会论点简介

广东逻辑研究会一九八二年年会，于十二月十八至二十日在佛山举行。现将论点简介如下：

一、在概念的定义中，关于概念究竟反映什么问题，有三种观点。①、概念反映思维对象。它可以是客观事物，可以是主观的东西、甚至是思维的东西。②、概念就是反映对象。在“对象”前加上“思维”二字，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我们谈的“对象”就是思维的反映对象。③、由于概念的反映主要是概括的反映，是反映对象的共同之点的，所以，概念所反映的，应该是“一群（或一类）对象”。

二、在概念反映对象的什么问题上，有四种意见。①、反映本质属性。因为概念按其本性来说，都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对同类事物的抽象。②、定义除了要说明概念反映的是“本质属性”（属差）外，还应加上“一般属性”（种）。③、概念是反映特有属性的。④、概念是反映固有属性的，即既包括本质属性，又包括非本质属性的。

三、在概念定义表述中，加上“用语词表述的”字样，以同判断相区别，是否必要？有人认为必要。有的则认为不必要，理由是：语词是概念的外壳，并不表现概念的本质。况且，有些约定俗成的“符号”也可以理解为概念，但它不是语词。还有，同样作为思维形式的判断、推理又要不要加呢？又如何加呢？

四、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对概念看法的区别：首先，形式逻辑从确定性方面去研究抽象概念；辩证逻辑则从抽象概念上升到具体的过程上去研究概念具有的特征。其次，形式逻辑从外延和内涵的角度去研究概念。它具有①抽象性：只反映共同点，不反映差异点；②单一性：分割了对象的整体；③固定性：撇开了运动。抽象概念反映对象时虽然有局限，但是必然的、必要的。辩证逻辑是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角度去研究概念的。它指出辩证（具体）概念则具有具体性（即“五全”：全体、全方面、全关系、全层次、全过程）和体系性（即范畴体系），主要是指具体科学体系（如物理学体系）、哲学体系和辩证逻辑体系。

（黄绍汪）

广东哲学学会召开一九八二年年会

最近，广东哲学学会以各研究会为单位召开1982年年会。这届年会贯彻党的十二大精神和中央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座谈会的精神。

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着重讨论社会主义时期辩证法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对立统一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应用和表现的特点等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着重讨论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意义，讨论了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之间的辩证关系，还讨论了我国现阶段阶级斗争的特点、根源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可能激化的问题。还听取了深圳市委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关于深圳特区社会主义文明建设的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研究会结合开展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学术活动，着重探讨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问题。此外，还探讨了德波林的哲学思想问题。逻辑学研究会的年会则着重探讨概念的定义以及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在概念问题上的差别。

我省哲学学会的这届年会，贯彻了理论联系实际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气氛活跃。与会同志还运用两分法总结了1982年研究会的工作，检阅了科研成果，交流了经验。展望新的一年，同志们决心为开创广东哲学研究工作的新局面而不懈地努力。

（哲讯）

省马哲史研究会年会论点简介

马哲史研究会于1982年12月10日至13日在广州召开年会。主要讨论了马克思早期思想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问题。

一、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

1. 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

一种意见认为，异化理论主要是马克思用来考察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物质生活关系的一种理论，它是在马克思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从批判改造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观开始，到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不完善到完善的过程。从其量上看，也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由多到少的演变。这当中，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经过了“两次转折”而逐步发展到唯物史观。因此，那些把马克思异化思想混同于黑格尔的异化观；视之为马克思主义两个伟大发现的理论基础；把它无限扩大使用的做法和理论都是不对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异化实际上是社会中的正常现象，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个“产生→异化→复归”的异化过程。

2. 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关系。

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始终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它与后者之间是完全对立的。虽然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也存在着继承其积极因素的一面，但是那些视人道主义为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核心的做法和理论是错误和没有根据的。另一种意见主张，资本主义社会有资本主义形态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有社会主义形态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应有着自己的人道主义理论，而且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

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通过俄国人介绍的”论断最精辟地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主要特点。同时由于旧中国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敌强我弱”，它决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具体过程的特点必然是在反对和战胜各种错误的斗争中才能实现。在方式方法上，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十分注重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的结合，知识分子的先锋作用和广大工农群众的结合。

另一种意见主张，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而学习、掌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要特点。这是以中国的国情作为基本依据和条件的。

还有一些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应该包括我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的各个时期、各个阶段。这样才能既看到传播的总特点，又看到各个时期的不同区别。

（陈荣冠）

《南方经济》(双月刊)创刊

由广东经济学会和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主办的经济理论双月刊《南方经济》即将创刊发行。《南方经济》设有《探索与争鸣》、《特区经济》、《工作研究》、《调查报告》、《经验交流》、《企业顾问》等栏目，内容丰富、文字活泼，具有一定的南方特色。《南方经济》对企业管理人员、财经院校师生以及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南方经济》的创刊，为经济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园地，将为我国经济科学的百花园增添光彩。

《南方经济》已开始征订，读者可汇款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南方经济》编辑部，全年二元七角，（包括邮费）。

（南金）

·杂志简介·

代 号	杂志名称	刊期	半年(元)
46—64	学术研究	双月	1.05
46—87	气功与科学	双月	0.90
46—17	科学世界	双月	0.90
46—19	银幕剧作	双月	1.50
46—20	世界文艺	季	1.00
46—22	武林	月	2.64
46—23	家庭	月	1.62
46—33	新医学	月	2.16
46—34	广州医药	双月	0.90
46—36	广东教育	月	1.20
46—37	作品	月	1.80
46—38	新中医	月	2.10
46—42	黄金时代	月	1.62
46—54	广州文艺	月	1.92
46—60	学习与宣传	月	0.90
46—63	环境	月	1.20
46—66	广东医学	月	1.80
46—67	岭南音乐	月	0.60
46—69	象棋	月	0.72
46—70	现代外语	季	0.80
46—71	南国戏剧	双月	1.20
46—78	科学之春	双月	0.90
46—80	支部生活	月	0.90
46—83	科普画刊	双月	0.75
46—86	体育之春	月	2.28
46—88	语文月刊	月	1.68
46—89	影视世界	双月	1.14
46—90	随笔	双月	1.50
46—91	风采	双月	1.44
46—92	花城	双月	3.00

广州市邮局发行 全国各地邮局办理订阅



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总第五十六期

编 辑 者 学 术 研 究 编 辑 部

广州越秀北路222号

邮政编码：510020

出 版 者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印 刷 者 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发 行 者 广 州 市 邮 局

订 阅 处 全 国 各 地 邮 局 (所)

国外总发行 中 国 国 际 书 店

国外代号：BM268

北京2820信箱

代号：46-64

国内定价：每册0.35元

广东省期刊丛刊登记证第六号

本刊每逢单月二十日出版